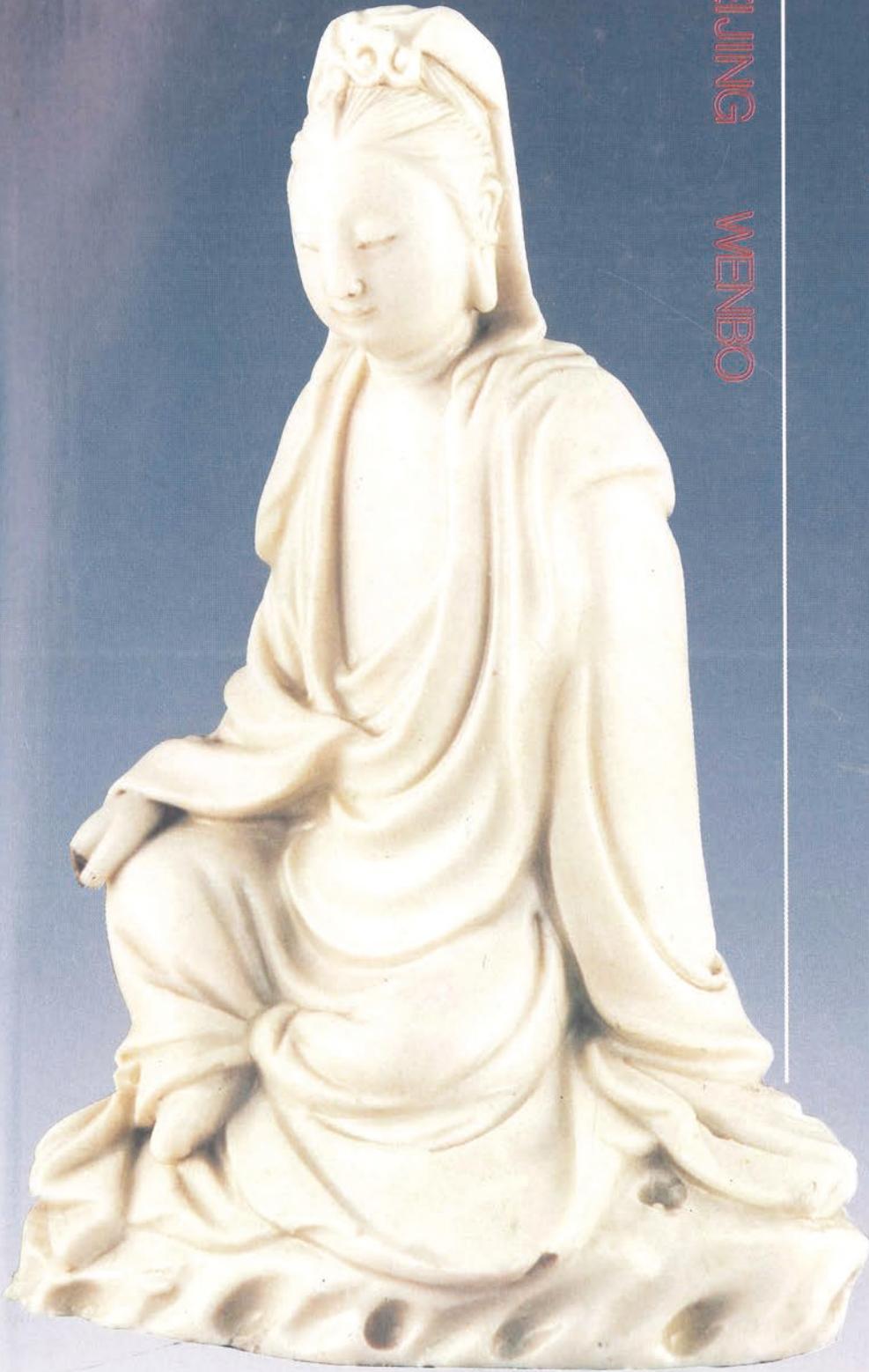


北京文博

BEIJING WENBO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主办

1997

爱北京

捐城砖

活 动 散 记



△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参加搬城砖劳动



△何鲁丽与廖静文在工地



△林文漪副市长在工地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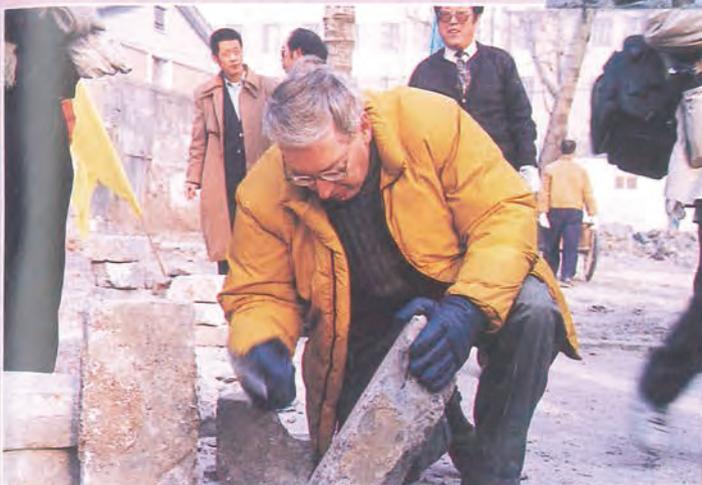
北京明清旧城曾被世界公认为人类文明的杰作，而环绕旧城的明清城墙，则被誉为美丽而风韵独具的花环和项链。由于历史的原因，旧城墙只剩下西便门一段和东南城角楼两侧东西、南北走向各一段遗迹。1984年5月，北京市将其定为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0月，一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拆迁危旧房时，将这段老北京城最后一段内城城墙裸露出来。

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博物馆学会、考古学会、史地民俗学会在市文物局的组织下，联合发起了“爱北京城捐城墙砖”活动，号召全体会员、广大市民、单位将使用和收存的旧城砖捐献出来，用于古城墙的修缮。截止到今年1月已收到群众捐献的明、清城砖1.8万块，“爱北京城捐城墙砖”活动，已成为全市群众增强文物意识，创建精神文明的实际活动。

市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工地劳动▷



◁外国友人参加劳动



市民把捐献的城砖运往市文物局▷



△“爱北京捐城砖”表彰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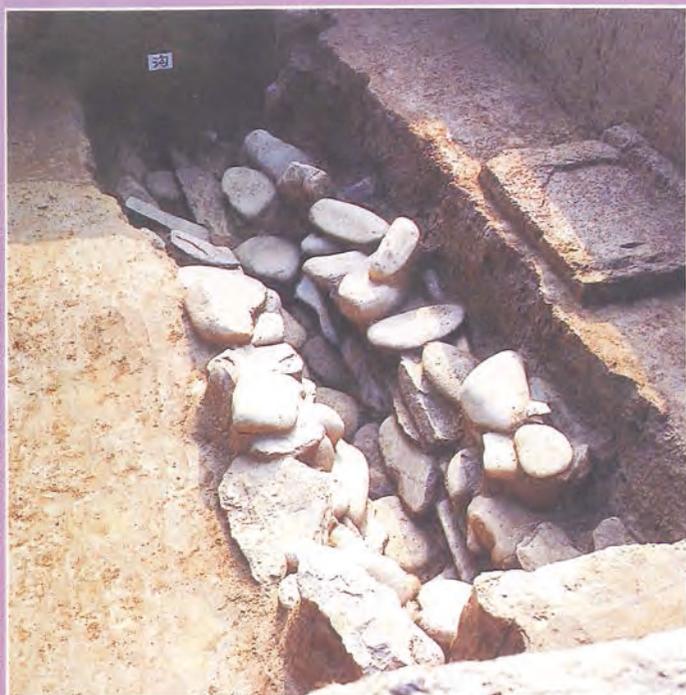


△红领巾小朋友在捐城砖大会上发言

(彩插一)

北京琉璃河遗址

考古又获重大发现



□东城墙北部卵石排水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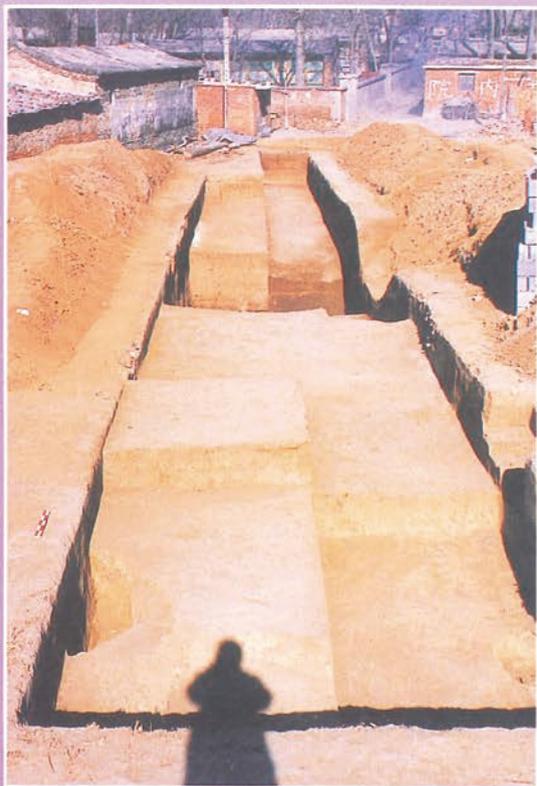


□1996年下半年在城里发掘出刻有“成周”的甲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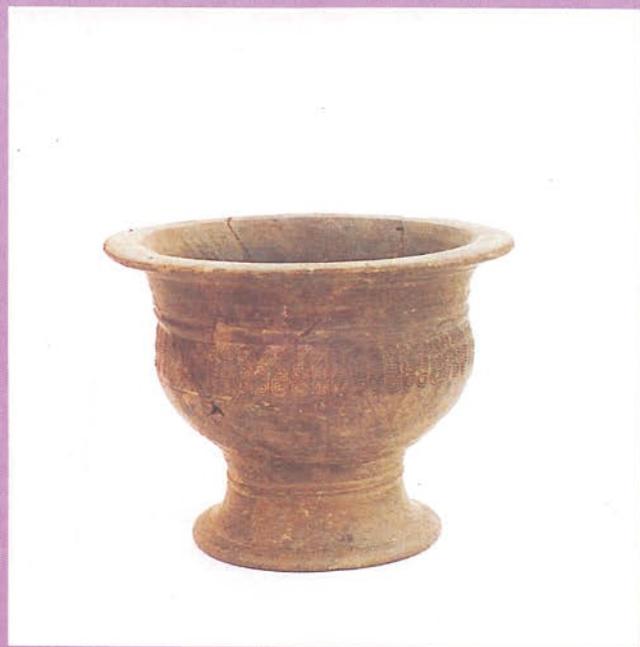


□城墙夯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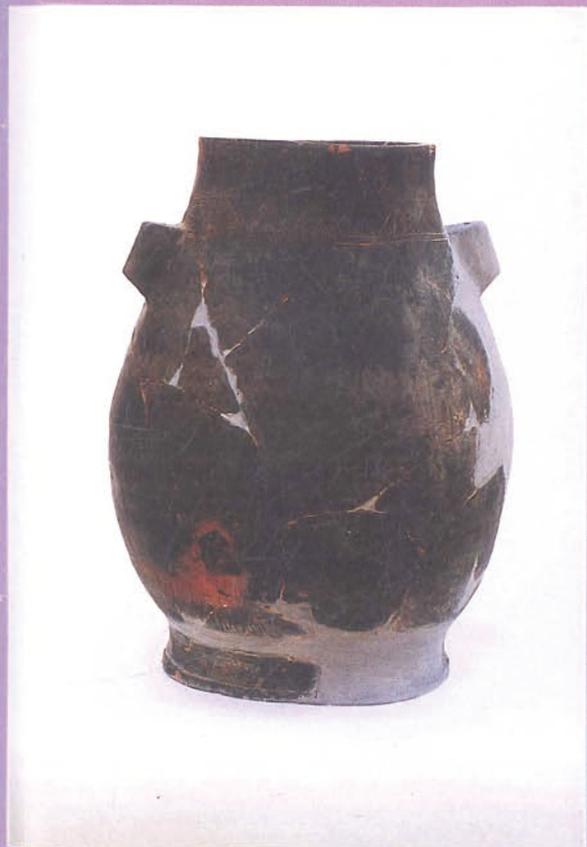
□北城墙中部的城墙基础及城外护城河



□1996年在城内发现的陶质排水管



□云雷纹陶簋



□椭圆形磨光黑陶壶

北京王府井发现

旧石器晚期遗址

1996年底，考古人员在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工地发现了古人类活动遗址(图①)，消息传出，引起广泛关注。市文物局立即组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东城区文物管理所和平谷县文物管理所的考古人员进行了发掘工作(图②)。

在各级领导及专家们的支持和指导下，发掘工作得到建工集团的积极配合，进展顺利。目前，已发掘200多 m^2 。出土标本600余件(图③)。其中石制品200余件，有石核、石片、石器和碎屑；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骨片300余件，如牛、马、鹿、兔、鸵鸟等；还发现用火遗迹，有木炭、烧骨和灰烬。它们均出自距地表约12m深的河湖相地层。

根据遗址的地质地貌和石制品的文化特征及伴出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确定该遗址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即考古学年代旧石器时代晚期。并推测是一处古人类活动的场所，是古人类进行加工石器和生活地方。此次发现，北京城区尚属首次，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国家首都发现二万年左右的古人类遗址。它填补了北京平原地区从未发现过旧石器的空白，为研究北京地区二万年左右的古人类在洞穴与平原的生活，提供了科学依据(图④)。

(郁金城、李超荣、谢楠、杨学林供稿)



①位于王府井“东方广场”工地中心的遗址



②考古人员进行发掘测绘



④科研人员在取土样



③遗址中心区出土情况(白纸条为遗物编号)

(彩插图)

北京文博



目 录

(1997年第1期)(总第七期)

古都风貌

- 营造高层次的文化氛围是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
..... 齐大卫(5)
- 关于北京城传统中轴线的历史考察 张 宁(10)

博物馆学

- 试论博物馆社会教育作用的新发展
——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的作用 赵 梅(17)
- 北京自然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基地工作概况
..... 北京自然博物馆(22)
- 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充分发挥军博青少年教育基地的作用
.....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25)

学术园地

- 明房能墓志考 李 巍(30)
- 普惠生祠香火碑及魏忠贤 滕艳玲(36)
- 梁启超家族墓园与石刻 明晓艳(41)

文物工作

- 关于文物保护资金良性循环的探索 单霁翔(47)
关于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中存在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成大生(52)
做好新时期文物安全保卫工作 郝东晨(54)

北京史地

- 琉璃河遗址访谈录 赵福生(57)
有关北京近代文物的一些认识 李淑兰(60)
藏传佛教及其造像艺术对北京地区的影响
..... 邓丁三(67)

文物鉴赏

- “款书”在书画鉴定中的作用 阎继红(73)
雍正的治国思想与官窑艺术 于平(77)

古代建筑

- 北京传统建筑的色彩 傅立(82)

书评

- 《北京市志稿》的编纂、校勘与出版 李建平(87)

资料信息

- 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
(四) (89)
北京市文物局 1996 年四季度文博事业大事记
..... 王辅宇(93)
《北京文博》编辑部召开新春座谈会 (98)

封面、封底:宣武区梁家园出土清白瓷观音

封二、彩插一:爱北京捐城砖活动散记

彩插二、三:北京琉璃河遗址考古又获重大发现

彩插四:北京王府井发现旧石器晚期遗址

封三:北京新增七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文博》编辑委员会

顾问:侯仁之、单士元、苏秉琦 主任:宿白 副主任:单霁翔、廖静文、王世仁、曹子西、齐心、马希桂、秦公
编委会委员:王丹江、王光镐、孔繁峙、刘建业、成大生、张宁、张展、陈平、陈旭、季华、荣大为、赵迅、赵其昌、
郑广荣、晋宏逵、徐明、韩永、葛英会、傅公弼

主编:张展 编辑部主任:陈晓苏 本期责编:陈晓苏、魏伯涛、张岩 美术编辑:张秀玲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 编辑出版: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北京文博》编辑部

协办单位: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公司,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

BEIJING WEN B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S)

NO. 1, 1997

Contents

PRESERVATION OF THE ANCIENT CAPITAL'S VIEWS

Creating a High Level Cultural Atmosphere; A Strategic Goal of the Capital's Cultural Development by Qi Dawei(5)

A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Axis of Beijing City by Zhang Ning(10)

MUSEOLOGY

New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Museums; Function of Beijing Educational Bases for Youngsters by Zhao Mei(17)

A Summary of the Work of the Educational Base for Youngsters in the Beijing Natural Museum (22)

Energetically Propagate Patriotism as a Guiding Ideology,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 Function of the Military Museum as an Educational Base for Youngsters (25)

ACADEMIC FORUM

A Study of Fang Neng's Epitaph by Li Wei(30)

Wei Zhongxian and the Spirit Stele in the Puhui Temple for the Worship of This Powerful Eunuch Then Still Alive by Teng Yanling(36)

Tomb Garden of Liang Qichao's Family and Stone Carvings in It by Ming Xiaoyan(41)

CULTURAL RELICS WORK

Exploration of a Good Circulation of the Fund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by Shan Jixiang(47)

Some Noteworthy Problems in the Work of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and Cultural Relics in Beijing by Cheng Dasheng(52)

Try Our Best to do Security Work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New Period by Hao Dongchen(54)

BEIJING HISTORY AND GEOGRAPHY

- Notes on a Visit to the Liulihe Site
..... by Zhao Fusheng (57)
- Some Notions about Cultural Relics of Modern Times in Beijing by Li Shulan (60)
- Influence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Its Image-making Art on the Beijing Area by Deng Dingsan (67)

CULTURAL RELICS APPRECIATION

- Role of Inscriptions on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ic Works in Their Identification by Yan Jihong (73)
- Emperor Yongzheng and the Art of Porcelain from the Yongzheng Imperial Kiln by Yu Ping (77)

ANCIENT ARCHITECTURE

- Coloring of Traditional Buildings in Beijing
..... by Fu Li (82)

BOOK REVIEW

- Composition,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Chronicle of Beijing City* by Li Jianping (87)

MATERIAL AND INFORMATION

- Catalogue of the Epitaph Rubbings from the Beijing Area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aterial and Information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V) (89)
- Chronicle of Events in Cultural Relics and Museum Work at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Oct. - Dec. 1996) (93)
-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Holding a Conversation to Welcome in the New Year (98)

EDITORIAL BOARD OF THE BEIJING WEN BO

Advisors: Hou Renzhi, Shan Shiyuan, Su Bingqi

Chairman: Su Bai

Vice-chairmans:

Shan Jixiang, Liao Jinwen, Wang Shiren, Cao Zixi, Qi Xin, Ma Xigui, Qin Gong

Members:

Wang Danjiang, Wang Guanghao, Kong Fanshi, Liu Jianye, Cheng Dasheng, Zhang Ning, Zhang Zhan, Chen Ping, Chen Xu, Ji Hua, Rong Dawei, Zhao Xun, Zhao Qichang, Zheng Guangrong, Jin Hongkui, Xu Ming, Han Yong, Ge Yinghui, Fu Gongyue

Editor-in-chief: Zhang Zhan

Director of Editorial Department: Chen Xiaosu

Managing Editors of this issue: Chen Xiaosu, Wei Botao, Zhang Yan

Artistic Editor: Zhang Xiuling

The journal is sponsored by th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the Capital Museum, Beijing Municipal Company of Cultural Relics,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Beiji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ncient Buildings.

It i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Beijing Wen Bo*, Information and Data Centre, Beijing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ffairs.

营造高层次的文化氛围 是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的 重要目标

齐大卫

一、问题的提出

人作为文化的生物,从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就被自然、社会的物质世界及人类文化氛围所构成的特定环境包裹起来。这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又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文化氛围。一定的时代社会,以致于一定的民族,都有历史积淀和现实发展相统一的文化心理结构,并由此构成特定的文化氛围。对于特定的人群和社会来说,较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文化氛围是更深层次的社会环境。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把握特定人群和社会的发展轨迹、文明程度及其肌理特色。

“文化氛围”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天然生

成的,它是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它是特定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特定的人类社会群体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总汇的结果,而且反作用于一定时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其影响之大,涉及到国家、民族、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沦肌浹髓”地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文化的发展,不论是其硬件部分还是软件部分,归总起来,都是在围绕着一个目标活动,那就是营造一个能够适应时代要求、反映民族精神、显示地域特色、满足人民需求、净化人的心灵、提高群体素质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层次“文化氛围”。

“北京是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城市”。“北京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建设要反映出中

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首都的独特风貌。”这是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对北京城市性质的定位和建设要求。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的研究和制定,就是为实现这一总体规划目标寻找科学、正确、适宜的行动策略。针对北京城市的性质,历史定位和发展要求,深入细致地、全面广泛地思考研究一下它需要怎样的文化氛围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文化氛围,对于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突出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历史定位,不但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

二、“文化氛围”面面观

文化氛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由多种因素长期集结、综合作用而形成的总体效应。它象气味的分子一样渗透在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方面。它很实,但不是实体,难以量化;它很虚,但又不虚无飘渺,它随处可见、可触、可感。一个城市的标志建筑、民居特色、街区景观、市花市树、言语谈吐、出行方式、风土人情、节日文化等等,大到城市布局、环境质量,小到街灯亮度,饮食衣着,都是形成某个特定城市“文化氛围”的分子基因。一座有生气、有活力的城市,象一个有生命的肌体一样,也是一个形神兼备的整体。它不仅使人“看”到什么,而且使人“感”到什么,“想”到什么。文化氛围就是城市的“神”。这个“神”,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杂乱的,而是“杂多的统一”。“杂多”不是“杂乱”,“杂乱”就不“统一”了;“统一”不是“单一”,“单一”又不“杂多”了。唯有“杂多的统一”才能藏住“神”,并显出“神”。只有显出“神”的城市,才能显出它的文明档次和文化特色。可见,文化氛围乃是城市的灵魂,魅力之所在。

构成“文化氛围”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环境景观、语言世界、社会心理、审美趣味和风土人情。

(一)环境景观

一座城市作为一个具有外观的实体存在,是由它的硬质景观、软质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综合效果而显示出来的。硬质景观包括纪念碑亭、楼堂馆所、民居屋舍、道路街灯、标语牌匾、橱窗广告等;软质景观包括水源绿地、大气质量、噪音分贝、气候变化、交通状况、流动色彩等;人文景观则是在上述硬质景观与软质景观的背景上它的市民(活动着的城市主体)所表现出来的人际关系方面的情况,如:行为方式、处事态度、应答情态、眼神面容、行进速率、遵法程度以及市政管理的方式和水平等等。一个城市,特别是一座古老的大城市,就是一部活动着的“百科全书”。身处其间的人们既是这部书的作者,又是这部书的读者。他们每天都在用自己的灵魂书写着这部永远写不完的浩卷,每天都在用自己的眼睛阅读着这部永远读不完的活书。

在上述种种环境景观因素中,最能代表和最能集中表现一座城市文化氛围的是它的标志性建筑。它常常被视为这座城市的象征,“纹章”,或者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光荣与屈辱,或者透着这座城市文化倾向,或者反映着这座城市的个性特色,成为了解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标志。如,纽约华尔街的摩天大楼、悉尼的歌剧院、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北京的长城、故宫、天安门。这种标志性建筑数量愈多,特色愈鲜明,代表性愈广泛,就愈能说明这座城市的文化倾向和文明程度,从而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拳头产品”。这些“产品”熠熠发光,照耀着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进程。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的设置,应该是立体的层次结构,既应有标志其过去文明的建筑,也应有标志其现代文明的建筑;既应有标志其文化风貌的建筑,又要有标志其生态气息的建筑。就北京的情况来说,标志性建筑虽然很多,也很有名气,但多为标志古代文明的建筑,也就是说,说明北京是一个世界著名古都的标志

性建筑,要比说明北京是一个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多得多,名气也大得多。后者,虽然也有诸如1958年前后的“十大建筑”等令国人自豪一时的作品,但时过境迁,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的标标志性质已相继淡漠。即使象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革命博物馆,虽然与故宫天安门并肩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四周,仍令人瞩目,但他们的国际性的标志价值恐怕还远不能与故宫、天安门相提并论。至于,北京至今连一座具有国际水平的国家大剧院都没有,国际性的重要演出,还需借助于异质功能的人民大会堂或工人体育馆、场。这对于北京的“文化氛围”建设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和漏洞。

(二)语言世界

语言是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城市居民的知识层次、文明程度、内在素质,大量地要依凭他们的话语形式表露出来。一个城市的实际言语,诸如语音的优美纯正、语意的健康深邃、语调的和谐变化、语气的平和贯通、语韵的明快雅致以及对话的协调文雅,构成了这个城市语言世界的独特风貌,成为该市文化氛围的重要载体。

北京建城已三千多年,是世界著名的古都,长期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语言经过千百年来的运行、完善、融合、定型,已经成为一种简捷明快、浏朗上口、易学易用、表现力强的语用工具,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为现代汉民族语言的形成,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的普通话”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京语音一直为全国人民所青睐,京腔京味的艺术作品受到日益众多的接受者的爱戴。

但是,从现在北京语言运行环境来看,在一部分北京居民中,语用的规范意识还不强。他们对家常语体(即生活用语、家庭

用语、亲友用语等)与正式语体(即公文用语、社会用语,教学用语、媒体用语等)的界限还分不清楚,常常把家常语体中可以运行的土语成分,不加选择地、随意地、过多地运用到正式语体中来,甚至阻碍了思想的交流,冲击了普通话的正常运行。比如,“告诉你”,这个由两个词汇、三个音节组织而成的词组,在北京土语中变成了“告儿你”,一个“儿话”音把“诉”字轻轻抠掉了,产生了语用的不规范。更有甚者,在公众场合中许多不健康的粗俗、污秽的语言仍不绝于耳,比如:由“丫ren的”演变过来的“你丫”长,“你丫”短,在一部分人嘴边成了不可或缺口头语,大有变为“市骂”之势。这对于首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以及对于首都的高层次文化氛围的形成都是有害无益的。这个问题也应作为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的目标加以重视,积极地通过各种途径采取有效措施,教育北京广大市民,特别是老北京居民,提高“语用的规范意识”,在公众场合、在工作环境中用“普通话”的严格内涵规范自己,在认识到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时,切勿忘记还有“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指词汇),特别是还有“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要求,坚持不懈地为健康地、准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而奋斗。

(三)社会心理

社会是由人以及人的生存活动组成的。但社会并不是单个人的总和、个体的组合,而是这些个体彼此相互联系所处的关系、联系和条件的特殊总和。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所以,离开对于社会中各种无组织的(即彼此无关个体间的偶然集合、人群等)和有组织的(即集体)人类共同体里人们交往、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过程中产生的心理现象的研究,就不可能具体地了解这个社会的肌理、动态和发展趋向。

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

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具体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因素论。他认为社会是由生产力状况、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等五个因素构成的。^②这五个因素处在不同的层次中,一层决定一层,同时又相互作用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社会心理是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借以建立各种意识形态的中介机制。他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个时代的心理。”所以,“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与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③

什么是社会心理呢?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就是“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实际上就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的原始的、流动的情绪和意识。它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是人们对周围事物的自发的、直接的、朴素的、不约而同的感受。它往往以不定型的感觉、情绪、情感、意志活动表现出来。比如鲁迅塑造阿Q这个形象,就是要解释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境况下的一种落后的国民心理。这部作品告诉我们,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过辉煌贡献的伟大民族,处在衰败、落后的情势下,它的子民不是很容易地就能够自强不息、励精图治、奋起直追的,相反,倒容易产生一种虚荣、怀旧、夜郎自大、拿失败当光荣的精神胜利的特殊心理。王朔的小说流行一时的時候,他那“调侃”风格得到不少人的喝采,恐怕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愤懑情绪不无关系。当社会上一度流传“一等公民是公仆,高高在上享清福。二等公民作官倒,投机倒把有人保。三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的时候,不正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反映吗?当一位“面

的”司机说:“老百姓真听话,说不让放爆竹马上就不放了,可有些领导干部,三令五申不让贪污腐化,他们就是不改,也不知谁的觉悟高。”这不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反映吗?如是等等,说明社会心理是永远存在的,而且作为文化现象,成为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化氛围的重要因素。在研究制订“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的时候,也应考虑到这一因素,规划出掌握、引导、利用社会心理的方法和途径来,以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

(四)审美趣味

一般来说,审美趣味就是审美主体在审美上的特殊爱好和兴趣。但从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审美趣味既是个人的行为,又是社会的现象。从个人来说,它是审美主体精神美的具体表现,正是在审美趣味中表现了一个人在审美方面的发展水平。从社会来说,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社会趣味,是这个社会的审美理想的体现,是检验这个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审美趣味是个人差异性与社会共同性矛盾统一的复杂的评判系统。一个人的审美趣味不仅有高尚与卑下、健康与病态、精雅与粗陋的区别,而且是一个不断流动与变化的过程。纯正的、高格调的审美趣味不是与生俱来的,它要靠与社会的诸种因素相协调的、有指导、有计划的审美实践来培养。反过来,它还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个人的、社会的审美实践的发展和提高,成为形成首都“文化氛围”的重要因素之一。

审美趣味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审美追求,本身就是一个人的艺术品味的衡量尺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审美趣味更直接地看出一个人的教养程度和审美教育的结果了。因此,趣味是可以培养的。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趣味和他的资禀性情、身世经历、文化水准、文明程度有关系,同时和周围环境、传统习俗、文化氛围也有关系。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会带来审美趣味的倾向、品味、格调、层次的变化。因此,我们研究首都文

化发展战略的时候,应该遵照江泽民总书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重要指示,通过新闻出版、图书阅览、文化教育、宣传媒体等多种渠道,加强对社会群体审美趣味的培养和诱导,使市民的审美趣味逐步溶入高层次的文化氛围中。

(五) 风土人情

北京素来是一个富有人文特色的城市。居民普遍热情好客,乐善好施,而且,心气刚烈,嫉恶如仇;关心国事,不避锋芒;性格开朗,乐于交往;热爱艺术,善于休闲;重视节日文化,尤喜结社自娱;热爱自然,珍惜动物。民俗厚重,民风淳朴,大有开发余地,也是首都文化发展战略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特别是群众艺术、社区文化的发展方面,要定出有力可行的措施,把北京地区优秀的民俗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总之,上述五个因素的集结综合,精心培养,交融互补,全面操作,将构成与首都地位相称的高层次、高质量、高水平、有特色的“文化氛围”,使北京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中心。

三、“文化氛围”的设想与描述

北京作为首都的形象,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行政任命的,而是靠全体市民通过辛勤的劳动、自觉的行为建设起来的。目前,虽然中央已把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定位明确下来了,但,它是哪一种文化类型的城市呢?还不太清楚。是官场文化或衙门文化型?是经济文化或商贸文化型?是科学文化型?还是旅游文化型?抑或兼而

有之?如果是兼而有之的话,那么主体文化型又是什么?这是需要讨论清楚的,我想,通过“文化氛围”的讨论或描述,可能便于我们把握北京的文化类型。

“文化氛围”和“文学风格”一样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只可领悟很难言传的体验。如果言谈举止是一个人的文明素质的表现,那么文化氛围可以说就是一个社会群体、一座城市的文明素质的表现。在我的想象中,北京的动态气质应该是静穆的、古雅的、疏落的、秀丽的、沉稳的、清晰的和明媚的,而不应该是嘈杂的、稚嫩的、臃肿的、持重的、躁动的、纷乱的和阴霾的。它给人的视觉心理的感受,应该是金黄、碧绿和青黛色的和谐结体。在城市建设上,既有古都风貌的厚重性,又有新都气息的开放性;市民的情态既是活泼深情的,又是忠厚理性的;人们的装束既是飘逸潇洒的,又是庄重合度的;人们的眉宇间既透露着机敏睿智,又洋溢着热情淳朴;民风民俗既具有传统古都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又具有国际大都市的兼容性和多样性。到那时,温文尔雅的切磋声和欢笑声取代了粗野的喊叫声,悠扬悦耳的鸟鸣声和乐曲声取代了嘈杂的吵闹声,那将是怎样的一种心旷神怡的氛围啊!我相信,这一天总会到来的,只要我们不懈地营造它。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②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转引自列·谢·维戈斯基《艺术心理学》。

③《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第3卷,第734页。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关于北京城传统中轴线的历史考察



◁张 宁▷

在北京古都风貌景观之中，贯穿都城南北、长达 8 公里的城市中轴线，最为引人注目。近两年来，笔者在研究北京古都风貌过程中，对中轴线在城市规划布局中的地位、作用，中轴线所突出体现的都城设计特色，越来越觉得有深入探索的必要。

一、北京城传统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并为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设计、营建，提供了重要启迪与借鉴。

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第八部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①，特别强调从城市格局和宏观环境上保护和发展北京古都风貌。在列举的应重点保护和发展的文物名胜和人文景观之中，把“保护和发展传统城市中轴线”放在首位；并明确指出：“保护和发展传统城市中轴线，必须保护好从永定门至钟鼓楼这条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传统风貌特点。继续保持天安门广场在轴线上的中心地位，要在扩建改建中增加绿地，完善设施。鼓楼前街和前门大街要建设成为具有传统特色的商业街”。“中轴南延长线要体现城市‘南大门’形象；中轴北延长线要保留广阔的绿带，在其两侧和北端的公共建筑群作为轴线的高潮与终结，突出体现 21 世纪首都的新风貌”。

这里强调保护和发展的北京城传统中

轴线及其景观，虽形成于明清时代，其肇始年代，却可追溯到十三世纪后半叶的元大都城。纵观北京城市发展史，可以看出，无论是周、秦、汉时代的蓟城，隋、唐时代的幽州城，还是辽代的陪都南京和金代的首都中都，其城址都位于今北京广安门一带。在辽南京城基址上，仿照北宋汴梁宫阙制度展拓而成的金中都城，虽然“从宫城南门应天门向南，出皇城南面的宣阳门，直达大城南面的丰宜门，出现了相当于贯通全城的中轴线的一条御道”^②，可以视为北京都城中轴线之始，但是却不是《规划》中强调保护和发展的传统城市中轴线。理由很简单，一则因为，金中都城的中轴线及其轴线上的建筑遗迹，随着金中都城的消失已不复存在，旧迹难觅，无从保护和发展。二则因为，继金中都城而兴建的元大都城，并不是在金中都城的旧址上规划兴建，而是另觅新址，选择金中都城东北郊的离宫——万宁宫，并以离宫中的琼华岛及其周围的湖泊——太液池为中心，重新规划营建的一座新城。正是这座新城，开创了北京作为全中国统一封建王朝首都的新纪元，同时，也创建了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城传统中轴线的风貌奇观。

帝王都城的规划布局，为什么要突出城市中轴线？这与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方能统治天下的传统

思想有关。儒家经典《吕氏春秋》书中所强调的“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就反映了这一要求。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以《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为依据，力图将都城建成平面正方，每边长九里，每边城墙上对开三座城门，都城平面建纵横交错的街道各九条，街道广阔，能容九车并驰，都城左面建太庙，右面建社稷坛，朝廷建在都城平面南，市场建在都城北的平面格局。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城市中轴线，但这种特别讲究对称规整的布局，事实上，为城市中轴线的座标，提供了先决条件。

“世祖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宫城）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③“定大内方向”，在帝王都城规划布局中，极为重要。因为它关系到都城的四至范围，关系到宫城的方位，也关系到全城的中轴线。元大都城平面，从内到外，分别由宫城、皇城、大都城三组城墙套合而成；其都城中轴线，就是以刘秉忠指定的“以丽正门外大树为向”来划定的。这条中轴线，南以大树为起点，向北过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南门崇天门，贯穿宫城中的大明殿、延春阁，出宫城北门厚载门，过万宁桥，直抵大都城轴线北部终点“中心之台”。“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西南北四方之中也”。^④通过实测规划，于全城几何中心处，刻铭立石，以为标志，是元代大都城规划布局的创举。可惜这个标志没能幸存至今，不然的话，何至于连元大都城的中轴线究竟在哪里，它是否与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重合，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历史悬案。

关于元大都城的中轴线，传统的说法，是位于今北京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这种说法是以大都城中轴线北端正对钟、鼓楼为前提，既然元时这里有钟、鼓楼，那么城

市中轴线，就理应以此为向来确定。然而，通过七十年代对元大都城遗址的考古和发掘，又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北京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为了证实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为大都城的中轴线，首先，“按传统说法，从旧鼓楼大街向南越过什刹海，在今地安门内以西的油漆作、米粮库、恭俭胡同（旧名内官监）一带，在景山西门内至陟山门大街一带，按东西方向排探，寻找南北向的中轴大街，由北向南探了六个探卡，但均未发现元代土路……只能说这条中轴线是不存在的。然后又在今地安门大街南一线进行钻探，在今景山门北墙外，探出东西宽约18米南北大街一段，在景山公园内寿皇殿（今少年宫）前，探得一大型建筑物的夯土基址，又在其稍南景山北麓下，探得南北大街的路土。因此可以肯定，这条南北大街，就是元大都的中轴大街，它与今地安门内大街是重叠的。寿皇殿前的大型建筑基址，则是元大都城宫城北门（厚载门）的基址，就是根据这个结果，否定传统说法——以旧鼓楼大街为中轴。”^⑤通过考古发掘而得出的这一结论，已经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可。

元大都城的中轴线既已明确，下面我们就把考察的目光，转向轴线上的建筑，特别是宫城轴线上的建筑。宫城内主要建筑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面以延春阁为主体。大明殿与延春阁，成一直线，坐落在全城中轴线上。大明殿，“乃登极、正旦、寿节、会朝的正衙也”，落成于至元十年（1273年）。东西长200尺，深120尺，高90尺，雄伟壮观。建筑用材、营造制式、装饰效果，都极为精巧豪华，“青石花础，白玉石园礅，文石甃地。上籍重茵，丹楹金饰，龙绕其上。四面朱锁窗，藻井间金绘，饰燕石，重陛朱栏，涂金银正雕冒”，^⑥穷奢一时之丽。大明殿北的延春阁，建筑比大明殿还要高大，元朝统治者，常在这里举行佛事和道教的祠醮仪式和宴会。大明殿和延春阁的后面，都附建有寝殿，中间以“工”字形柱廊相联。这种以宫城为中心，通过宫城

向南北伸延的城市中轴线,从城市布局和建筑形式上,最大限度地突出了“皇权至上”的设计思想。

考察元大都城轴线上的建筑,钟鼓楼值得单独一提。因为这既关系到钟鼓楼的确切位置,也关系到钟鼓楼是否坐落在大都城宫城以北的轴线上。赵正之教授《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认为:“在我国古代都城的平面规划发展史上,……宫城后面正对钟、鼓楼的形式,始自明永乐。在明永乐以前,宫城后面多正对寺庙。金中都的宫城中面正对天宁寺。元大都沿袭了中都的形式,宫城北面的中轴,则正对大天寿万宁寺”。^⑦这一论断是否符合历史情况呢?换句话说,元大都城的钟、鼓楼,究竟与传统的北京城中轴线什么关系?1985年王灿炽先生通过查阅历史地方文献和对钟、鼓楼周围地理环境的考察,发表了《元大都钟鼓楼考》一文,得出结论说:“元大都鼓楼旧址,既不在旧鼓楼大街南口,也不在旧鼓楼大街西清虚观附近,而是正居都城之中,在宫城北中轴线上,即今鼓楼所在地”。“元大都钟楼旧址,既不在旧鼓楼大街北原明代北城墙豁口,也不在今旧鼓楼大街西小黑虎胡同内,而是在鼓楼之正北,与鼓楼相望,即在今钟楼所在地”。^⑧笔者认为,这一看法,符合历史事实。

如此看来,元大都城中轴线,不仅直接为明清北京城所承袭,而且于宫城中轴线北端营建钟、鼓楼的形式,也为明清北京城所效仿。钟楼地处大都城中轴线最北端,元至元九年(1272)始建。“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析津志辑佚·古迹》。后毁于火。明永乐十八年(1420)重建。后又几经修葺,目前的钟楼建筑形制,为清乾隆十年(1745)所奠定;通高47.95米。重檐歇山顶,上铺灰筒瓦,绿琉璃瓦剪边,内悬永乐年款大钟一口。报时的历史功能虽已丧失,但作为中轴线上的重要古建文物,仍具有很高的文物和观赏价值。鼓楼位于钟楼南约100米处,与钟楼南北相望。至元九年(1272)建,时名齐政楼。楼内设有铜壶

滴漏和鼓角,以为计时报时之用。明清两代,鼓楼经多次重修。目前的鼓楼,通高45.7米,三层,歇山顶,上铺黄琉璃瓦绿剪边。它是与钟楼配套而设的元、明、清三代北京城计时报时的古典建筑。

二、肇始于元大都的北京城中轴线,在明清时代,获得新发展,景观风貌,更加蔚为壮观。

元大都城奠基的北京城中轴线,在北京城市规划、建筑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古今中外的北京城史研究者,对此莫不交口称赞,给予极高评价。遗憾的是,经过数百年的沧桑岁月,元大都城遗迹,包括城市中轴线在内,留存至今的遗迹实在是极为有限。保存至今的万宁桥,位于什刹海东岸,地处地安门外大街中央,建于至元二十二年(1292)。因地安门俗称后门,此桥又位于地安门北,故又称后门桥。万宁桥上承来自西门水关和积水潭的水流,往下经东水关流出大都城,与通惠河相汇,为大都城最重要的通水孔道。桥下装有水闸,通过提放水闸,以便过舟止水,保证南来漕运船只直抵积水潭码头。由于明代北京航道改变,其通漕功能丧失,现今已列为北京重要文物遗迹而受到保护。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得皇位后,决定将首都南京迁至北京。他营建北京的原则是“凡庙坛、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⑨尽管城市中轴线一仍元旧,但对轴线及其轴线上的建筑,则进行了幅度较大的“规制悉如南京”的改造。明清北京城,较元代大都城中轴线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宫城轴线上,朝寝宫殿的改建。如前所述,元时宫城内,轴线上的宫殿建筑,主要有前朝大明殿和后寝延春阁南北二组。明王朝迁都北京,营建宫室,志在“更作”,元大内前朝大明殿与后寝延春阁中间“工”字形柱廊,由于明代宫城位置南移,而难以利用。至于明代宫城内以轴线为分界线的东西六宫,元时则根本不复存在。同时,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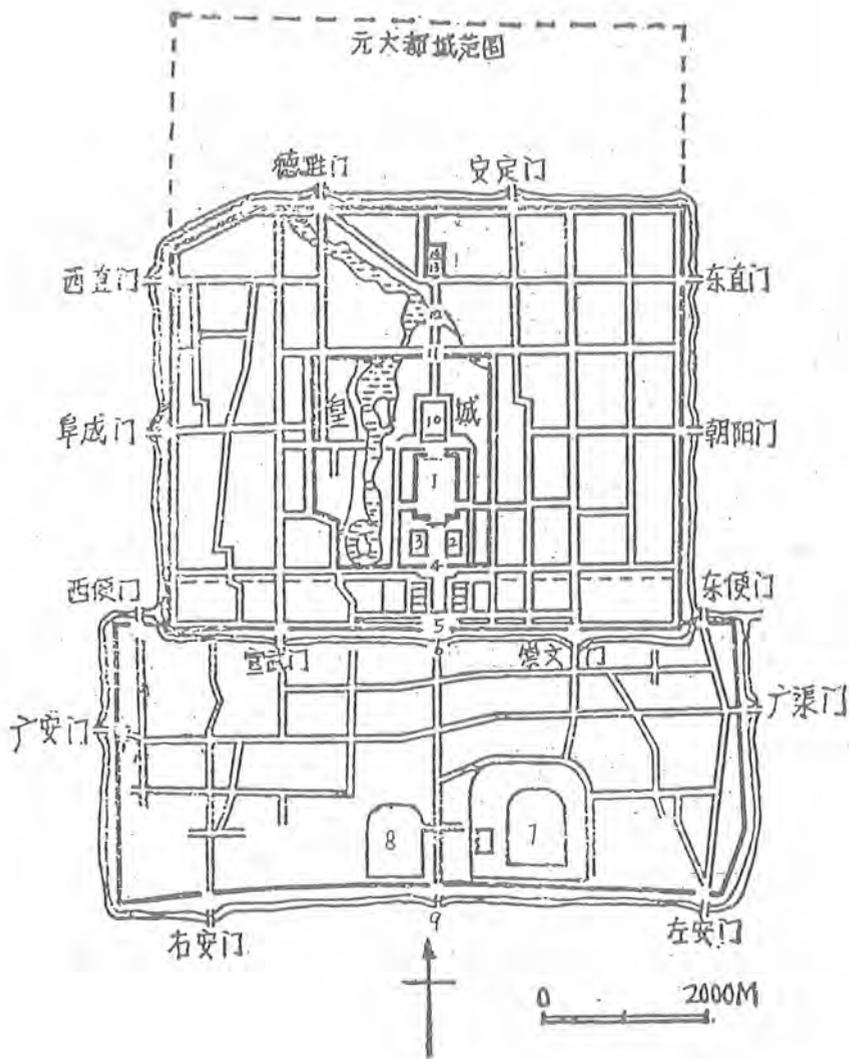
时那种朝寝相间、内外无别的格局,也很难适应汉族传统文化和永乐皇帝“敬天法祖”的要求。因此,在营建明代宫城之前,元大内轴线上的宫殿建筑群体,几乎无保留地全部被拆除。从永乐四年(1405年)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明北京紫禁城(宫城)基本落成。其宫殿布局,沿南北轴线排列,以贯穿奉天殿宝座正中的子午线为紫禁城的中轴线,并向两旁展开,左右对称。其轴线上的宫殿建筑,主要分前朝与内庭两个部分。前朝奉天殿(清代改名太和殿)、华盖殿(清代改名中和殿)、谨身殿(清代改名保和殿),因系皇帝与大臣举行各种重大朝仪盛典之场所,故建筑气势恢宏,庭院宽敞壮丽;内庭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因系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皇子、公主居住、游乐之所,其建筑布局和风格,则严谨、深邃而富有生活气息。内庭正北,紫禁城轴线的煞尾部分为御花园;园内主要建筑有钦安殿、延晖阁、御景亭等;园内古柏参天、山石嶙峋,清幽秀丽的氛围与巍峨壮观的宫殿,相映成趣,别具风采。

2. 宫城北“镇山”的出现。按照中国营建皇宫的传统,总是把依山面水作为最佳的理想选择。元宫城北,是皇家苑囿,无山可依。当时皇城之内宫城之西的琼华岛,虽称万岁山,但从地理位置上,却无法成全“依山面水”的规制。明王朝营建紫禁城时,为了实现宫城“依山面水”的布局,就把当时修筑紫禁城周围护城河挖出的泥土及当时拆除元大内宫殿的渣土,于紫禁城北堆积成山,加上宫城南开挖的内外两道金水河,遂造成宫城“依山面水”之势。这座新堆积成的土山,五峰并峙,其中央主峰恰好位于北京内城东西两垣之间,成为全城对角线的中心点和中轴线的制高点。由于主峰正好压在元大内延春阁大殿的基址之上,寓有“压胜前朝”,确保江山万年之意,故被命名为万岁山,又称“大内之镇山”。

清代顺治年间,万岁山改名景山。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在景山五峰并峙之巅,

各建一亭。从西至东,分别是观妙亭、周赏亭、万春亭、富览亭和辑芳亭。五亭之中,以主峰上的万春亭最为壮观。高17.4米,亭三重檐,上檐和中檐均为九踩三重昂斗拱,下檐为七踩重昂斗拱,黄琉璃瓦顶绿剪边,四角攒头,雄伟高大,造型优美。明清两代对皇宫北御园的悉心经营,遂使景山与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各类气势磅礴、富有皇家气魄的诸多宫阙坛庙建筑,遥相呼应,高下错落。站在主峰之巅的万春亭上,向南鸟瞰,紫禁城殿宇嵯峨,琉璃瓦殿顶熠熠生辉,天安门、正阳门以及坐落在正阳门外大街东西两侧的天坛、山川坛(今称先农坛)的雄姿,亦可尽收眼底。向北望,视线越过地安门、万宁桥,标志都城北面轴线终点的鼓楼和钟楼,历历在目。无论是从衬托紫禁城的气势,还是加强中轴线在城市规划、布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这座人工堆积而成的“万岁山”,都可称得上是最成功的杰作。

3. 轴线两侧的坛庙建筑,进一步加强了轴线建筑的内容和风采。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历代君王,都以“天子”自命,标榜“君权神授”,因此,凡祭天祀神的礼仪便非己莫属。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也依南京都城遗制,在宫城前东西两侧,建太庙和社稷坛;在正阳门外轴线东西两侧,建天地坛和山川坛。太庙,是明清两代皇家的祖庙,创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明嘉靖、万历和清顺治、乾隆年间曾多次重修。每逢大祭,如登极、亲政、大婚、册立奉安梓宫及传统祭祀节日等,都在这里举行隆重、肃穆的敬天法祖仪式。社稷坛在阙之右,与太庙东西相对,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社(土地神)、稷(五谷神),祈祷丰年的场所。所谓社稷坛,是指用汉白玉砌成的方形三层石台,坛上铺着由全国各地纳贡而来的五色土,按中黄、东青、南红、西白、北黑五个方位填实,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思。石台中央的方形石柱称为“社柱石”或“江山石”,表示皇帝“江山永固”。祀社稷原是古代的一种祭神仪式,其目的是为了祈祷丰收,后来封建帝王自命受命于天,把“社



北京城传统中轴线景观示意图

- | | | | | |
|---------|---------------|--------|--------|--------|
| 1. 紫禁城 | 2. 太庙 | 3. 社稷坛 | 4. 天安门 | 5. 正阳门 |
| 6. 箭楼 | 7. 天坛 | 8. 先农坛 | 9. 永定门 | 10. 景山 |
| 11. 地安门 | 12. 万宁桥(今后门桥) | 13. 鼓楼 | 14. 钟楼 | |

稷”看成国家的象征，每年春秋仲月特来致祭，如遇出征、班师、献俘等也于此举行仪式。元大都城的左祖右社，分别建在齐化门与平则门内，距大内较远，且宫前的御道过短。明朝规划北京宫殿时，把元大都南城墙南移，又把“左祖右社”布置在宫殿南面左右两侧，既方便了帝王的祭祀活动，更加贴近“左祖右社”的礼制，又使宫前出现了漫长深邃的空间，并利用这个空间，在大明门内，采用宋元都城的遗制，安排了千步廊，从而取得尽善尽美的设计艺术效果。天地坛，永乐十八年（1420）建于北京南郊（当时因尚未建南外城，正阳门以南即属郊外），合祭皇天后土。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恢复四郊分祭，在北郊建方泽坛祭地（皇地祇），东郊建朝日坛祭日（大明之神），西郊建夕月坛祭月（夜明之神），天地坛遂成为祭天祈谷之所，嘉靖十三年（1534），正式改名天坛。天坛内主要建筑有祈年殿、皇乾殿、圜丘坛、斋宫、神库、宰牲亭等。与天坛东西相对的是山川坛，建筑年代同天地坛。这是依据明洪武定制，在北京南郊外建立的一座祭祀太岁、风、云、雷、雨、四季月将、岳、镇、海、渎、京畿山川、天下名山大川和京都城隍诸神的场所。由于多神共处一地不符合礼制，明世宗组织阁僚礼制大辩论后，对明初洪武所定的有关礼制进行了改革，并用建筑规制把辩论的结果肯定下来。于是，嘉靖十年（1513年）七月，在山川坛内垣墙之南，出现了天神和地祇两座祭坛。至此在同一外垣墙之内，太岁、神祇、先农各有祭所的整体布局被确定下来。清代除了某些建筑稍有增拓改建之外，没有多大变化，只是由于祭祀重点的转移，山川坛更名为先农坛。先农坛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岁殿、神厨、观耕台、具服殿、神仓、庆成宫等。明清时代，由于皇帝都要选定吉日从紫禁城（故宫）起驾，沿正阳门到天坛和先农坛举行祭祀之礼，因而从正阳门往南，就形成了一条笔直的御道，直插天坛和先农坛之间。到明嘉靖增筑南外城之后，这条御道遂被延伸到外城的南门——永定门。至此，南起

永定门，经正阳门、天安门向北，穿越紫禁城，过景山、地安门、万宁桥直达钟鼓楼，长达8公里的北京城传统中轴线最后形成。（见左图）

三、北京城传统中轴线及其风貌景观，被誉为“人间奇迹”，应加强重点保护。

北京城传统中轴线及其文物景观，是经千百年都城设计规划的实践而后形成的。金中都城的规划“制度如汴”；元大都城的设计，本以《周礼·考工记》；明初国都南京，参考了宋元都城的规制，永乐时营建北京，“制度悉如南京”；清代定鼎北京，则一仍明代北京旧制，几无变化。因此，就目前北京城传统中轴线而论，可以说乃是最能体现封建社会都城设计特色的杰作。对此，中外学者都口碑甚佳，其中，以我国已故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论述最为精辟。他说：“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是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穿这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形体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的，气派之雄伟就在这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⑩这条中轴线及其文物景观，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保护方面，既有值得称赞的举措，也有令人遗憾的败笔。如轴线上的故宫、景山、钟、鼓楼，以及轴线两侧的太庙、社稷坛、天坛等，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利用，在突出北京古都风貌，体现北京城市规划特色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许多值得认真的总结和反思的。轴线北部，与天安门南北呼应的地安门消失了；轴线南部，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瓮城拆除了；被梁思成先生称之为凸字形的北京城墙，大部分也不复存在了。与天坛东西相对的山川坛，由于历史的原因，现仍被某些工厂、学校及城市居民蚕食占用，近年虽

在保护上有所进取,但真正达到能与天坛遥相辉映,再现辉煌,仍需做出极大的努力。这是就古建文物本身而言,实践证明古建文物必须保持一定的历史文物环境,才能烘托出其古建文物的特色和艺术价值,才能向人们传递某些文化信息,而人们对现代生活的需要,又常常破坏着这种历史范围所体现的气氛。不适当地兴建现代商厦,高度、体量、形式和色调都与文物建筑极不协调的现代建筑,已经对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景观,造成严重的后果。北京城市中轴线,做为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景观,因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不断引起中外学者的呼吁,要求加强保护。“尽管贯穿整个北京的南北中轴线两侧序列的完整、统一和壮丽,已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但它在紫禁城内和天坛这两组建筑的小天地中仍然存在。在这两大杰作中,人与天空的联系给人以无比丰富的感受,水平的正脊加上其顶端和檐口处的装饰变得起伏变化有致,蔚蓝色的天空,被连续不断、带有金色饰物的黄琉璃瓦照得更加浓重,这真是人间的奇迹!从景山上俯视一切,南有紫禁城,北有钟鼓楼,视线再越过辽阔的平原,消失在大自然的地平线上,这是无价的遗产。只要有一座现代化的摩天楼闯入人们的视线,就会毁掉这一历史轴线上的辉煌遗迹。”^⑩从美国著名规划师E·N·培根先生上述充满赞扬与遗憾的话语中,我们不难体察到,历史赐予北京的这条充满人间奇迹的中轴线,多么值得悉心加以保护。实践证明,如果不从城市文化价值的表现上来解决城市的规划、建设和文物保护问题,不从保护城市文化结构层次的特征来研究、解决城市空间的构成,那么对城市来说,是不会有高质量的文化景观和有特色的风貌形象的。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是从这里着眼,来保护、发展、塑造北京的风貌景观。总体规划中强调对北京城传统中轴线的保护和发展,是架构并不断完善与时代同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首都风貌的重要内容和举措,相信它一定能作为北京古都风貌保护和发展的里程碑,而载入北京城市发展的史册。

①1983年7月,国务院原则批准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经过十余年的城市建设实践,修订之后,于1994年2月又公布了1991年至2010年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本文所引,系指修订之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刊于1994年2月7日、8日的《北京日报》。

②陈桥驿主编:《中国七大古都·北京》,1991年北京青年出版社版。

③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岁纪》,1983年北京古籍出版社版。

④元·熊梦祥著:《析津志辑佚·古绩》,1991年北京古籍出版社版。

⑤单士元“北京明清故宫的蓝图”,《科技史文集》5辑,1980年上海科技出版社版。

⑥明·萧洵:《故宫遗录》,北京古籍出版社版。

⑦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1979年《科技史文集》第二辑《建筑史专辑》。

⑧王灿炽:“元大都钟鼓楼考”,《王灿炽史志论文集》,199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版。

⑨《明成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

⑩梁思成:《梁思成文集》四,“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版。

⑪“保护北京的独特风貌——历史名城与现代化建设北京国际学术讨论会侧记”,《北京规划建设》1993·3期。

(作者为北京市万寿寺艺术博物馆馆长)

〔编者按〕

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建设,是我市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发展。从1992年3月,我市建立第一批以博物馆为主体的“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至今,已先后批准五批共45家市级青少年教育基地,220个区县级和2800个校级教育基地。范围也由博物馆发展到革命文物遗址及纪念性建筑物,教育基地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为了宣传青少年教育基地,开展对基地工作的研究探讨,本刊特辟此栏目,并选编数篇文章,对青少年教育基地的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加以总结,使之更好地提高和发展。

试论博物馆社会教育作用的新发展

——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的作用

赵梅

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在文化中心所提的“文化”中包括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而这两种文化的信息都凝结储存在各类博物馆中。从远古的周口店到近、现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再到中国美术馆和中国科技馆、航空博物馆,既是历史又是文化,上下几千年横贯不同学科的文化内涵,构成北京博物馆的博大精深。北京的博物馆的特点是数量多、门类全、水平高,就象一部立体的百科全书。

博物馆它收藏的文物和标本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是历史的见证,时代越是进步,科学越是发达,文物的价值就越是具有现实意义,今天文明社会的大厦就是在最初的原始形态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今天的博物馆在建设精神文明、提

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特别是青少年的教育培养方面具有特殊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博物馆在传播文化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博物馆是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文化部门,它的收藏、陈列、研究三大职能中与社会联系最紧密的就是社会教育的职能,人们也是通过参观来了解和认识博物馆的。

北京是全国博物馆最集中的城市,同时也是博物馆观众最多的城市。据《北京博物馆年鉴》(1992年版)统计,截止1991年底,北京共有88座博物馆,年接待观众二、三千万人次,大大超过北京市的人口几倍。从北京看,没有一个外地人到北京不参观

故宫博物院,没有一个外国人到北京不参观故宫、长城和定陵。如果北京没有这些博物馆,那么北京的地位和作用将不会是今天这样。如果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没有众多博物馆来展示,那是极大的缺憾!

博物馆不仅展示历史,还展示现代和未来。北京的博物馆中还有众多的专业性博物馆、科技性博物馆,比如航空博物馆、农业博物馆、中国科技馆、美术馆等。这些展示当代本行业最高发展水平的博物馆是科技的窗口和艺术的殿堂。军事博物馆、航空博物馆是青少年学习军事知识、航空知识生动的课堂。而美术馆、艺术馆又是陶冶情操、欣赏、学习最好的场所。这些博物馆的作用是学校教育的补充,而又是学校教育不可替代、不可缺少的。

博物馆观众来自社会各阶层,其中主流可以说是广大的青少年观众,所以各博物馆都把接待的主要对象放在青少年身上。青少年求知欲强,思想活跃,如果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内容与他们所学习的课程或从事的工作有联系,他们就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特别是大学生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理解力、分析能力都很强,愿意接受更多的知识来充实自己,他们对参观博物馆更有自觉性。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同青少年求知学习的要求是一致的,也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二、博物馆是历史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的课堂,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

博物馆不同于学校课堂和社会上各种临时展览,它是以各种实物标本为基础、组织形象的展览陈列、进行直观的宣传教育。这种课堂形式使人们得到的知识避免了空洞的说教,印象更深刻,有些终生受用的知识就是青少年时代在博物馆获得的。

很多学校把生物课、自然课搬到自然

博物馆去上,或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去讲历史课,航空博物馆还先后派出高级研究员和顾问到学校讲课,馆长被清华大学和航空航天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历博为中小学历史教师举办课本中的文物知识讲座,听课教师有1000多人次。更多的学校把博物馆作为课外活动最好的场所,博物馆方面也主动配合,利用寒暑假举办文博冬、夏令营,既丰富中小学生学习假期文化生活,又增长了知识,是学生们喜爱的活动之一,也受到老师和家长们的欢迎。北京博物馆学会及许多博物馆举办夏令营、冬令营活动时,北京市政府领导亲自参加开营式,中国农业博物馆举办夏令营时,当时的农业部长何康亲自为学生讲解,说明了政府各级领导对活动的重视。几乎每一个博物馆都有一个或几个固定的中小学校作为自己的联系单位,并经常举办活动。北京市教育局也主动与市文物局和博物馆学会联系,协商共同搞好博物馆的活动,并把学生参观博物馆列为学校的教学内容。

博物馆的社教功能同学校是一致的,它应该从提高青少年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两个方面做出贡献。一般讲科技、历史类博物馆偏重于对青少年进行业务素质教育的功能,而革命遗址、纪念馆、故居、革命类博物馆则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两种功能的博物馆的存在,完善和补充了学校教育。

众多的革命博物馆、纪念馆承担着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任务,你教育青少年爱国,首先必须让他了解祖国的可爱之处。而形形色色的博物馆处处揭示着我们祖国悠久的历史,壮丽的河山,伟大的人民。博物馆犹如一幅爱国主义的画卷,使爱国主义教育从口号变为深入人心的行动。毛主席纪念堂的观众人数是除故宫以外,人数最多的博物馆,在那里人们可以获得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的教育。另外,抗日战争纪念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的参观人数比历史、科技类多,说明这些博物馆在培养祖国接班人方面的作

用。

如上所述,博物馆担负着这样全方位的教育任务。那么,衡量一个博物馆社会效益的好坏,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在向青少年进行教育方面做的工作。博物馆在发展,博物馆的作用也在发展,今天发展的主要方面就是面对青少年的工作。

三、博物馆联系社会的新形式 ——青少年教育基地

博物馆的职能还包括一个更有意义的内容,即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理想道德教育,使之德智体全面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同文化知识层次与每个人必备的知识素质相关的。博物馆具有先天的优势,在全国、在北京各类革命纪念馆、博物馆每年都接待大量观众,1990年7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时指出:现在不少年轻人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不了解,不熟悉,甚至有些年纪大的人也渐渐淡忘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必须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摘自《北京博物馆年鉴》第二卷187页)。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利用博物馆向青少年进行“两史一情”

教育的重要指示,博物馆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被赋予了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北京市利用文物古迹丰富、博物馆较多的

优势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1986年就中小学参观博物馆列入市教育培训计划之中,为贯彻落实江泽民同志关于对青少年学生进行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指示和中央六部委“利用文物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指示精神。北京市政府从在京80多个博物馆、纪念馆中选择确定了45个,命名为“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基地建立后,以基地为龙头,教育开展的有声有色,收到了卓著的成效。

被命名基地的博物馆,展览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共展出50多个固定陈列,包括“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圆明园遗址陈列”、“抗战史”、“国内战争史”等有关近、现代史的展览;有詹天佑、李大钊、鲁迅、宋庆龄、郭沫若等名人生平事迹展览。另外,各馆还举办“两史一情”教育的专题展览近30个,有首都博物馆的“两史一情”展览、“李大钊在北京展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展览”;抗战馆的“日军第731部队罪行展”、“卢沟桥沧桑八百年展览”;航空馆的“毛主席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专机展”;革命博物馆的“奉献者之歌——当代英雄事迹展”;军事博物馆的“雷锋精神谱新歌展”。这些展览题材广泛、形式灵活、事迹感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青少年教育基地的建设扩展了博物馆

联系社会的领域,同时也使博物馆做为一个整体,在发挥社会教育作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45个博物馆重视青少年观众的接待工作,与全市近百家学校建立



了固定联系,对他们采取免费接待,对其它中小学校采取免费或半价接待。各个博物馆还经常举办活动,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携带历史照片、专题录相片到学校、工厂、街道做“两史一情”系列教育讲座和革命史专题报告,这些知识讲座引起了青少年的极大兴趣。

把博物馆建成青少年教育基地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它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它开辟了博物馆建设发展的新领域。今天,面临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博物馆都在探索着生存和发展之路,寻找与社会的结合点,而青少年教育基地无疑为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机遇。几年的实践证明,青少年教育基地的作法是成功的,它给博物馆创造的效益是明显的,而博物馆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的作用更是巨

大的。

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是博物馆生命维系的关键,脱离社会,博物馆就无法生存。今天,历史和社会向博物馆提出了塑造跨世纪接班人的重任,青少年教育基地建设标志着社会对博物馆客观规律的认识更加成熟。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各地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国家要确定一批重点基地。”把博物馆建成青少年教育基地,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是深远的。

青少年教育基地使博物馆成为一个系统的青少年教育工程,为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开创了新的领域。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干部)

青少年教育基地通讯录

序号	博物馆名称	隶属关系	地址	邮编	电话
1	故宫博物院	国家文物局	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100009	65132255
2	中国历史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	东城区天安门广场东侧	100006	65128901
3	中国革命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	东城区天安门广场东侧	100006	65129335
4	毛主席纪念堂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东城区前门东大街11号	100006	65131123,65131133
5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解放军总政治部	海淀区复兴路9号	100038	66847164
6	中国空军航空博物馆	解放军空军司令部	昌平区大汤山5806信箱	102211	69784882
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丰台区宛平城内街101号	100072	63813163
8	首都博物馆	市文物局	东城区国子监街13号	100007	64012118
9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市文物局	海淀区北三环西路甲31号	100086	62550819,2550843
10	北京艺术博物馆	市文物局	海淀区苏州街万寿寺	100081	68413380
11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市文物局	宣武区先农坛东经路21号	100050	63045608
12	宋庆龄故居	宋庆龄基金会	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	100009	64044205
13	北京鲁迅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	西城区阜成门宫门口二条19号	100034	6162453
14	郭沫若纪念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	100009	66181650,66182330
15	李大钊烈士陵园	市民政局	海淀区香山万安里1号	100093	62591044,62591545
16	詹天佑纪念馆	铁道部	延庆县八达岭特区	102102	69121106,69121006

17	北京长辛店 “二七”纪念馆	北京 “二七”机车车辆厂	丰台区长辛店 花园南里甲 15 号	100072	63886355
18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中国科学院	房山区周口店	102405	69301278,69301454
19	中国体育博物馆	国家体委	朝阳区安定路甲 3 号	100101	64912167,64912164
20	中国地质博物馆	地质部	西城区西四羊肉胡同 15 号	100034	66168132
21	中国农业博物馆	农业部	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16 号	100026	65018877
22	中国科学技术馆	中国科协	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1 号	100029	64222857,64221177
23	北京自然博物馆	市科技研究院	崇文区天桥南大街 126 号	100050	67024431,67023096
24	北京天文馆	市科技研究院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38 号	100044	68353003
25	北京古观象台	北京天文馆	东城区建国门大街 裱糊胡同 2 号	100005	65128923,65242202
26	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市文物局	丰台区黄冈乡郭公庄南	100071	63816688,63816427
27	北京焦庄户地道战 遗址纪念馆	顺义县文化文物局	顺义县龙湾屯乡焦庄户村	101300	69433906
28	圆明园展览馆	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	海淀区清华北路	100084	62568872
29	香山双清别墅	海淀区香山公园管理处	海淀区香山公园内	100093	62591155—387
30	中华航天博物馆	中国航天部一分院	丰台南大红门 1 号 9200 信箱 4 分箱	100076	68384456,68384455
31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市文物局	海淀区西直门外 五塔寺村 24 号	100081	62176057
32	徐悲鸿纪念馆	市文物局	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 53 号	100035	62252042
33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	市文物研究所	宣武区里仁街 7431 信箱	100054	63054988
34	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 博物馆	市文物局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办事处	102403	69381435
35	中国长城博物馆	延庆县文化文物局	延庆县八达岭特区	102102	69121228
36	平西抗日烈士纪念馆	房山区民政局	房山区平西抗日烈士陵园 管理处	102411	69860814
37	平北抗日烈士纪念馆	延庆县民政局	延庆县龙庆峡	102109	69144469
38	天安门、国旗及纪念碑	市委办公厅	东城区天安门广场北侧	100006	65250662
39	卢沟桥(含宛平城)	丰台区宛平城 街道办事处	丰台区卢沟桥城北街 88 号	100072	63812278
40	中国古动物馆	中国科学院	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42 号	100044	6834996
41	北京市档案馆	市档案局	丰台区蒲黄榆路 42 号	100078	67645511—
42	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	市文物局	西城区北二环中路	100011	62018073
43	八宝山革命公墓	市民政局	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	100039	68215681
44	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	密云县古北口镇政府	密云县古北口镇文化站	101508	69932143
45	十三陵水库纪念馆	市水利局	昌平区十三陵	102200	69742164

北京自然博物馆

青少年教育基地工作概况

北京自然博物馆近两年来,在市科技研究院和本馆馆务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关于普及科学知识的决定,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青少年教育基地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更大进展,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先后被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授予“全国先进科普工作集体”和“科学与和平教育基地”等称号,本馆有3名业务人员被表彰为北京市先进科普教育工作者,馆内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一)适应形势,转变观念, 狠抓科普教育工作。

各类博物馆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工作,对自然博物馆来说是科普教育工作,是博物馆广泛联系

广大观众的纽带,是博物馆社会效益的直接体现。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任务就是通过生物标本的收藏和研究,举办高水平的陈列展览,向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普及科学知识,提高观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科普教育工作是自然博物馆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博物馆的生命线。特别是在目前,国家财力尚不能加大对博物馆的投入,以及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博物馆门前冷落,博物馆事业的生存和发展遇到极大挑战的情况下,自然博物馆必须进一步发挥自身的优势,强化科普教育和服务工作这个“软件”,以高水平的陈列展览和优质的科普教育和服务工作,争取观众,摆脱困境,求得生存和发展,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需要做出贡献。

为此,我馆领导同志和广大工作人员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调查,认识到必须摆脱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传统观念,寻找一条适应市场经济的路,从“高雅殿堂”中走出来,眼睛盯住博物馆的“市场”和“上帝”——观众,从博物馆的正业——科普教育入手,走出一条自己解放自己之路。通过近几年的工作实践,现在观众盈门,收入增加,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1995年观众突破了50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了300万元。1996年1月到11月底,观众已逾55万人次,门票收入已增至450万元。

(二)充实基本陈列,大办专题展览,改善参观方法,千方百计地吸引观众。

参观陈列展览,获得科学文化知识,得到休闲和娱乐,是观众来博物馆的目的。博物馆必须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新颖活泼,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陈列展览,才能吸引观众。为此,近两年来,我馆科技工作人员辛勤工作,克服困难,在古生物厅,恢复装架了已编入中、小学教科书的,但因种种原因却告别观众十年的,250万年以前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大型黄河象的化石骨架,满足了中小学教学和参观的需要。古生物厅还增加了一具长22米、高3米、体重达四、五十吨的“合川马门溪龙”大型恐龙化石。我们发挥馆藏优势,在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在京召开期间,举办了古象群化石骨架展览。十多具大型古象化石,尤其是我馆科技人员在宁夏同心发掘的两具在世界上独有的完整的珍贵的板齿象化石,引起国际地质界和古生物界专家的一致称赞。在1995年上半年,我馆备受青少年喜爱的“恐龙世界”展览,经过短期修改和补充,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增加了甲龙、恐爪龙等机械恐龙;充实了有关恐龙的科学知识,并配有讲

解员解说。在参观方法上一改以往对展品只能看、不能动的旧模式,摆出珍贵的恐龙蛋和恐龙骨骼化石供观众动手触摸。并推出可供观众动手操作的机械恐龙,以满足广大青少年的好奇心。每天还免费播放风靡西方的“侏罗纪恐龙公园”影片。1996年上半年,在本馆地下室辟建了650平方米的“水生生物馆”,包括演化厅,海洋厅和淡水厅三部分,可容纳200多种观赏鱼和若干珍稀、名贵鱼种。“水生生物馆”的建成,开拓了我馆藏品种和陈列展览的新领域。我馆举办的“人体奥秘展”,多年来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不少观众看了这个展览,懂得了人体生理和防病保健常识。

近两年多来,我馆还同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了“灾害中的应急与自救展”、“蝴蝶标本展”、“奇根艺术展”和“北京市中小学生粘贴画优秀作品展”等专题展览。1996年10月至1997年3月,还将同台中自然历史博物馆在我馆合办“鲸鱼的故事”展。这么多的专题展览和各项基本陈列,先后同时在我馆展出,琳琅满目,令观众目不暇接,留连忘返,犹如进入一座科学知识宝库,受益匪浅。虽然由于投入较大,门票上调到15元,观众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上升。

(三)充分调动讲解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讲解效果,增加讲解次数,热情为观众服务。

博物馆讲解员工作,处于科普教育第一线,是博物馆联系广大观众的桥梁,是博物馆的窗口。讲解员思想、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怎样,关系到博物馆的形象和声誉,也关系到博物馆科普教育的成效。

我馆十分重视讲解员的作用,注意调动讲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从1995年7月1日起,馆领导明智决策,全馆的陈列展览、票款等各项服务收入统归科普部管理,在经济上给科普部自主权,在完成上交馆内的收入以后,余款由科普部支配。科普部负责人果断决定,为重视讲解员的劳动,在分

配上对讲解员有所倾斜,每次讲解都给予补贴。讲解员们体会到,经济补贴,体现了馆内对讲解岗位和讲解员劳动的重视和关怀,激发和释放了蕴藏的积极性,1996年1月至9月,已接待观众42.4万人次,讲解6900次。我馆只有3名讲解员,长年累月的讲解,他们患上职业病,但他们带病坚持工作。为了提高讲解质量,讲解员挤时间读书看报、做资料卡片,使讲解内容不断充实、丰富。为了提高讲解员的业务素质,馆内组织本馆各学科专家为他们讲课,组织讲解员去本市和外地博物馆参观学习。他们一改过去那种背诵教科书式的讲解方法,用启发式的、讲故事的方法讲解。语言生动,引人入胜,使观众感到科学知识就在他们身边,在欢笑声中受到了教育。精彩的讲解迎来不少“回头客”,不少观众专为听讲解多次来馆参观。经过调查发现,有59%的观众来过两次,27%的观众来过3次,还有的观众来过7、8次甚至10次以上。有的观众同讲解员成了朋友,有些外地来京旅游的观众听说我馆的展览好、讲解好,宁愿放弃参观一些旅游点也要来馆参观、听讲解。

为了更好地为观众服务,我馆科普部改变了过去那种只给集体观众讲解,忽略了零散观众的讲解。今年科普部在展厅张榜公布各展厅的讲解时间,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讲4次,每次讲解30分钟。这种办法受到观众的好评。1996年各类报刊、电视台、广播电台记者来我馆采访或邀请到电视台、电台做嘉宾主持节目等共有120多次,涉及栏目50多个;报刊报道80多篇;电视台、广播电台播出的时间、次数已无法统计,覆盖面达到全国。

为了弥补我馆讲解员的不足,扩大宣传面,在暑假期间,我们组织护士学校、师范学校、幼儿师范和礼仪学校的30多名学生来馆志愿讲解,有的学生还能用外语向外宾讲解,得到了好评。通过讲解实践,这些学生接触了社会,得到了锻炼。同时,也部分地缓解了假期学生参观集中,而我馆讲解员不足的困难。

(四)走向社会,采用多种方式,扩大科普工作的覆盖面,充分发挥教育基地的作用。

为了扩大科普宣传,我馆业务人员走出博物馆,到中小学为学生讲授生物课和生理课100多个课时;有两名专业人员获得优秀辅导员称号。我馆与北京第一师范学校结成共建精神文明单位,经常到该校举办展览。我馆还是北航附小的校外教育基地。我馆多次聘请市区和部分郊县的生物教师来馆座谈,听取学校对我馆陈列展览的意见,并及时予以调整、改进。今年,我馆同北京市教委联合投资,将我馆的科普教育内容编入本市初中一、二年级的“乡土教材”,各中学把参观本馆陈列展览列入教学内容,配合教学定期组织学生来馆参观。我馆成为本市各中学的第二课堂,科普教育工作将收到更大成效。

为了向广大市民和外地旅游者宣传科学知识,我馆参加了北京市科协和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于今年4月22日至9月20日在西单科普画廊的科普宣传活动。通过标本、模型、图片、灯箱等展示手段,向广大群众宣传生物进化、保护物种和生态环境的科学知识。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提高了本馆的知名度,吸引了不少观众到本馆参观。

举办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是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学习方式。在1995年科技活动月期间,我馆同西城区教育局、西城科技馆联合举办了“恐龙杯”生物知识竞赛,有6000余名中小學生参赛。在教育界积极宣传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过程中,这次竞赛活动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各学校和学生家长都希望这种竞赛活动能经常举办。

今年,北京市科协和市教委为了配合“北京96中小學生爱科学月活动”,充分发挥科技场馆的优势,决定举办“北京市中小學生生物知识竞赛活动”。这项活动由市科

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

充分发挥军博青少年教育基地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陶冶他们的精神情操，如何发挥博物馆教育基地的作用，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也是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责任。

1992年4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命名我馆为“青少年教育基地”。今年11月，军博被国家教委、民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

共青团中央和总政治部等6部门命名推荐为1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几年来，我馆领导对青少年基地工作十分重视，发挥博物馆的特点和优势，认真组织青少年观众，做好接待、宣传讲解工作，以吸引广大青少年。我们从我馆的实际出发，针对青少年的特点，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学校，积极开展各种有益活动，进行“两史一情”教育，宣传党史、军战史及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努力扩大影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协和市教委主办，我馆和中国农业博物馆承办。竞赛活动的目的是贯彻国务院关于科普工作要面向青少年的指示，通过对我馆和农业博物馆的参观学习，在中小學生中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树立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的精神。1996年的“北京市中小學生生物知识竞赛”活动共由6个城区6万多名中小學生参加。这次活动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我馆青少年教育基地的作用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目前，我馆的“侏罗纪恐龙展”、“人体奥秘展”、“贝壳展”正在国内巡回展出。

我馆出版的科普读物《大自然》杂志面向全国发行，每年6期，有读者5万人以

上，深受青少年和环保工作者的喜爱。1995年《大自然》编辑部与北京市教育局合办了“鸟类知识竞赛”，对濒危物种的保护起到了很好的科普宣传教育作用。

党中央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和所通过的决议，吹响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角，博物馆将承担着更加繁重的提高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责任。今后，我馆要巩固已取得的成绩，进一步做好青少年教育基地的各项工作，为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北京自然博物馆供稿

一、充分发挥陈列优势,认真做好观众组织、接待、宣传讲解工作,是我馆开展青少年教育基地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大型综合性军事博物馆,它拥有20多个陈列厅,基本陈列有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馆、抗日战争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馆、古代战争馆、近代战争馆和兵器馆,陈列面积4万多平方米。观众沿所有展览场地绕行一周,长达12公里。陈列内容是以我党领导人民武装斗争史为重点的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军事斗争史,涉及到军事思想、军事人物、兵器知识等一系列领域,是进行国防观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很多观众通过参观,反映展览内容丰富、生动,形式新颖、形象、直观,启人心扉,给人以振奋。是一部较为形象的军事百科全书。兰州仪表厂职工大学一位教师在留言簿中写道:“展览内容太丰富了,很有教育意义,特别更适合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天津工人医院李杰留言:“学史明志,参观军事博物馆使我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得来不易,要倍加珍惜,发奋工作,报效祖国。”北京40中的学生参观展览后反映:“军事博物馆面积很大,展出内容符合现代中学政治课教育内容,很有观赏性,使人深受教育。”

军事博物馆每年接待观众100多万人次,其中工矿企事业单位的青工、部队的战士、学校的学生等约占50%。我馆很注重社会效益,门票订得很低,一张门票仅5元钱,但我们坚持对学生、军人、残疾人等观众实行票价大幅度优惠。在每年的寒假第二周、暑假第二、四周、“六一”儿童节、教师节、世界残疾日的时候,对教师、学生、残疾人免费开放。对一些受到社会关注,观众欢迎的展览,为了扩大宣传效果,我们还实行了阶段性的免费。例如:抗战50周年展览,对军人团体曾实行了5个月的免费参观。96年举办的《长征·丰碑永存》展览,10月

17日—23日免费对团体观众开放,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另外坚持做到对外宾及国内外团体观众实行免费宣传讲解,受到了中外观众的称赞。在宣传中,我馆宣传处的全体同志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展厅为依托,以基本陈列为主要宣传内容,积极配合工厂、部队、学校等开展党史、革命史及军战史学习,结合我馆的陈列内容,进行基本国情、基本路线教育。如我馆兵器馆陈列着2,000多件轻重武器和大型兵器,大到17.62米高的“东风一号”导弹,小至微型钢笔手枪;从金戈铁马到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从镇远舰铁锚到新型的导弹快艇,形象、直观地展示了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强大的历史,展示了今天的国威、军威,引起青少年观众的感奋。他们通过上飞机、登军舰、模拟操作,在融知识于趣味的陈列中受到教育。一位大学生感慨地说:“在北京最使我留恋忘返的只有军事博物馆和万里长城。”在北京市组织的青工轮训中,工矿企事业单位的青工拿着试卷到军博找答案,既丰富了军事知识,又陶冶了情操。同时,我们对学校、部队、工厂组织的新生入学、新兵入伍,党团少先队员组织生活等活动也有针对性进行宣传教育,都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二、针对青少年的特点,积极开展各种有益活动,努力扩大宣传效果

广大青少年特别是在校学生,他们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在对青少年宣传讲解中,我们针对青少年观众多、思想敏锐、求知欲强等特点,加强针对性,开展各种有益活动。

1. 针对青年学生特点,坚持用党史、军战史育人。

对集体来馆参观的青少年学生,事先我们与教师共同做出参观计划,根据教师和学生要求,我们有针对性地实施讲解,深受师生们的欢迎。针对学生独生子女多、生活优裕,但心理脆弱、怕吃苦的特点,我们在讲解中国革命发展史时,着重讲解红

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野菜の艰苦生活,从而、使同学们懂得和珍惜今天幸福生活の来之不易;针对学生组织纪律观念不强の问题,我们讲解邱少云烈火烧身、严守纪律の英雄事迹,使同学们懂得纪律是做好各项工作の重要保证;针对有些学生不大关心政治,盲目崇拜港台歌星、影星の倾向,我们以雷锋、董存瑞、赵一曼、杨靖宇、吉鸿昌等英雄人物の事迹,启迪学生爱祖国、爱人民の热忱,做“四有”新人。

2. 编写学生解说词和故事,增强感染力。

为了使小学生观众通过观众革命史陈列收到较好の效果,我们组织解说员编写了适合小学生特点の解说词,融知识性、趣味性一体,突出重点,深入浅出,形象生动。讲解时辅之于口语和启发式の提问,既能增强学生の理解力,又能提高他们の兴趣。有些解说员依据陈列内容,编写了一些生动、有趣、教育意义极深の小故事,非常受青少年观众の欢迎。今年纪念长征 60 周年,我们到挂勾学校讲长征故事,激发学生继承红军光荣传统,发扬长征精神,收到了很好の效果。

3. 举办专题展览,配合校外教育。

我馆先后举办の《雷锋精神谱新歌》、

《毛泽东光辉军事事业迹》、《中华民族の胜利》、《长征·丰碑永存》及南戴河《国防教育馆》等专题展览开幕后,观众参观十分踊跃,社会反响强烈。许多青少年在留言簿上写道:“看了《毛泽东光辉军事事业迹》展览,深深懂得:毛主席是我们の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幸福の今天。”北京崇文区少年宫组织了 20 多所学校开展の“学雷锋、学赖宁、星星火炬奔向精神文明城”主题队会,他们以军博の《理想、奉献、人生——全军学习雷锋先进事迹展览》为阵地,进行革命理想教育,2400 名学生参观展览后纷纷寄来观后感“雷锋艰苦奋斗の事迹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の高尚情操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决心以雷锋为榜样,做新时代の好少年。”

4. 举办军事冬、夏令营,丰富学生假期生活,增强学生国防观念。

为了丰富学生の假期生活,对学生进行较系统の国防知识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近些年来,我馆坚持在寒暑假举办冬、夏令营活动,收到了很好の效果。我馆与抗日战争纪念馆和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举办の 6 期军事冬、夏令营,北京市 57 中学、41 中学等 11 所学校上千名学生参加军事冬、夏令营活动。同学们通过参观军事展览,观



看军事题材的电影、专题录像、大型半景画及军事训练等,既丰富了军事知识,又受到了一次具体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举办的暑期抗战生活夏令营是融情景、情节、参与军训为一体独具特色的教育活动。夏令营以“不忘屈辱历史、振兴中华,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为主题,旨在让学生们学习、了解抗战时期沦陷历史,体验“沦陷区生活”。通过形象、逼真的场景,使小“难民们”置身于五十多年前的沦陷区生活之中,体验当亡国奴的屈辱与艰辛。优秀营员马丽洁说:“我们一定要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今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举办了“忆长征·学传统”夏令营,组织育鸿学校的300余名师生参观长征展览,开展智力竞赛活动,既丰富了知识,又陶冶了情操。

此外,我们还在增强观众参与意识上做文章,使观众更深入地了解军博的展品和文物。例如:开放024型导弹快艇,歼教5喷气式飞机,59式坦克和部分火炮、机枪等一批观众感兴趣的展品,让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满足求知欲,学习军事知识。

三、坚持走向社会、登门服务, 充分发挥教育基地的作用

我们在搞好馆内宣传教育的同时,主动到学校、部队等单位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几年来,我馆与驻地玉渊潭中学、57中学、羊坊店第一小学和羊坊店第四小学挂钩,共建德育教育基地。我们与挂钩学校定期召开座谈会,研究分析学生思想状况,制定活动计划,组织开展军训、参观展览、故事会等有益活动。同时解说员应聘担任校外辅导员,应邀到中小学校作专题形势报告,讲革命传统故事。解说员先后到北京城近郊区104所学校作形势报告,讲革命传统故事,直接听众达80,000人次。并为学校培训了200多名小故事员,深受师生们的

欢迎。

与此同时,我们与装甲兵工程学院、国防大学外训系、武警16支队等部队、院校共建德育基地。学员和战士们免费参观军事博物馆,既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又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几点体会:

1. 领导高度重视,是办好青少年教育基地的保证。

我馆被北京市政府命名青少年基地以来,馆、处两级领导十分重视基地的建设,将其列入党委、支部的议事日程,经常研究、解决基地建设中的各种问题。狠抓主业,坚持陈列展览的高品位,充分发挥军博在宣传教育的“窗口”、“阵地”和“基地”作用,使基地工作得以健康发展。

2. 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弘扬爱国主义,是青少年教育基地活动的主要内容。

革命历史类博物馆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任务必须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弘扬爱国主义,对全民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我馆在坚持搞好基本陈列宣传的基础上,配合党和军队的中心工作,举办了《人民军队忠于党》、《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华民族的胜利》等一系列大型专题展览。这些展览,从内容上看,始终围绕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坚持宣传工作主旋律,坚持正面教育;从陈列形式上看,都力求生动活泼、形象直观,以陈列艺术特有的感染力打动观众。《中华民族的胜利》展览仅开幕两个月,观众达60万人次以上,深受观众的欢迎。

3. 适应市场经济,树立“三种意识”,是青少年教育基地建设的关键。

博物馆在改革中求生存、求发展,必须转换机制,更新观念,树立“上帝”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宣传意识。

“上帝”意识,就是把观众看成是“上帝”,树立“观众第一”、“一切为了观众”的观点。衡量一个博物馆办得如何,不仅仅是藏品数量多少,而主要看为观众服务质量

的优劣,自觉把观众看成“上帝”是博物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博物馆观众滑坡的情况下,军博的观众呈上升趋势,两个效益都很好。1993年观众133万人次;1994年观众156万人次;1995年观众163万人次。这一切,一是得益于高品位的展览,二是得益于自我宣传,三是得益于我们优质服务。今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市文物局举办的“我喜爱的博物馆展览”评选活动,历时7个月,经博物馆界专家评审和广大市民投票,我馆《中国古代战争馆》获一等奖。同时,军博荣获“服务优质奖”。

竞争意识是博物馆事业发奋向上的契机。竞争是当今改革潮流的一个浪头,这个浪头同样冲击着博物馆事业。博物馆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树立竞争意识。首先,搞出高品位的展览,出拳头产品。其次,争取观众。没有观众,再好的展览内容,再先进的展示形式都不能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再次,因地制宜,搞好开发创新。几年来,我们开发地下室,由三友家具公司承租,举办家具展览,弥补了事业费的不足,多业助文,以馆养馆,促进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自我宣传意识是博物馆自身发展的需要。全国公休日的增加,旅游业的发展,为博物馆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抓住这一发展机遇,走出去,请进来,多种渠道吸引观众,与全国各大城市近200家旅行社建立了业务联系,请他们将军博纳入其旅游参观景点之中。我馆在南戴河设立《国防教育馆》,在厦门博物馆设立军博武器陈列室。同时,努力做好广告宣传工作,去年11月份我馆派人参加全国旅游会议,宣传博物馆。并在北京站、深圳电视台作广告。北京西客站开通后,我们投资上万元做广告,以争取更多的观众。今年,我们分两组赴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挖掘观众。我馆创办的馆刊《军事史林》,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深受读者欢迎。年发行量达100万册以上。去年我馆接待的团体旅游观众达16多万人次,比去年增长28%。今年团体旅游观众达18万人次。

为了把更多的观众吸引到博物馆来,我馆十分注重专题展览的前期宣传工作。主要做法是:1. 步入社会、主动上门,先后到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政府等职能部门宣传、发放材料,扩大影响。2. 掌握信息,抓住机遇,扩大宣传。在宣传上我们力争不放过任何机遇,包括外出开会、出席各种场合活动等。3. 借助新闻媒介,扩大宣传力度,在《长征·丰碑永存》展览筹备期间,我们通过广播、广告、报刊、杂志等多种新闻媒介,加大宣传,广造舆论,进一步把展览推向社会。北京广播电台先后6次宣传报道我馆,并做了现场直播专题节目。在北京站、西站分别做了大型导游广告。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旅游报等6种报刊上发消息,吸引观众。4. 设立专用咨询电话,及时为观众提供展览信息。5. 利用旅游部门,广为宣传。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前期宣传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长征展开馆两个多月,接待了有组织的团体单位近千个,观众达40多万人次。

去年5月和今年6月,随着新工时制的改革及观众旅游旺季的来临,我们适时延长开馆时间,把每天下午五点闭馆延长至五点半,多接待观众60,000人次。此举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即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也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几年来,我馆在北京市政府、市教委、市文物局等部门指导下,在发挥青少年教育基地的作用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精神与物质文明的建设和发展,青少年教育基地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大胆地去开拓、去创新,发挥博物馆的优势,发挥青少年教育基地的作用,服务于社会,培养教育青少年一代大有文章可做。我们虚心学习和借鉴其他博物馆开展这方面工作取得的好经验,充分发挥军事博物馆社会教育的功能,把军博这个青少年教育基地办得更好。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稿

〔编者按〕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又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首,拥有大量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为世人所瞩目。其中我市保存在地上和地下的石刻文物又是文化遗存中的重要部分。这些石刻文物历史悠久,延续时间长,覆盖面广,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其中也不乏珍品。但是因为此学科较为艰涩,许多精品至今还鲜为人知。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是我市唯一担负保护、陈列、研究、宣传我市石刻文物的专业性博物馆。馆领导除搞好展陈外,一直重视基础工作和对专业干部的培养与提高。从1993年起制订了科研规划,使科研工作逐步走入正轨。馆里要求专业干部要利用馆藏每年至少撰写一篇以上论文,作为年终考评的内容之一。这样,在统盘规划的指导下,馆内形成了钻研业务的环境气氛。1996年召开了论文汇报会,特邀《北京文博》编辑部出席。我刊为支持基层单位的业务工作,扶持基层业务干部的学术成长,特辟专栏。根据石刻馆学术委员会推荐,精选数篇论文,予以发表。

明房能墓志考

李巍

1995年7月,在北京动物园后高粱河北岸出土了墓志一合。此合墓志的盖和底均为青石质。正方形,边长57厘米,厚8.5厘米。志盖篆书:“明故骠骑将军右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房公墓志铭”;志底楷书,首题:“明故骠骑将军右都督府都”以下缺字。志面轻微漫漶,志底右侧及右下角呈较大面积的片状剥落。此墓志现藏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墓志撰文及书丹,篆盖人俱缺。

志主房氏,《明史》无传,只在相关章节或他人的传记中有零星的记载,从中可判断其人即房能,是一员武将。

志云,墓主人房能,字仕达,祖籍安徽

凤阳泗县。生于永乐戊戌(即十六年,公元1418)十月二十四日,卒于成化壬寅(即十八年,公元1482)六月,享年65岁。

朱元璋于淮河一带起事时,房能的祖上有叫房俊兴的,跟随张天祐(朱元璋大将之一)征战,“积功至百户(正六品武官),官河南中护卫”。其曾祖父在永乐末年、洪熙初年调怀来卫(明卫所,在今河北怀来县),又改调彭城卫(明卫所,在今江苏铜山县)。由此可见,房能是武将世家出身。

墓志云,正统年间,房能随定西侯蒋贵“征麓川贼”。

“麓川贼”是指云南麓川宣慰使(从三品)思任发。宣德三年,思任发侵入南甸州



(今云南腾冲县南)等地区,制造边疆混乱。明朝多次派人安抚,不果。“正统六年,以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云南军务,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之”;①

“正统七年,蒋贵进封为侯”;②

正统八年夏,蒋贵复佩平蛮将军印,与王骥讨思任发子思机发;③

“正统九年,王骥击走思任发子思机发,俘其孥以献”;④

“正统十年,缅甸获思任发,斩其首送京师”。……

从以上明军讨罚麓川情况来看,房能是在正统八年随蒋贵进麓川。此后即驻守云南、贵州一带四年,并官至指挥同知。

房能在驻守云南期间,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皆奇功”。《明史》中载“天顺八年,延绥参将房能言,麓川破贼,用九龙筒,一线燃则九箭齐发……”。可能这种武器就是他首先使用的。

正统十四年,房能参加了京城保卫战。“帅所部与虏敌,虏败,进指挥使,调金吾前

卫(亲军上十二卫之一)”。

志曰:“正统末,虏马犯京城……”

“虏马”是指瓦剌(蒙古部落)族军队。正统十四年八月,瓦剌首领也先入侵中原。明英宗亲征,大军溃于土木(在直隶怀来县西),明英宗被俘。十月,也先奉英宗至大同,进紫荆关,入犯京师。于谦督诸将于西直门迎敌,与瓦剌军队相持五日。这时,瓦剌的五万人马攻居庸关失败,也先“气大沮丧”,又闻勤王之师且至,“乃夜拔营循,出紫荆关”。⑤

志曰:“……景泰末,南□□方英往征湖广之铜鼓苗,……辟公以随……”。

方英,《明史》有传。景泰五年,封方英为南和伯。……第二年,湖广苗叛,拜方英为平蛮将军,率京军讨之……

志中遗缺部分应为“南和伯”之和伯二字。另外,《明史》中方英之名作“瑛”,与墓志中的“英”字有出入。

史载,景泰二年,广通王徽、阳宗王徽婚(岷庄王朱榘之子)谋逆,蛊惑家人段

友洪、蒙能等“以银印金币诱诸苗为乱”。帝废徽、徽增为庶人。其家人蒙能窜入苗中蛊惑苗民，纠生苗三万余人，攻龙里（明卫。今为县，属贵州）、新化（明守御所。今废）、铜鼓（明卫。今为锦屏县）诸城，官军屡剿不能克。景泰六年，帝命方英为平蛮将军，率京军讨之。景泰七年，方英“大破湖广苗”。

由此得知，房能随方英征湖广是在景泰六年。守湖广三年，升都指挥僉事（正三品）。

约在天顺元年，房能还京，经广宁侯刘安推荐，总管神机营训练。神机营，京军三大营之一，永乐二十二年设置。

天顺二年，经兵部尚书马昂推荐，房能充左参将，分守延绥西路（延安、绥德一带），进都指挥同知。随后“命挂靖虏副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延绥等处”。“近时，以都帅挂印者惟于公见之”。天顺末、成化初之间，房能官拜右军都督府署督僉事（正二品）。

天顺初年，元裔阿罗出、毛里孩、孛罗出相继屯牧于榆林、延绥等西北边疆之地。天顺六年，毛里孩等人河套地区。“河套者，周朔方、秦河南地。土沃，丰水草。”这三个少数民族部落互争抢水草不相让，并时时向延绥、大同等地扩张势力，屡为边患。朝



廷多次派兵缴逐毛里孩等三部落，即所谓“复套”之役。

《明史》载：“英宗天顺二年，李来、毛里孩寇延绥，总兵官张钦战，败之”。

“天顺五年冬，阿罗出渡河入套，寇延绥”。

“天顺六年，毛里孩、阿罗出、李罗忽入河套，阿罗出、毛里孩寇延绥”。

“宪宗成化元年九月，阿罗出、毛里孩大入榆林塞，都御史项忠、宁远伯任礼、巡抚都御史庐祥帅兵御却之”。

“成化三年七月，阿罗出入榆林塞”。

成化六年，宪宗考虑榆林兵力不足，派大同总兵官杨信，抚宁伯朱永前往。

房能驻守延绥的这一时期，表现亦颇不俗。

《明史》载：“成化元年八月庚寅，毛里孩犯延绥，总兵官房能败之”。

“成化元年，延绥总兵官房能奏，追袭河套部众。有旨奖劳……”。

“成化六年七月，总兵官房能败阿罗出于荒川”。

据墓志记载，因房能颇有谋略，屡屡战胜，于是朱永等还京（朱永还京一事《明史·朱永传》有载），守边之士十分希望“公克久其任”。然而《明史·白圭传》载：“成化六年，……白圭言，镇巡官偷肆，宜治，延绥巡抚王锐，镇守太监秦刚，总兵官房能俱获罪去……”；《明史·许宁传》载：“时能守延绥，无将略，……而以宁才，擢都督僉事，佩靖虏副将军印，代能充总兵官……”。

以上两事是否与志载：“有诬巡抚官者事连于公，诏罢”有关，因无据可考，姑存疑。

房能元配韩氏。子房骥是侧室张氏所生，《明实录》有传。

房骥，初袭彭城卫指挥使。成化十七年，随征大同，升都指挥僉事（正三品）、扬威营把总、寻注福建都司管事。后经侍郎周经、都御史王继推荐，充参将，协守松潘。屡

建战功，升副总兵，分守松潘。

松潘为古代氐、羌族聚居地，在今四川西川境内。唐朝广德初年，陷于吐蕃。宋时，吐蕃大将潘罗支控制，名潘州。元置吐蕃宣慰司。明朝设松州、潘州二卫所，后合为松潘卫。从明朝初年，这一地区的羌族、吐蕃族等少数民族时时与政府发生冲突。

弘治十一年，房骥升右府署都督僉事（正二品），充总兵官，挂靖虏将军印，镇守延绥。弘治十一年闰十一月乙丑卒。

房能一生征战，参与了许多历史事件，墓志提供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史料。从这些事件中反映了明朝中期统治阶级与边疆少数民族、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冲突上升到战争，对明朝政治统治是一个打击，造成了政治不安定的一个因素。而房能被罢官一事，不过是明代中期及以后众多边事处置失当的事例之一，它不仅反映了边将之间的利益冲突，也说明了明朝中期朝政的不明，造成对官员处置的随意性。

从以上分析看，房能是明朝中期颇有作为的将领之一。此合墓志的发现，将补充《明史》记载的不足，丰富《明史》传记的内容。

①③④《明史·英宗本纪》卷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3页。

②《明史·蒋贵传》卷一五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259页。

⑤《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六十八，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64页。

⑥《明史·朱永传》卷一七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22页。

⑦《明史·白圭传》卷一七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96页。

⑧《明史·许宁传》卷一七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636页。

⑨《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卷，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71页。

明故骠骑将军右都督府署 []

赐进士第左春坊 [] 读兼 []

奉议大夫 [] 国史广 []

奉政大夫 [] 华殿广平 []

， 成化壬寅六月晦 [] 指挥佥事骥以讞奏
上为之嗟悼以公昔久于 [] 竢遣礼部右侍郎
谢一夔谕祭 [] 可谓死生哀荣矣窃惟国家恩
典固有著令然崇勳念劳每于令外有锡此天覆地载
之仁嘉善劝忠之道也所以四海之内英雄之士奔奏
御侮不惜死力也哉公之 [] 予始入翰林每数
武略之将必于公屈指焉然未识公也公以病谢事乃
获亲公公貌 [] 已奇之及与谈边事一一剖悉
曰某也当守某也当攻某地当益其人某地当损其数
[] 裨深虑远计皆一时后生所弃而勿论者于是
与公交乃深边将之阙必期以公惜 [] 以公举
意以他日而公竟逝矣乌乎惜哉初公病疽于颈相知
者以公素仁厚鬼神 [] 神事未集公已饭含明
日往哭之哀骥号而前曰知先子深者吾丈也墓石之
铭志 [] 曰然斯匪予托将谁托于是为之志曰
公房姓讳能字仕达其先凤阳泗人高皇帝兵起淮甸
有讳俊兴者从元帅张天祐征讨积功至百户官河南
中护卫侍周王于开封公之曾祖也永乐洪熙间调怀
来卫又改彭城卫遂占籍于彭城至今 [] 守其
业不坠父卒公继之时年少克勤苦不避艰与人同事
无连色故一时上官多贤之正统间 [] 西侯蒋

贵征麓川贼皆奇功三转至指挥同知受白金彩缎之赐不一自是守御云贵省四年事□□□正统末虏马犯京城公愤形于色勇出于众帅所部与虏敌虏败进指挥使调金吾前卫景泰未南□□方英往征湖广之铜鼓苗嘉公骁勇有为辟公以随公克佐南和以武所至克捷升都指挥僉事守备□广者三年既还京以广宁侯刘安荐总管神机营训练复以兵部尚书马昂荐充左叅将分守延绥西路进都指挥同知由是智勇益著遂达于上乃命挂靖虏副将军印克总兵官镇守延绥等处近时以都帅挂印者惟于公见之公遇事克识先几故握兵符不轻发发必取胜填榆林几十年虏之入寇也数矣卒无失仍以功拜右军都督府署督僉事荷玉音之赞者再受恩赐之隆者三其后当毛里孩之猖獗烽燧通于各边朝廷虑榆林之罢弱乃命彰武伯杨信帅大同之卒以往又勅抚宁伯朱永帅京师之众以益然进止战守亦惟视公之谋虏竟不入二伯还于是边之□□安公之抚也冀公克久其任而公以劳惫病风湿不便鞍马矣有司以闻取公回京调治需后用公既回有诬巡抚官者事连于公诏罢公间住厚公者望公复起公闭目摇头曰休矣休矣置蔬圃于先茔侧日优游焉乐其乐者意公之久其乐也公处卒其生永乐戊戌十月二十四得寿六十五夫人韩氏克相君起家子一人即驥侧室张所出也女二人皆有归孙男一曰道宗驥英爽出类既袭指挥使复以功进令取于京营把总公之后事驥能具而精他日之就未可量也公死不瞑目哉为之铭曰

瓜瓞之绵	本细未延	嗟起昭信	县靖虏印
龔龔貂瑯	有流與台	视公之显	何才不才
万里长城	皇方倚毗	与疾则武	何哉遽归
狼焰芒芒	拊髀思士	冀公再起	嗟今已矣
郭西佳丘	公所乐游	天恩有炫	来者之功

注：□□□为碑残缺字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员)

普惠生祠香火碑及 魏忠贤

滕艳玲

明朝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专权乱政以致误国的一个典型，其中尤以魏忠贤在天启年间的权势最为显赫。在天启皇帝在位期间，他在阉党们的帮助下，逐步削弱、排挤、杀戮东林党人取得大权，以致全国上下不知畏惧皇帝和国法而畏惧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明史》）起至天启七年八月止不足二年的时间中，全国为魏忠贤建生祠达12座（《魏忠贤专权研究》）。生祠之建始于汉，主要是为那些做出突出政绩的官员或战将所建，以此表彰其不同一般的功劳，使其在活着的时候就能享受到一般人享受不到的香火供奉。除极其不凡的原因才能为同一个人建一座以上的祠堂，而能享受此殊荣的也是极少数。而魏忠贤独享几十座生祠的供奉，并不是他有多么卓越的才智和超人的政绩，而是一些无骨气的朝臣投机阿谀的结果。

在石刻博物馆藏一通“题请普惠生祠香火地亩疏”碑，记载了为魏忠贤建生祠请求香火地的史实。碑形制为螭首龟趺，通高361cm，宽115cm，厚35cm。碑阳及碑阴均镌刻有文字：（碑文见录文）

从碑阳文字可了解到，天启初年，大坨城附近马房及城池圯毁日久，魏忠贤将自己的俸禄捐出重修城池并建房舍，供当地军民居住生活。为感激魏忠贤“善行”，当地军民共同建立普惠生祠，以表彰其德行。

《明史》载，第一个倡议为魏忠贤建生祠者为浙江巡抚潘汝楨。初始之年为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而我馆所藏之碑年代却为天启四年（1624），先其二年。查证《国榷》天启四年卷八十六，上有（四月）“甲辰，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各乞祠额。礼科给事中霍守典言：‘此卹典也，在身后不在身前。在一朝为非礼之请，在皇上为非礼之予。’（皇上）不听。”可证实天启四年，已有为魏忠贤所建之生祠，并由皇帝御赐祠额。因并无更确切记载，此祠是否即为普惠生祠，不能妄断，但其年代月份完全吻合。而且该碑阴文记载在天启五年（1625）二月初六日，原御马监掌印刘（应乾）为开荒纳租以裕国之用上书，获皇帝恩准。其中提到“司礼秉笔太监魏 自捐己俸重修壩上四面围城，修筑室庐，存集编氓。是以群黎爱戴，特创生祠，盖因酬功报德之意耳。故本监（御马监）前任掌印太监刘 上体厂主之美意，下浹黔庶之舆情，随于天启五年二月初六日具 题：为开荒纳租以裕国用事……”“本月初七日，奉圣□，壩大城池为京东屏护，魏 捐俸协修，急公可嘉。赏银叁拾两，……。”可见，生祠的建成之日必然早于天启五年二月。另外《明史·魏忠贤传》中的记载，可为《国榷》中记载做为佐证：“（天启）四年，……给事中霍守典以忠贤乞祠额谏，……忠贤皆矫旨诘责。”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为魏忠贤建生祠之举必于天启四年已开始,只是正史未有确切记载,而误以导致大规模兴建生祠狂潮泛滥的潘汝楨于天启六年(1626)所建为“首创”。

从建生祠的种种原因来看,无一不假托某件为国为民之善行。如普惠生祠即因魏忠贤捐俸禄修筑城垣而建。此事为确有其事。《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卷,御马监条载:“都城东北有大壩等二十四马房,大壩城垣,逆贤重创一新。李鲁生巡青之疏所诎者是也。”但究其原因,并非为解救军民流离失所之苦,实为自己享乐。《酌中志》卷十六载:“凡逆贤出外到此(壩大城池),则于城楼上升座饮酒,至夜则花炮、巧线、盒子、烟火之类,皆在城下放看,如元宵焉。”可见,此地无非是魏忠贤及其党羽,以为民请命,为国分忧之由,而为自己所建的行宫、别墅罢了。

魏忠贤,原名不详。生于隆庆二年(1568),河北肃宁人,家贫,娶妻冯氏并育有一女。二十二岁时自阉入宫,改名李进忠,后复本姓魏进忠。忠贤之名为天启二年(1622)皇帝所赐。万历三十三年(1605)太子姬妾王才人生育,因无人办膳,魏经百般努力,进入东宫,使其命运产生转机。王才人之子也就是后来继位的天启皇帝。当时“国本之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东宫,皇太子地位飘摇,皇长孙的境遇也极不佳。而魏忠贤还尚不存发迹的奢望,只知“克勤克俭”努力办膳,讨好王才人母子以保全现有的职位。不久王才人死去,皇长孙幼年失去母亲照料,只有乳母客氏,办膳太监魏进忠前后照应,感情日深。待天启皇帝即位后,在他的心目中最信赖的人就是乳母客氏及魏忠贤。刚即位的皇帝只有15岁,尚未成年,只好对他俩言听计从。当时的投机政客,亦迅速聚集到客、魏二人周围,出谋划策,逐步使其权力欲膨胀,导致阉党之祸。他从天启五年正月到天启六年十月这二十三个月中受封赏二十次,其族侄魏良卿受封为宁国公,加恩三等。以太监之身份,魏

受封为上公这在我国历史上亦属罕见。皇帝如此恩赏倚重,一些投机拍马的朝臣便纷纷行动起来,开始大肆修建、请建生祠。如“首创”生祠者潘汝楨,在请建生祠成功后不久,就被提升为南京兵部右侍郎。

另外,应天巡抚毛一鹭在天启七年(1627)请建生祠于虎丘后,当即得到皇帝恩准,免除了当地积年拖欠中央的财政收入。

在这场建祠闹剧中,连史称清明之臣也未能免俗,如袁崇焕为了能得到皇帝恩准,也于天启七年(1627)四月同蓟辽总督阎鸣泰同颂厂臣英德,请建魏氏生祠于宁前,获皇帝赐额:“元功”。

综观建祠者身份,可理出一些线索。其中请建祠最多的是巡抚、总督一级的官员,其次为京官。这些人手中握有实权或其实际利益操纵在官场上层人物手中,而且多数为阉党骨干。对于执政者的意图领会及时而又深刻,同时互相之间的倾轧和争名夺利,推动着他们蜂拥而上,唯恐落后。最初魏忠贤自己在深夜静思时尚有些惶恐,不敢相信一篇篇奏章中所赞颂的人就是自己。但是随着此举的持续和加剧,他也就失



去了自知,以为他就是圣人,最终连阉党统治核心的治国方略亦开始横加干涉,使政权失控。阿谀奉迎对人的腐蚀是极其可怕的。魏忠贤从一个唯唯诺诺的小人变成权倾朝野的“圣人”,这个转变过程说明,若权利过份地集中于一人之时,专权的结果必然导致个人迷信和崇拜,腐蚀吏治,政治昏暗。

据苗棣同志《魏忠贤专权研究》一书中统计,全国各地建祠达九十二座,而本人查证多种文献只统计出六十余所。且记载亦不尽相同。文献中所记载的多是皇帝恩准赐额之祠,其他未请之祠数量不清。其中以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祠最多共计七所,全建于京师左近。当时京都内外遍布魏阉生祠,建筑金碧辉煌,规格不下皇宫圣殿。

《国榷》中详细记载了在京所建生祠:

(天启七年二月)总督蓟辽阎鸣泰、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各颂魏忠贤捐资抚军,发粟助赈,请祠于景忠山。报可。

(三月)都人陈文汉、吴守文等请立魏忠贤祠,许之。通州人卫万民、韩国湖等请立魏忠贤祠,赐额:“怀仁”。

蓟辽总督阎鸣泰、顺天巡抚刘诏、巡按倪文焕、梁梦环连章请祠魏忠贤于密云丫髻山,赐额:“崇功”。请立魏忠贤祠于昌平、通州。昌平祠曰“崇仁”;通州祠曰“章德”。壬辰管三山太仆寺卿何宗圣请祠魏忠贤于房山,赐曰“景德”。

(四月)蓟辽总督阎鸣泰以巡抚袁崇焕颂厂臣,请祠于宁前,赐曰“元功”。

太监刘应坤请祠,赐曰:“懋德”。

蕃育署官庶吉士李若琳等颂魏忠贤功,请祠,赐曰:“感恩”。

工部监督两山郎中曾国桢颂厂臣功,请祠于卢沟桥,赐额:“隆恩”。

(五月)顺天尹李春茂祠厂臣于宣武门外。通政司经历孙如洌请祠于宣武门侧,赐额“茂熏”。

武靖侯李诚铭颂厂臣,赐祠:“鸿熏”。山海关太监陶文请祠,曰:“广恩”。

甲寅,真隶巡按御史卢承欽请祠厂臣,

许之。

蓟辽总督阎鸣泰请祠厂臣,曰“旌功”。协理侍郎吴浮夫请祠,曰“萃德”。

癸亥,顺天巡抚右副都御史刘诏、巡按御史卓迈请祠厂臣于涿州,赐曰:“弘爱”。

上述记载共十八所生祠,而《明史》中尚记有:

巡视五城史黄宪卿、王大年、汪若极、张枢、智铤等建之顺天。

户部主事张化愚建之崇文门,曰:“广仁”。保定侯梁世熏建之五军大教场,曰:“著爱”。上林监丞张永祚建之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其祠各分别为“存仁”;“洽恩”;“永爱”。

以上六所为《国榷》中所未记,而祠名是据邓之诚所著《古董琐记全编》和《明实录·熹宗实录》补。

除此之外,尚有陆监生万龄所请建于孔庙之侧的生祠,该祠请建于天启七年(1627)三月,疏文中请求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其父魏志敏配祀启圣公。竟得到了皇帝的恩准,真正是令斯文扫地,目不识丁的太监与先贤至圣共祀,哗天下之大稽。此祠建于孔庙西侧,据《骨董琐记全编》载,国子监共建祠二所,其一名:“延绥”,另一名:“视恩”。而何为陆氏所建,有待考证。

据上统计北京一地,建生祠竟然达到25所。在一年之中,这么多的祠堂兴起在京城,也可称得上是“壮观”了。建祠的规格也是极高的,已完全不顾国法礼制。每座祠的兴建,耗资均在几十万两以上,毁推民房无数。有些祠堂,顶覆黄琉璃瓦,内立金身着冕旒像,殿宇达九重。文武百官入祀五拜三叩首,祭祀活动一次紧接一次。典礼盛大而隆重,仅迎魏之偶像入祀这一过程中,文武官员都要恭迎于郊外,行礼后乘马先导,入祠堂后列班站定,依次叩拜,礼如对天子。若论位于人臣者所获之荣誉,魏忠贤已获其极至。

盛极必衰,随着天启皇帝的驾崩,魏忠贤失去靠山。崇祯于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位,十一月初一日发布上谕,将魏忠贤

发配凤阳，家产抄没人宫。十一月初六日，魏行至阜城时，上吊自杀，时年六十岁整。轰轰烈烈的请建生祠之举，随着魏忠贤的倒台嘎然而止。不久，阉党被查处，生祠被拆毁，凡与魏阉有关的牌坊、碑刻均被拆除。当然，魏忠贤身边幸存的死党，还设法保存了部分遗物，我馆所藏这通碑，可能就是当时御马监太监所护存的。80年代到东坝中学征集此碑时，龟趺座置于厕所粪池之中，残蚀严重。这通碑为我们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对碑文及魏忠贤的了解，笔者有如下粗浅认识，若把阉党之乱完全归罪于魏忠贤和他周围的几个骨干，这未免专断，罪魁祸首应首推天启皇帝，在他这巨大的保护伞下，阉党得到袒

护，任何行为都师出有名，天下人怎能不追随其后。魏忠贤不过是某些官员为达到自己私利而运用的一个武器，以魏本人的才智，怕连宫内太监亦不能摆布。在明朝做太监已成职业，三、五岁的童子就阉割入宫，进内书堂，聪明伶俐者做太监之中的高官，最高一级司礼监掌印太监为正四品官，而在实际上却行使着相当于宰相一职的权力。可见中年人宫的魏忠贤，目不识丁兼有些头脑愚钝，若没有当今皇帝庇护，是没有什么大作为的。魏的成事纯系偶然，综观有明各朝历史后，又知其猖狂出于必然。这是有明以来，任用太监，偏信内侍所导致的恶果。

附录文：

题请普惠生祠香火地亩疏

钦差总督东厂官旗办事兼掌内府供用库、惜薪司印务、提督宝和等店、司礼监兼笔太监魏，捐俸重修大壩城垣，筑庐盖舍，存集流离，军民感荷，建立普惠生祠。钦差总督户部太仓银库、库工部节慎库兼总督勇士、四卫营军务、御马监掌印、司礼监兼笔太监涂，于天启七年四月初一日，题为厂臣为国提忠，黎庶感恩报德，乞赐香火地亩，以旌殊绩，事：臣监属壩大等二十二马驼房，为神京左臂。然衢通边境，路当要冲，且值□□作难，海宇骚然。幸厂臣丹衷为国，锐意防奸，观各马房城池坍塌，捐俸重修，复为筑庐盖舍，安栖流离，顿将荒芜之地，改为辐辏之乡，不独有便于民，而且增保障于东北矣。是以与情共悦，特为厂臣建立生祠，名曰普惠，上报皇上溥济之恩，下酬厂臣泛爱之仁。茅思焚修以垂永久，莫如专官以司香火。查得壩大城西新开牧地十顷，堪供香火。伏望天恩，俯允所请，仰乞特命该马房，将前项新开牧地岁租，径归本祠征收，专供焚修香火，仍令勒石，以垂永久。则厂臣爱国为民之心不致久而泯没，益见皇上酬功旌绩之恩深而且广矣。初二日奉圣旨：朕念壩大等马房，乃我祖宗以来设立之处，北则巩固陵寝，南则藩卫京师，□□□□□□，西以配合龙脉，实国家吃紧要地，而孳牧军需皆攸赖者。柰多历年所，颓坏废弛不堪，致一隅人民，寥寥无所栖止。今厂臣体朕固圉之深怀，愜朕诘戎之至念，慨捐己俸，锐意创修，俾雉堞崇墉，真保障有赖，克光祖制，朕甚嘉焉！览尔所奏，官员、军民人等欣欢鼓舞，既为厂臣建立普惠

之祠，若无养赡土田，曷能垂于久远？准将新开牧地拨给十顷，就着本处马房掌贴房管业征租，焚修交接，以彰 朕优眷元臣至意，以慰军民感恩报德之恩。仍勒碑垂示，不许附近势豪人等侵欺吞占，敢有抗违不遵的，即着提督等官据实参来，重处不饶。该衙门知道。钦此。

天启四年四月 日纪石。切惟京东大壩城池，自成祖设立专官，奉勅来提督，统摄二十二马驼房，东压边境，西巩神京，乃畿辅之要隘也。但壩城年久倾圮，官军似难栖止。该钦差总督东厂官旗办事兼掌内府供用库、惜薪司印务、提督宝和等店、司礼监秉笔太监魏，自捐己俸，重修壩上四面围城，修筑室庐，存集编氓。是以群黎爱戴，特创生祠，盖亦酬功报德之意耳。故本监先任掌印太监刘，上体厂主之美意，下决黔庶之舆情，随于天启五年二月初六日具题：为开荒纳租以裕国用事，查得各该马房牧马不到荒闲之地，大约共计一千五百余顷。勅下臣监，行令各该马房，除存留晾歌马地十顷，又除沙压、水占、桥梁、道路、瘠薄不堪种地外，其余堪种者，准令召抚附近军民人等自备牛刀开耕。初年开创，二年成熟，三年方征子粒，以供修理急需等因。本月初七日，奉圣□，坝大城池为京东屏护，魏捐俸协修，急公可嘉。赏银叁拾两、紵丝贰表里、新钞叁千贯、羊贰率、酒贰拾瓶，还赐勅奖励。牧地召佃三年，方征子粒。该衙门知道。钦此。今天启七年，时值三年征粮之期，该钦差总督户部太仓银库、工部节慎库、兼总督勇士、四卫营军务、御马监掌印、司礼监秉笔太监涂，劄委本监监官、掌司等官，前去各该马房，示谕开地军民，挑立封堆，插竖牌匾，眼同鱼鳞，丈量造册贮案，勒石垂久，庶无纷扰。合将丈过新开地顷亩数目于后。计开：

壩大马房新开地一百九十二顷三十五亩二分八厘，内除普惠祠焚修香火永不征粮地十顷。壩东马房新开地一十二顷四十二亩八分八厘。壩北马房无开地。驹子马房新开地四十四顷九分三厘。金盏马房新开地一十九顷四十五亩六分四厘。义河马房新开地二十八顷五十二亩七分七厘。北高马房新开地二十五顷十八亩九厘。天柱马房新开地一十二顷九十八亩。东天柱马房无开地。黄土马房新开地一百一十三顷八亩六分五厘。郑庄马房新开地一百二顷□亩六分四厘七毫。汤山马房新开地六十七顷六十一亩七分四厘六毫。北草马房新开地八十□顷四十五亩二分八厘。兔南马房新开地八顷四十一亩五分。兔北马房新开地八顷六亩八分。兔东马房新开地一十一顷九十一亩五分。兔西马房新开地四十九顷九十一亩二分。张家庄马房新开地二十五顷七十四亩一分。官庄马房新开地十顷一亩二分。杨桥马房新开地七顷四十九亩一分。胡渠马房新开地一顷七十九亩五分四厘。驼房无开地。已上壩大等十九马房，共开过荒闲地八百二十二顷四十六亩八分五厘三毫。天启七年四月 日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资料研究培训部主任）

梁启超家族墓园与石刻

明晓艳

在香山卧佛寺东山坡上，有一座占地约三十余亩，四周环有石墙的墓园。每到春夏之季园内绿草成茵、百花齐放，而隆冬时节白雪覆盖着成林的松柏，给这清幽肃静之地更增添了几分庄严。这就是19世纪戊戌变法时著名维新党人梁启超先生的家族墓园。

墓地背倚西山，坐北朝南，园内共有6座墓。在园的北面正中有砖砌平台上为梁启超及夫人李惠仙合葬墓。墓室选用土黄色花岗石雕筑而成。墓前竖立着“凸”字形墓碑，碑阳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碑阴刻“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礼，女思顺、思庄、思懿、思宁、媳林徽音、李福曼、孙女任孙敬立。”

在梁启超及夫人墓东侧有一墓碑，呈坡面长方形，碑座上雕云纹图案。碑首题镌刻“母亲树”三字，是梁启超的子女们为纪念梁公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所立的纪念碑。在墓台左前方，有梁公五弟梁启雄及梁启雄之子梁思乾之墓；右前方有梁公之子炮兵上校梁思忠和梁公之女梁思庄之墓。在正前方的甬路两侧，立有两通汉白玉螭首龟趺碑。

在墓园的西北端，耸立着一座高约4米的白色八角石亭，四面辟券门，周围建有平台，单檐绿琉璃瓦盖顶。亭内对角线长约6米，穹顶上刻有花瓣。亭中原准备安放梁启超永久性纪念铜像，后因故未成。^①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重要人物，他一生以鼓吹维新开始到潜心学术而终，在传播西学和整理中国文化遗产方面，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重要贡献。在其生前将墓址选在香山，这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和思维方式分不开的。

一、选 址

梁启超一生经历丰富多彩，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亦官亦学。晚年时在清华研究院任教授，在治学之余常到香山一带饱览风光，还曾于1922年夏到翠微山养病，他写过“癸亥长夏、秋居翠微山之秘魔岩，每晨尽开轩窗纳山气，在时鸟繁声中作书课一小时以为常”^②。梁先生还常去静宜园双清别墅，拜访在这里办“香山慈幼院”的熊希龄先生。熊希龄任北洋内阁总理时，梁启超是司法总长，二人交谊甚厚；双清别墅建在红叶区内，是赏秋的胜地。梁先生还曾探幽樱桃沟，在“鹿岩精舍”门楼旁的岩壁上写下“退谷梁启超补题”字样，这方“退谷”刻石完整地保留至今。

在梁夫人病重期间，民国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梁启超致二弟梁仲策信中说：“昨周养庵来言，在卧佛寺附近看得坟地五处，请弟与彼约一昨日先去一看，认为可用者，或径下些定钱，将来我一自看乃购可耳。”同年9月梁夫人患乳腺癌病逝后，他即购买了东沟村山地营造坟茔，主要是看重了

这块“风水宝地”。夫人归葬后梁启超还写了一篇《祭梁夫人文》，文中说：“月兮月兮为谁圆？中秋月兮，照人弃捐！呜呼！中秋月兮，今生今世与汝长弃捐！年年此夜，碧海青天。……碧云兮自飞，玉泉兮常留。卧佛千年，梦里欠伸兮微笑。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君须我兮山之同！行将与君兮长相守。呜呼哀哉，尚飨！”这里也写明了：将夫人安葬于墓室右侧，“我虚兮其左”；后来他因病逝世便与夫人合葬，灵柩安放在墓室的左侧。

二、建墓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载，墓地修建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购地、筑桥、浚井与圻内布置，由梁先生二弟梁启勋负责（当时梁思成在国外读书）。1924年9月13日，梁夫人李惠仙病逝后开始具体筹划。1925年8月16日破土，9月底完成地下工程，10月3日（旧历八月十六日）梁夫人安葬。

为建好兄嫂之墓，梁启勋在山上住了两个多月，每日跑三十多里路，顶烈日监工，两个月中仅进城三次。有时一天工作达24小时。在圻内施工时，他不放心水泥砌筑，竟别出心裁地想出了用水泥和石灰掺和在一起的“新灰”。圻内双冢，中间设隔墙，墙厚二尺余，由新灰石者制成。墙上通一窗，丁方尺许。”“开穴入地一丈三尺，圻高仅七尺，圻上培以新灰炼石三尺，再培以普通泥土，方与地平齐。”^③。他为修好兄嫂之墓，极尽辛苦之劳。

第二阶段是墓园外部工程，即墓表、墓旁别墅和墓顶工程。在梁启超殁后，由先生长子梁思成与夫人林徽音负责。1928年8月，梁思成自美国留学回国后，在父亲的安排下至东北大学任职，没想到几个月后梁公猝然而逝，为父修墓，竟成了梁思成漫长建筑生涯中的第一项工程。墓地中的八角石亭就是梁思成设计兴建的。由于经济原

因，地面工程并未全按计划进行，原拟将从没落皇族手里买来的两通废碑磨后重新刻字，也因财源枯竭无力镌刻，于是将其弃置墓园中，直到1978年北京植物园接管后，才由主管部门将石碑立起，即园中路东一通无字碑，路西一通刻有“溢文襄觉罗华显碑文”字样的汉白玉螭首龟趺碑。

墓园于1925年8月破土，1931年竣工。全部葬事及买地工程、葬仪在内共花费四仟五百余元，除梁启勋八百元外，其余由执政府夫马费项支付。

三、墓碑

1. 梁启超与夫人李惠仙合葬碑

墓碑呈“凸”字形，高2.8m，宽1.67m，厚0.70m，阳面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碑阴刻“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礼，女思顺、思庄、思懿、思宁，媳林徽音，李福曼，孙女任孙敬立。”碑前有75cm高的供台，两侧衬墙均以浅黄色花岗岩制成。前后连接，浑然一体。

墓碑未刻任何表明墓主人生平事迹的文字，是后人遵梁先生的遗愿：“将来行葬礼时，可立一小碑于墓门前，题新会某某，夫人某某之墓，碑阴记我籍贯及汝母生卒，子女及婿、妇名氏、孙及外孙名，其余浮辞悉不用”^④，即不记官职，不刻生平。

梁启超，字卓如，字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1月26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后出任北洋政府要职，晚年著书立说。于学无所不窥，于论无所不及。1929年1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57岁。

李惠仙（1869—1924年）为梁启超原配夫人，贵州人。1869年（同治己巳年）生于永定河署，为顺天府尹李朝仪之三女，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妹。1892年在京师“南河会馆”与梁启超结婚，生子女三人：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因患乳腺癌于1924年9月

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5岁。

2. 王桂荃(1886—1968)碑

王桂荃为梁启超第二夫人,四川广元人,1903年在日本与梁启超结婚,生有六个子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1968年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

纪念碑呈坡面长方形,长1.35m,宽0.65m,高0.65m,基座长1.6m,宽1.05m,高0.05m,碑座上刻有云纹图案。题首为“母亲树”,碑文:“为纪念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女士,梁氏后人今在此植白皮松一株。王桂荃(1886~1968年),四川广元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氏流亡日本时期与梁氏结为夫妻。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在民族忧患和家庭颠沛之际,协助李夫人主持家务,与梁氏共度危难。在家庭中,她毕生不辞辛苦,体恤他人,牺牲自我,默默奉献;挚爱儿女且教育有方,无论梁氏生前身后,均为抚育子女成长付出心血,其贡献于梁氏善教好学之家良多。梁氏子女九人(思顺、思成、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深受其惠,影响深远,及子孙辈。缅怀音容,愿夫人精神风貌常留此园。与树同在,待到枝繁叶茂之日,后人见树,如见其人”。

3. 梁启雄夫妇墓

梁启超五弟梁启雄(1900—1965年),为庶母叶太夫人所生,夫人赵聘贤(1900—1990年)。

墓碑呈坡面长方形,长42cm、宽35cm,高20cm(17cm)。碑上镌刻着“父梁启雄(1900—1965)、母赵聘贤(1900—1990)之墓”,落款为:“梁思乾、梁思

萃、梁思美、梁思莹敬立。”

4. 梁思乾(1925—1988)墓

梁启雄之长子。墓碑呈长方坡面形,长38cm,宽37cm,高17cm。碑面镌刻着“梁思乾之墓(1925—1988)”,落款为“守信、守方、守真、守素敬立。”

5. 梁思忠(1907—1932)墓

梁启超之四子,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逝世,年仅25岁。

碑高1.25m,宽0.65m,厚0.20m,碑阳镌刻“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八日卯时生,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酉时卒,享年二十有六”。碑阴镌刻:“亡弟炮兵上校思忠之墓。同怀兄:思成思永立”。

立碑人梁思成(1901—1972),梁启超之长子,著名建筑学家,教育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早年入清华学堂学习,1924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东北大学任教,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后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



梁启超墓园内的八角白石亭



梁启超夫妇墓

建筑史》，还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空白。

梁思成先生做为一位杰出的建筑学家，很早就致力于保护具有文物价值的各种建筑。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军准备对日本各大城市进行空袭，当时梁思成先生正参加我国战区文物保护工作，曾向美军提出日本奈良、京都城的价值，使这两座古城免遭空袭，文物古建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1946年他创建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还亲自领导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

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院部委员等职，1972年在京逝世，享年71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立碑人梁思永(1904—1954)，梁启超次子，生于澳门，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随

后赴美国人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研究东亚考古。1930年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1934年出版了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1954年因心脏病发作，4月2日在京逝世，终年49岁。灵柩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著名考古学家夏鼐说：“梁思永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

6. 梁思庄(1908—1986)墓

梁启超之二女，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1925年赴加拿大读书，1930年获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31年获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52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1980年当选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1986年5月20日因患脑栓塞久治不愈在京去逝，终年78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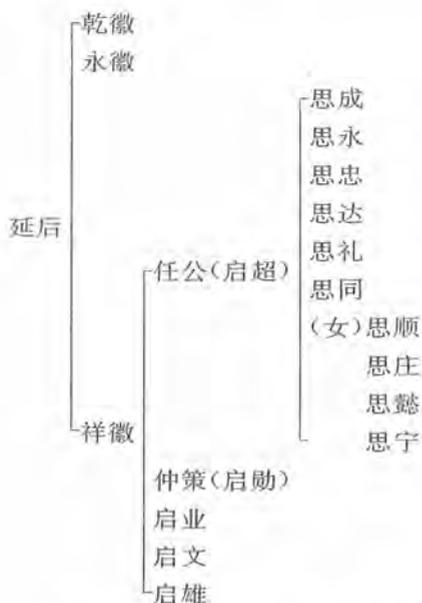
墓碑呈长方形，长73cm、宽41cm，厚10cm，碑座雕有八部巨书，独特而新颖。碑阳刻有“梁思庄(1908—1986)之墓，”碑阴刻：“女吴荔明，婿杨友麒，外孙杨念群立。”

四、家谱(从祖父开始)

在封建社会里，我国传统上持续最久，影响最大的墓地形制是家族墓地。过去京郊的家族墓地，要按男性计算世系，排列墓次，墓向统一、墓式一致、墓主之间的关系一目了然，就如同图表式的家谱一样。然而梁启超虽有家族墓园，但其子女多未葬此，其原因何在呢？首先从他于子女的关系看，从1923年至1929年梁启超去世，他的子女中有五个子女在海外，从梁启超在信中对子女们的称呼足见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

个不甚宝贝(指思成、思永)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孩子们”

.....



1922年梁启超在一次酒后,在一张纸上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1927年,梁启超得肾病,经常尿血,病中更加思念思顺,在信中他写到:“我平常想想你还自可,每到病发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象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梁启超对孩子们充满了热烈的感情,精心培养每一个孩子。

在梁启超去世后的年代中,有六个子女相继去世,即思忠、思顺、思永、思成、思庄和思宁。除思忠、思庄安葬在家族墓园中,其余四人均未葬此。原因有二,一是1978年梁思庄代表全家将此墓园和几百株树木献给了国家,现已被北京植物园开辟成郁郁葱葱的裸子植物区,墓园已做为名人景点对外开放。二是梁公的子女思成、思永逝世后被公葬于革命公墓八宝山,这本身也是一种荣誉。遗憾的是梁启超钟爱的长女思顺(令娴)在“文革”中下落不明(当时已是73岁高龄)^⑤。

五、梁启超子女近况^⑥

梁思达,梁启超第四子,1912年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校做研究生,于1937年毕业。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中国银行管理处任职,1949年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任职,后改为工商管理总局。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1972年退休,现住北京。

梁思宁,梁启超第四女。1916年生于北京,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因日军轰炸学校而失学,1940年在思懿的影响下投奔新四军。现离休,居住在山东济南。

梁思懿(1914—1988),梁启超第三女。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建国后,先后在山东医院、山东省妇联工作,后调到北京红十字对外联络部任主任,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并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逝世于北京,终年74岁。

梁思礼,梁启超第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24年生于北京。1941年赴美留学,获普渡大学学士学位及辛那提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划。1956年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梁启超的子女们都有自己的成就,用所学贡献于祖国的建设。

今天,梁启超家族墓园虽已作为名人景点对社会开放了,但似乎还未见有较全面系统的介绍材料,所以我根据实地调查和结合有关文献,就其墓园、碑刻、石刻文字等,以其特有的实物价值为人们从另一

个侧面研究十九世纪维新党人梁启超的思想文化和时代风俗提供一些佐证。

7.《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4期,市社会科学学院主办。

参考书目及注释

1.《梁启超传》李喜所、元青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2.《革命逸史》第2集。

3.《饮冰室合集·文集》2—6集。

4.《京西名墓》张宝章、严宽著

5.《卧佛寺与樱桃沟》许惠利编著,中国旅游出版社。

6.《城市规划》1986年6期,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主办。

①:访梁启超墓地守墓人江文水老人,现年76岁,家住卧佛寺东沟村,江家沟。

②《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梁启超年谱长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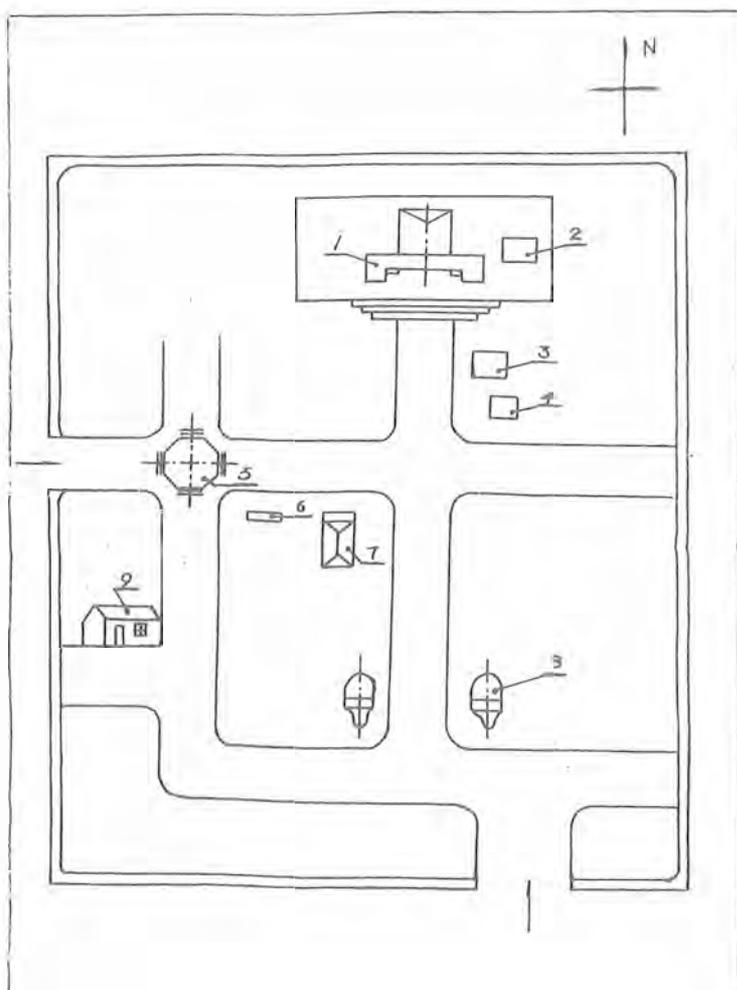
④同注释3。

⑤访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先生。

⑥《新华文摘》1991年第6期。

(作者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

梁启超墓园平面示意图说明:



1. 梁启超夫妇墓
2. 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纪念碑
3. 梁启超五弟墓—梁启雄
4. 梁启雄之子梁思乾墓
5. 石亭
6. 梁启超之次女梁思庄墓
7. 梁启超之五子梁思忠墓
8. 石碑(龟趺碑)
9. 看墓人住所

关于文物保护资金 良性循环的探索

单霁翔

人们说文物部门是“京城首富”，因为它守护着博大精深的文物古迹，珍藏着价值连城的文物瑰宝；人们说文物部门是“京城乞丐”，因为它时刻为资金短缺所困扰，“捧着金饭碗要饭吃”。的确，北京文物部门底子薄、负担重、压力大。底子薄的原因在于，文物机构组建较晚，故宫、八达岭、颐和园等利用文物古迹取得较高经济效益的旅游热点单位均不隶属于文物部门，而直属的又多为创建时间不长、发展势头较快、资金普遍短缺的文博单位。负担重的原因在干，数千处文物古迹分布在全市各地，多为砖木结构，年久失修，亟待抢救；数百万件

文物藏品，缺少良好的库房和安全的保存条件。压力大的原因在于，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文物景点和博物馆的数量与质量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每年必须新修缮开放三至五处文物景点，新建成二至三座博物馆，并不断改善开放条件，提高办馆水平，才能满足社会需求。由此看来，北京文物保护的任务十分繁重，离不开资金的巨大投入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在各行各业都急需发展的情况下，国家很难对文物保护大量增加投入；另一方面，文物事业的发展不能等待，在大规模城市建设的形势下，文物工作如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自己。当前,文物保护就是如此处于“两难”境地。面对这一状况,是固守计划经济体制下所习惯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据国家下拨经费来安排工作,业务思想停留于等、靠、要,即“干事靠计划、用钱靠财政、发展靠政府”,还是转变传统观念,认识经济规律,采取务实精神,加大改革力度,积极投身市场。实践证明,只有后者才是文物部门和文博单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和壮大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只有后者才能真正实现文物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给文物事业带来生机与活力;只有后者才能改革由政府包下来的文物保护体制,为国家排忧解难。几年来,文物部门把积极、稳妥地推进文物保护资金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工作,在实现文物保护资金良性循环方面进行了以下探索。

一、积极吸引社会资金 建立全民保护格局

文物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保护文物是社会的共同责任。实践证明,文物保护工作只有具备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才能得到全面、快速的发展。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文物工作的这一规律,面对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经济状况逐步好转的形势,文物部门及时制定了多种鼓励性政策,努力调动各方面力量,积极投入文物保护事业。初步形成了政府投资为基础、单位投资为主体、社会投资为补充的格局,广泛吸引社会资金用于文物建筑修缮。

首先,“谁使用、谁维修、谁受益”原则的贯彻落实,使大多数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建筑产权单位和使用单位,自觉承担起修缮和保护责任。如最近东岳庙、报国寺、嵩祝寺等文物建筑的修缮,都是由管理使用单位筹措资金进行的。其次,引导通过利用文物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单位增加对文物建筑的投入,为社会多作贡献。如十三陵特区近年不但投资修缮了十三陵神路、献陵、思陵,而且承担了居庸关长城和

银山塔林两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抢险修缮,总计投资近亿元;八达岭特区也为延庆县境内文物的修缮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故宫、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古建筑群的修缮,都是逐渐依靠自身财力完成的。再次,广泛吸引社会各行各业对文物事业的赞助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的捐助,近年来,利用捐助和赞助的资金,重建了圆明园园墙,修缮了慕田峪长城,建设了大钟寺九亭钟园景区,成立了中华文物修复中心。

“八五”期间,国家和市财政用于文物建筑修缮的经费共计5100万元,而社会投资达到2.06亿元,比例为1:4,有力地弥补了国家投资的不足,资金运动的主渠道已从政府转向了社会,从行政系统转向了市场,使北京文物建筑修缮和博物馆建设高潮迭起,历久不衰。仅1995年文物部门就引导社会资金6000万元左右用于文物建筑修缮,同时吸引赞助资金712万元,成功举办了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活动,筹办了“北京历史文物陈列”、“北京文物精华”、“灿烂的古燕都文化”等大型展览。

二、正确开展市场经营 发挥文物自身优势

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文物事业同其它文化事业一样被不自觉地推入市场轨道,这一事实,清楚地告诉文博单位,今天,衡量自身工作的优劣,虽然首先仍然看所发挥的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效益的好坏也比以往更加重要,因为没有坚固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效地开展好文博工作。于是越来越多的文博单位为了争取充裕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主动建立各类经济实体,积极开展市场经营,其中有些获得了成功,以经营所得弥补了事业费的不足,同时也有些项目选择不当,管理不善,结果事与愿违,造成经济损失。大量事实表明,文博单位开展市场经营,首先要认清自身的优势,努力挖掘潜力。文博系统的优势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文化珍品的收藏、展示单

位,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这些文物藏品的合理利用,就是开展市场经营的雄厚实力与基础;二是管理开放的文物古迹,历史悠久,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不但是珍贵的旅游资源,而且其拥有的数百公顷用地,数十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无疑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三是,文博单位人才荟萃,有可以充分开发利用的人才资源、知识信息资源和智力资源。

文博单位开展市场经营要处理好坚持“主业”与开展“副业”的关系。实践证明,积极扩大开放空间,引进内容健康、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展览项目;为社会提供科研信息咨询,举办专题讲座,开展短期培训;承接制作展览、出版科普图书,承办文物复制、修复及鉴定业务;建立方便观众的服务配套设施,实行有偿优质服务;开辟文物纪念品售卖场所,实行承包和租赁;合理开发建筑空间,营建短期出租的经营服务用房,这些都是文博单位开展市场经营的合理方向。文博单位开展创收经营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是为了增强文博事业的实力,因此应避免损害文博事业的市场经营活动。如为开展创收盲目引进服装售卖、家具展销、卡拉OK等与文博单位性质格格不入的经营项目,使优雅、清新、舒适的环境受到破坏;为扩大创收场地,随意拆改、分割原有建筑格局,压缩开放场地,撤消展览陈列,将场地租让给商业部门,以牺牲业务工作为代价搞创收;一味追求经营效益,忽视对本职工作的研究与提高,甚至分流专业人员,致使业务工作瘫痪停顿;忽视安全工作,经营区与展陈区、库房区交叉混杂,造成古建失火,文物被盗。

根据上述思路,北京文物部门所属各文博单位,根据不同的优势和条件,坚持正确的市场经营方向,努力开展创收活动,五年中通过创收补充事业费1510万元,其中1995年达443万元,比上年增长82%,各文博单位创收补充事业费的总数首次超过了事业费总数,有力地保证和支持了文物事业的发展,初步改变了文博单位单纯依

靠国家投入的局面。

三、科学调整投资方式 努力实现综合效益

资金短缺对于所有文博单位来说,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有限的资金和广泛的需求,过去往往采取平均主义和分散主义的投资方式,其结果是各文物景点的建设和博物馆的展览水平长期停留在较低水平。

在国家财政投资不足,文物保护任务日益繁重的情况下,如何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效益,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文物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文物部门在投资方面不断理顺投资思路,讲究投资效益,探索采取相对集中使用资金,对重点项目、抢险项目和更有利于发挥效益的项目加大投入的方式,在文物建筑修缮、博物馆建设、大型展览制作、技防设施配备等方面,注意克服平均和分散使用资金的倾向,把资金集中使用在最需要、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一是优先保证文物的安全,保证加强基础设施的资金需要;二是优先保证社会效益好、影响大的项目;三是加大对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也显著的项目的投入。如对一批地理条件优越、独具特色,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博物馆提高投资强度,充分发挥其优势,取得更大的效益。而对于那些尚不具备进一步发展条件的单位,则不盲目增加投入。

由于投资方式和结构的调整,文物部门完成了一批重大修缮项目和博物馆建设,重点解决了一些安全设施的薄弱问题,制作出一批展览精品。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更是在资金保证下,集中了各方面的优势,精心设计、施工、布展,获得了北京文化设施建设的一等奖。实践证明,没有集中,就没有规模,也就没有效益。调整投资结构、集中使用资金、分清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投资方式,只有如此,才能建设一个,成功一个,把一批文博单位推入先进行列。

四、合理探索经济补偿 确立文物资源观念

北京三千多年的城市建设历史,给今天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资源,这一丰厚的文物财富与资源为全社会共同拥有,它既是城市文化基础设施,维护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又是城市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着人们的生活环境。保护文物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每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是受益者,既有享用的权力,更有保护的义务。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对文物这一宝贵的财富,在一些人们的心目中至今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唤起保护的意识。当树木、绿地被侵占、伐毁时,人们要求对绿化资源补偿;当水渠、水库被污染时,人们要求对水资源补偿,当享受日照的权力被侵害时,人们要求日照资源补偿,那么,当人们生活的历史环境被破坏时,也完全有权力要求对文物资源给予保护。在当前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危旧房改造中,一些房地产商出于自身眼前经济利益,视历史文物建筑这一社会的宝贵财富为包袱,必欲铲除而后快,以便腾出空间建高楼大厦,谋取高额利润。于是,不少千百年积累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造成上述文物资源无偿遭受损害的原因,归咎于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传统观念的束缚和管理机制的滞后,也使文物保护领域里的资源意识难以强化。

当前,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推进,文物博物馆事业繁荣发展的今天,强化“文物资源意识”已势在必行,这是促进文物事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物事业和其它事业一样,要进入市场经济大潮,受市场规律的影响和调节,但是文物事业又不能完全由市场来选择和决定它的兴衰存亡。必须通过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诸多手段,对文物资源进行更有力的保护与调控。

近年来,由于确立了文物是资源的观

念,任何部门在进行经济活动或基本建设时,危及或损害了文物资源,就应对文物保护事业做出相应的补偿。通过这一方式,文物部门1995年争取到了745万元文物建筑抢险修缮专项资金,补充了修缮经费的不足,建设了文物资料信息中心,为四合院博物馆的建设创造了初步条件,同时,也通过这一方式,遏制了一批严重影响文物安全和景观的建设项目。

五、实行目标责任承包 落实文物专项资金

对于文博单位来说,人员、藏品、设施等规模只是提供了发展事业的条件,但是能否正常发挥效益和作出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组织管理水平。市场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综合实力的提高,不仅靠资金的硬投入,还必须靠不断加强管理的软投入,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合力。实现科学管理目标,首先必须建立起符合客观实际的管理机制。事实证明,推行目标责任承包和专项资金效益考核为中心的管理机制是行之有效的。目标责任承包制即由文博单位的法人,对该单位一定任期内的业务工作指标、经济发展目标等内容实行目标责任承包,以《聘任合同书》的形式固定下来,给予法人在管理模式、人员结构、人事用工、利益分配、运营决策、横向联合等方面一定的自主权。在合同执行期内,主管部门对合同目标完成情况逐年进行检查、验收,在财务上对各文博单位实行财务包干,核定事业经费和创收指标,对全面完成承包任务的,按成绩大小分档次给予表彰和奖励,同时对超额完成创收的单位进行奖励,返还部分金额,对不能完成年度工作指标者给予免奖或处罚,对不称职连续两年未获得合同验收合格者解除聘任职务。这一制度的全面推行,使文博单位的管理改变了工作无明确目标,责任无明确分工,经费无明确计划的局面,给文博单位管理注入活力,提高了工作的效益,也增加了自身发展能力。

在目标责任承包制的基础上,在财政部门的指导下,文物部门又实行了专项资金效益考核制度。为了加强对财政部门支持文物事业所追加的专项资金的管理,充分发挥使用效益,制定了“专项资金实行效益考核责任制办法”,凡由市财政拨款给文物部门单项在一定数额以上的专项资金,均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各文博单位在申请专项资金时,均应就用途、计划规模、实施条件、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等事项提出详细论证成果。主管部门对所申请的专项资金项目,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和财力可能统筹安排,进行可行性综合评估,按照“统筹计划,集中资金、保证重点、突出效益”的原则予以审定,并由双方法人签订“使用专项资金项目责任书”。专项资金严格按照批准的用途专款专用,单独立项核算,财政部门 and 文物部门则定期对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项目完成后,按合同规定,及时进行效益考核和验收。并对由于加强资金管理使专项资金发挥最佳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文博单位予以奖励。

1996年文物部门利用专项资金360万元,并带动自筹资金150万元,重点解决了首都博物馆、文物研究所、琉璃河文物库房等七处收藏文物数量多、等级高的文博单位的安全隐患,为上万平方米的古建安装了防火报警系统,为数千平方米的库房展厅安装了防盗、防火报警及电视监控设施,进行了围墙、防护栏等基础建设,达到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规定的风险等级标准。并签定了使用单位应在5至8年使用周期内保证设备正常运转,确保文物安全的责任书。这一相对集中使用资金,以治本为主,提高安全技术防范能力的专项资金使用方式,获得了显著的投资效果。在对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基本陈列改陈和广场整治项目

上,也体现了专项资金实行效益考核的作用。这一项目投入专项资金200万元,并带动自筹资金144万元,效益考核指标为:展览项目由5个增加到11个;展览面积由1279平方米增加到2755平方米;展陈文物数量达到400余件,馆藏文物展示利用率达到70%;完成600平方米游廊建设和5000平方米广场整治;年参观人数由不足10万人达到15万人;年创收水平不低于70万元。这一专项资金的使用,使博物馆改善了落后面貌,形成了环境优美、规模较大、展览项目既能看、能听,又有动手操作内容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专题性博物馆,总体水平达到市内一流标准。同时完善了大钟寺建筑格局,改善了城市重要街道景观,为传统的春节晚会、春节庙会、新年撞钟文化活动提供了规范宽敞的活动场地,丰富了地区文化生活,并为开辟文物监管旧货市场提供了场所。这一项目当年投入,当年完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显著的经济效益。

总之,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文物事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文物保护资金管理是文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更高的角度、更宽的视野来研究新时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索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行之有效的筹资机制、投资机制、用资机制,逐步建立起国家对事业单位新型的资金调控关系,形成以政府宏观管理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多种运营形式并存的文物保护资金管理体制,并充分利用这一体制所产生的效应,整体推动文博单位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深化,促进文物事业的发展。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高级工程师)

关于北京市文物建筑保护 工作中存在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成大生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北京又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古都北京的一个特征。上溯源头至 7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就在此生息繁衍，夏商周，这里出现了部落邦国，历史连贯而又清晰。直到辽、金、元、明、清，北京逐渐上升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在世界都城历史上的位置越发重要。正因如此，她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物建筑，保护好这些文物建筑，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又是现实对我们的要求。

明清两代为北京遗留下的文物建筑，数量之多，价值之大在我国任何地方都是无可比拟的。当然也为我们保护工作出了个大难题。明清的北京是做为封建皇帝治居之所而设计营建的。君王为主，臣民为客，君权为主，神权为客作为北京城设计的主题，一条中轴线纵贯南北，皇宫居中，坛庙苑囿、衙署寺观、市井民舍、依次对称展开，主次分明，布局严谨。城垣呈封闭式，层层相套，界线分明。郊外错落有致的皇家园林更是建筑与艺术结合的精品之作。这一

整套的建筑设计，是封建皇权思想与精湛艺术的结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保存的文物建筑多达七千余处。如著名的长城、故宫、五坛八庙、颐和园、十三陵等等，以及北京特色的四合院与王府。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为保护好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公布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政策法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同时也拨出巨资对文物建筑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尤其是全国人大 1982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是积三十多年实践经验形成的法律条文。北京市政府也颁布了文物保护法的实施细则与修缮管理办法。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文物保护工作有效的法律保障。《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在文物建筑进行保养修缮时“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这是进行文物修缮工作的一个核心问题。纵观北京地区所进行的文物修缮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是相应也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目前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又面临着

新的挑战,诸如城市改造中文物建筑的保护等等,有些问题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否则悔之不及。

我认为目前客观存在及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是:

一、客观存在的问题

1. 城市改造开发,大兴土木,高层建筑迭起,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某些文物建筑被高楼大厦包围,建筑的环境遭到破坏。如西郊大慧寺和护国寺金刚殿,它们是北京地区比较典型的明代建筑,国家也曾投资进行过修缮。现在它被高楼包围,除自身的价值外,景观已无价值可讲。又如阜成门内妙应寺(白塔寺)自拆除山门和钟鼓楼建副食商场后,大殿与白塔全被挡在商场后边,这样既破坏了原建筑格局,又失去观赏价值。故建筑环境的保护工作不容忽视。

2. 北京市由于人口、交通、工厂等因素,大气污染严重,酸雨使露天石质文物腐蚀风化程度加快,如北海、故宫、五塔寺等。就连远郊十三陵的石质文物保护状况也不能令人乐观。

3. 某些文物建筑使用单位文物意识淡薄,不遵守批准方案,盲目施工,造成不少建设性破坏。有的使用单位仓促施工,工程结束不按程序进行验收即使用等等,有法不依现象时有发生。如正乙祠戏楼,施工中不按批准方案施工,不征得文物主管部门同意,随意增加项目,工程结束不进行验收就使用,在社会上,尤其在施工企业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4. 保护修缮原则掌握不好,造成建设性破坏。使用单位在修缮时片面强调使用功能,使修缮后的文物建筑“旧貌换新颜”。如在修缮时大量地更换原构件,破坏了历史可读性;热衷于用水泥代替传统材料,虽然建筑强度增加了,可逆性却减少了,给今

后的保护修缮造成困难;有的为赶工期,不顾工程科学性,造成修缮完成再维修的恶性循环,十三陵昭陵修缮为赶工期,使用不干木材就是一例。

二、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 文物修缮管理部门(包括文物主管部门和使用单位)要在文物建筑保护政策、修缮原则、文物意识和质量意识上下功夫学习。要正确处理“保”与“用”的关系,即“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文物建筑的各种作用。同时也要从宏观看到微观,从全局看到局部,在保护好文物建筑本身的同时,也要看到重视文物建筑的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文物建筑修缮管理部门在审批修缮项目时要严把审核关、实施中的质量关。我市目前实施的修缮资质审核制度是一项保证施工质量的重要措施,这在全国尚属先例,应严格执行,总之通过努力,使管理工作尽快与国际接轨。

2. 文物建筑修缮设计部门要认真学习文物保护法,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在设计过程中既要严格按照文物修缮的原则,又要引进先进的方法与工艺。要逐步提高设计水平,深入现场,严格掌握古建修缮工程规范,研究掌握各个时代的建筑手法与特征、建筑结构与建筑工艺技术。

3. 文物建筑修缮施工企业在进行文物建筑修缮时,一定要严格质量管理,树立“百年(千年)大计、质量第一”思想,严格照图施工。目前存在工程质量粗糙、施工人员不重视技术规范,工艺上不遵守操作程序,追求产值,忽视质量,工程完成后出现“只可远看不可近瞧”的现象,确实到了应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纠正的时候了。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古建处处长)

做好

新时期文物安全保卫工作

郝东晨

一、新时期文物保护工作 机遇和挑战并存

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做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内容之一的文物事业,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新时期。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北京市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做为主要任务的第一项就是加强文物工作。“北京建城已三千余年,为五朝古都。历史之悠久、文物之丰富、特色之浓郁,在世界各大城市中是罕见的。这种文化优势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而愈显宝贵。它既是文化建设的固有环境,又是经济发展的文化根基。以保护北京地区的文物古迹、革命纪念地、历史地段、风景名胜及其环境为重点,保持和发展古都的独特风貌。”可见,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对文物安全保护,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1987年,国务院向各省(区、市)政府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对保护文物提出了许多重要要求。1992年5月,李瑞环同志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要把自己管辖范围的文物保护好。”1996年11月,北京市政府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文物工作的通知》,对今后一个时期,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政策保障。

由于社会整个大治安环境的影响,文物安全形势仍很严峻,发生在单位内部的盗窃以及盗掘古墓葬、贩运走私文物等犯罪活动越来越嚣张。他们上下串通、内外勾结、结成团伙、形成网络,形式隐蔽狡猾、手段多样化,有的趋向智能化,使用现代化的作案工具,猖狂地进行犯罪活动。近几年不断有火灾将古建筑焚毁。因此,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的形势是复杂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二、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是文物工作的生命线

随着对外开放,文博单位成为对外文化交流、旅游的重要场所。许多重要文物是难以用金钱换得的无价之宝,如果这些文物被盗窃、被破坏,其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由于思想重视不够、经费投入不足,威胁文物安全的隐患长期得不到解决。近几年发生的火灾及盗窃事故对文物造成的损失也是惊人的。如,1982年2月10日,驻万寿寺的工程兵118团家属四个小孩玩火引起火灾。烧毁西路行宫文物古建筑的正殿及东西配殿,共十五间,建筑面积约800余平方米。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周总理生前委托总政文工团保管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总谱(全国仅此一本),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珍贵的史料,四百年的建筑,是无法用钱来计算的。又如,1988年11月26日,首都博物馆在清理馆藏文物时发现6件金饰物(两件二级文物,四件三级文物)被盗。经公安机关侦破,此案系该馆保管员刘××所为。在公安机关侦破期间,该犯为蒙混过关,将6件文物销毁丢弃,使珍贵文化遗产遭受重大损失。

上述案件的发生,都是由于责任制度不落实,管理混乱,缺乏安全防范常识所致。我们文物工作者,肩负着将祖先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给子孙后代的历史责任。而且文物的不能再生性,决定了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应放在各项文物工作的首位。

三、如何做好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

1. 抓认识的提高。首先要从安全保卫工作本身的特性上去认识。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以其服务性、预防性、具体性、经常性、自觉性、强制性等特点区别于其他工作。所谓服务性,是说安全保卫工作不能离开具体的业务工作而独立存在,它是为业

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安全保障的。所谓预防性,是说安全保卫工作要做在业务工作开展之前,有备无患。亡羊补牢,是不能将已造成的损失挽回的。所谓具体性,是说安全制度需要有人去执行;隐患需要有人去检查、去消除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工作。所谓经常性,是说保卫工作要常抓不懈,经常保持警惕性,不能让隐患抬头。所谓自觉性,是说,安全保卫工作是一种保障和服务,其本身不会带来眼前的经济效益,相反,为了做好安全保卫工作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另一方面,安全保卫工作是一项细致而琐碎的工作,是只见辛苦不见功劳的工作。这种特点决定了做好保卫工作需要高度的自觉性。所谓强制性,一是来自客观规律的强制,你不做好,就要出事故,遭受惩罚;二是来自法规制度的强制,你不做好,就要受到行政的或法律的干预和制裁。

其次,要从没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给文物事业带来的危害上去认识。众所周知,文物是不能再生的,文物消失了,以文物为基础和工作对象的文物事业也就随之消失了。说安全保卫工作是文物事业的生命线是恰如其分的。

人们对文物安全保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来源于正确思想的灌输,来源于规章制度的约束,还来源于对守纪者的褒奖和对违规者的制裁。思想认识的提高,是做好文物工作的前提。只有全体职工都认识到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才能有效地保证文物的安全。

2. 抓教育的落实。从安全教育的目的看,一是要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提高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的自觉性。二是要熟练掌握安全防范的知识和技能。从安全教育的内容看,一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理论教育,二是掌握和提高安全防范技能的技术教育。从安全教育的形式看,可分为五种形式:(1)治安形势教育。及时让大家了解当前国内、市内的治安形势,从而提高广大职工的警惕性,提高对做好本单位安全保卫

工作必要性的认识。(2)季节教育。春季干燥,风大易着火;冬季夜长,人静易失盗;夏季雨多,太阳暴晒,易损坏安全设施。要教育职工根据不同季节的特点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3)机会教育。及时利用具体案例,增强安全教育的生动性。如利用火灾现场或盗窃现场召开的批评性现场会;利用在安全保卫工作中做出成绩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的素材召开的经验交流会等。(4)重点教育。针对具体工作任务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如为完成某一重大任务,重要节目,重要外宾和领导人参观活动,在北京举行的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等进行专题教育。使职工明确这些专题活动的重要意义和自己应承担的安全责任。

安全教育是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一定要抓好时间、内容和措施的三落实。

3. 抓制度的健全。如果说安全设施是文物安全保障系统的硬件的话,那么安全保卫工作责任制就是这个系统的软件。是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中关键的关键。一个单位一般应该有:各职各类人员的安全职责。防火安全制度。文物库房安全管理制度。文物展厅安全管理制度。干部值班制度。夜间警卫巡逻制度。大门警卫制度。安全教育制度。安全设施维护保养制度。奖惩制度等。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不单要告诉人们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还应该告诉人们违反制度后应承担的责任。制度的关键在于执行。无人执行的制度形同一张废纸,比没有制度更糟。认真执行制度靠领导者的决心,全体职工的自觉和规范执行的程序,三者缺一不可。使安全保卫工作形成一个有章可循、有章必循,违章必究、处罚必严的良好局面。

4. 抓习惯的养成。说安全保卫工作很重要不会有人反对。但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仍然存在。做好安全保卫工作,需要24小时全天候的警觉

性,需要良好习惯的养成,使全体职工养成工作按制度,操作按规程的良好习惯,把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化为每一个职工的自觉行动,这样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才进入了最佳的境界。

5. 抓队伍的建设。做好文物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建设一支思想作风过硬,业务素质较高的保卫队伍。这支队伍通常应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专兼职保卫干部,二是警卫人员,三是单位内部的治保会和各部门的安全员。

保卫干部的岗位举足轻重,保卫干部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单位安全工作的水平。为此,一个单位的领导一定要高度重视保卫干部的选配工作,选择那些政治可靠、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且身强力壮的同志从事保卫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对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关心他们的生活。

警卫人员在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无论是雇用保安公司人员,还是聘用临时工担任警卫工作,都要对其进行严格地政审,必须具备诚实、可靠、责任心强的基本素质。

单位的治保会和各部门的安全员的设立,就是群防群治的具体体现。他们工作在第一线,能及时发现解决问题,是领导和保卫部门的参谋助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要重视和加强治保会建设,并以此为桥梁广泛发动群众,共同做好安全工作。

6. 抓经费的投入。对文物保卫安全方面的投入,是对文物事业投入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而且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文物安全保卫的经费投入的首要性。古今中外,有许多经验教训都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用于安全防范的支出远远小于发生事故所造成的损失。防患于未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保卫处处长)

琉璃河遗址

访 谈 录

按：琉璃河遗址是我局所属的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参加的大型考古发掘项目。它持续时间长，出土内容丰富。对它的深入发掘研究，为我们认识和揭示燕都遗址的文化内涵，西周燕都的城市布局以及都城的建造、使用、废弃的年代问题，提供了依据，并将填补燕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1996年底，琉璃河遗址又传出了新的考古发现，《北京文博》编辑部的陈晓苏就此专程采访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长、遗址考古队队长赵福生先生。

陈：最近一段时间，报纸、电视几次报道琉璃河遗址考古又取得重大成果，请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二年的发掘情况。

赵：琉璃河遗址作为全国唯一的城址、居址、墓葬俱全的西周早期诸侯国遗址，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70—80年代的发掘已基本解决了琉璃河遗址就是燕国的始封地问题。但其中城垣是作为西周燕国都城的主要标志，对于它的始建和废弃年代的

认识，却存在着严重分歧。而废弃的年代问题又直接涉及西周燕都的迁徙问题，一直是燕史研究中的一个焦点。

在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工作沉寂了9年之后，自1995年秋季起至1996年底，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目的是：一、搞清该遗址的四个年代，即1. 遗址

最早年代;2. 建城建都的年代;3. 都城的使用年代;4. 城址的废弃年代。二、燕都遗址的文化内涵。三、西周燕都的城市布局。我们订了一个五年规划,力争达到以上三个目标。

陈:请先介绍一下关于城址的情况。

赵:关于城址,本次主要想解决它的始建和废弃年代及城墙的修筑方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三个地方进行发掘。第一处在东城墙北端;第二处在北城墙中部;第三处在北城墙西部(见彩插2—3)。在对这三处城墙解剖时发现,城墙分主墙和内、外护坡,主墙一般每层墙体宽2.6M左右,分段夯筑,夯土质量较好,内、外护坡夯土质量较差,城墙建筑在事先经过平整过的生土地面上,基础宽约10M。城外有护城河,河内岸距城墙外护坡约6—10M,河上口宽10—15M,底宽3M左右,深2.5—3M。在东城墙北部发现一条用卵石堆砌而成的东西向排水沟,排水沟通过城墙,系城东北部由城内向城外排水的设施。(见彩插2—3)根据沟里残存的陶片和排水沟的修造方法分析,这条排水沟应与城墙同时建成。

在北城墙的内护坡上,发现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小墓,打破城墙内护坡,其葬式、方向均同于78M²,推测应与某种筑城仪式有关。城墙内护坡多被西周晚期灰坑打破,城墙夯土内和护城河下层堆积出有少量西周早期陶片,说明城墙的修筑年代为西周早期,但不会早到晚商。护城河内被含有西周晚期陶片的淤土填满,起码说明最晚至西周晚期,城墙已不是燕国都城的城墙而护城河也已经淤满,此时的燕都已经迁徙到别的地方。

陈:请介绍一下西周燕都遗址的文化内涵。

赵:所谓的文化内涵,就是西周时期燕国的文化面貌是什么,比如说,在武王灭商封召公于燕,召公来之前,这里应是商人统治区,商人来之前,这里就有世代居住在燕地的土生土长的人民,他们的生活习俗、生

产、生活用具各具特点,这些特点反映在考古学上,我们称之为文化内涵。

为了解燕都遗址的文化内涵,对城内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共清理发掘了2000M²,其中灰坑100多座,多为西周早、晚两期,共出土了数万片陶片,可复原的在数十件,部分器物制作精美,如仿铜器的云雷纹陶簋,椭圆形磨光黑陶壶,高70CM。颈部还饰一圈三角形刻划纹,形制与铜壶相近(见彩插2—3)。还有一些陶器,如:鼎、鬲、簋,也有明显的仿铜器作风,有的还装饰有仿铜花纹,制作水平很高。还发现铸造青铜器的陶模、陶范及残铜渣。在西周时期,根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只有诸侯国国都这一级别的遗址中,才可能有这样的青铜器铸造遗址,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琉璃河遗址应为西周燕都所在地。

在这次发掘中,出土的陶器最多,主要器类有:鬲、鼎、盆、豆、罐、甑、壶等,以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多。这批材料可以使我们较全面的认识西周时期燕文化的全貌,由于燕国的特殊地理位置而产生了较复杂的文化因素,既有周文化的因素,又有商文化的因素,还有较强的土著文化因素。而到了西周晚期,这里的文化因素远没有早期复杂,基本都是中原地区西周中晚期常见的器物。这些变化反映出燕文化的发展,变化轨迹,也反映出各种文化融合的过程。这些器物的年代均为西周早、晚期,而未见早于西周早期的遗迹。这也明确的显示出西周燕都城内在召公封燕之前无人居住、活动。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城址的修筑年代不会比西周早。

陈:关于西周燕都的城市布局方面,近两年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收获?

赵:关于西周燕都城内布局,96年以钻探为主,已在城内中部偏北部探出几片夯土,在这几片夯土南部发现了制作精美的仿铜陶器,陶质排水管,背部带有钻、凿的卜甲、卜骨、整只用于祭祀的牛(见彩插2—3)……这些都明确的表明,这几片夯土应为西周早期的燕侯宫殿遗址。那么,在西周

燕国都城的布局上是将燕侯宫殿区规划在城市的中部偏北处。

陈：看报道，96年最重要的发掘收获是发现了带字甲骨，在琉璃河遗址中是不是首次发现，意义是什么？

赵：确实如您所说，这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在琉璃河遗址中首次发现带字卜甲。这些卜甲是在96年11月底清理96G11H108灰坑时发现的。共发现数片龟腹甲片，均有凿、灼。其中三片卜甲上有文字，共八个字。在此之前，全国发现西周甲骨文的遗址仅六处。其中有一片龟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上面刻有“成周”二字，更具有明确的时代意义（见彩插2—3）。

据文献记载，武王伐纣两年后有疾而终，成王立，由周公摄政七年。周公摄政期间，由召公选定位置，周公营建洛邑“成周”，在成王五年时，“成王初迁于成周”。也就是在这时才有“成周”，这个名称。遗址中发现的带有“成周”二字的甲骨，其文字的写法，如“周”字是“田”字中间加四点，和龟甲背部的方凿的形式，都具有典型的西周早期特点，年代上不应早于成王时期，亦不会太晚。并且这个出带字甲骨的灰坑在遗址中是属于时代最早的单位之一，因此对于研究西周燕都的建城时间及夏商周断代工程，都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陈：您提到夏商周断代工程，能不能给简单介绍一下？

赵：这个问题最合适的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李学勤先生，他是四位首席科学家之一，并担任专家组组长。

最具有发言权。我只不过是参加者之一，这里只能根据我所知大概介绍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项由政府支持、专家学者参与、学术团体公布的国家重大科研课题，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为世人所公认。中国文明自远古以来绵延传流，没有中断，更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迄今没有比较完整可据的年代学标尺。文献中可依据的绝对年代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更以前的年代则众说纷纭，不能得到公认，只能依靠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

建国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夏商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深入，碳十四测年技术在精确度方面的提高，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加之现代科技运算手段，这一切为各学科联合攻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工程的最终目的是测定夏商周比较准确的年代或年代框架，将中国古代编年史前推1500年左右，填补我国夏商周编年史的空白。

工程共设十大课题，每个大课题下又设若干子课题，我们“三家联合考古队”承担第七个大课题（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下的子课题：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目前一切进展顺利，以后如有重大发现，将随时通过贵刊发表。

陈：谢谢！

（作者赵福生为琉璃河西周遗址博物馆馆长）



有关北京 近代文物的一些认识

李淑兰

北京是一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有着众多的分属不同时期与不同类别的文物资源,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文物是一种物态的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有其历史内涵与时代特征。

我国近代时期(起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末期)大体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阶段,包括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历史。近代时期,北京先后是全国与华北地区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又是著名的商业都市。北京近代文物充分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体现其多方面的城市职能。

一般说来,文物是指遗存在地面上或埋藏在地下的历史文化遗产。由于距今时间尚短,近代文物多为地面上保留的文化遗存。北京近代文物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类具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或艺术价值的遗物。其中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有关的建筑物、革命遗址或遗物、反革命罪证、有代表性的科学文化设施、名人故居和遗物、遗迹、艺术家的作品、民间工艺精品等等。第二类反映近代时

期社会生产与生活的代表性的实物。诸如旧时手工作坊、厂房、店铺的遗址与遗迹;近代的生产工具、契约、铺保、货币;反映社会生活习俗的遗物;有代表性的家庭生活用品等等。第三类具有学术价值或收藏价值的档案、报刊、图书、文稿、谱牒、照片、票据等文字和图象实物等等。

北京有许多近代文物,象颐和园、北京大学红楼、双清别墅……还有多方面的大量的遗址和遗物,从不同侧面标记着北京近代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也反映着我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概貌。

不同地区和城市的历史发展均有其自身特点,决定着不同地区和城市文物的特点。我们只有把握文物的特点,才能使其更准确、深刻地反映历史;同时对历史的准确把握,反过来也才能更充分地体现文物的自身价值。归纳起来,北京近代文物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政治性的文物占很大比重。

如前所述,北京在我国近代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社会两大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焦点集中地。这是北京近代时期政治性文物居多的根本原因。



圆明园遗址

我国近代时期,北京是遭受西文侵略的重点地区。列强通过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途径一步步控制了这座城市,尤其是三次大规模的军事侵略行动,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大量的文物向人们无言地控诉着侵略者的罪行。圆明园遗址留下了英法侵略军的罪证。鼓楼上被破坏的更鼓记载着八国联军的暴行。宛平城墙上的累累弹痕,成为日寇蓄意发动侵华战争的铁证。日本在北京进行长达八年的殖民统治,实行“三光政策”,推行强化治安运动,连边远山区的居民都不放过。京西斋堂乡所属川底下是一座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庄,始建于明末清初,那里有数十座建筑规范、做工考究的四合院,在全国实属罕见。然而在这里的民居建筑群中人们看到了遭受日机轰炸的残垣断壁,至今犹存。离川底下不远的王家山村,在1942年日寇制造了“双十二”惨案,村民被关在一间屋内活活烧死,全村40余人遇难,多为妇女与儿童。

北京先后是清朝王室、北洋军阀、国民党官僚政客盘踞的城市,不少建筑物是一个世纪以来,我国政治岁月沧桑的见证。象坐落在张自忠路东口路北的一座院落(原铁狮子胡同一号),本属清朝王公府第。慈

禧当政时,用修建颐和园的余款在府内建造了东西两组西式楼群。它们先后成为清末海军部和陆军部署址、北洋政府的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曾在此发表就职演说。这里还曾作为段祺瑞的执政府,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执政府门前。北洋政府倒台后,改为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部所在地。1937年以后被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及日本侵略机关兴亚院占有。抗战胜利后改属国民党高等警官学校及河北省政府所在地。直到北平和平解放,才由人民政府接管,改为中国人民大学校舍,至今还存留着当年的水牢遗迹。

我国近代历史上有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在北京,与其相关有不少历史名人在京留下遗迹。如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又驱逐溥仪出宫。后因段祺瑞入京主持政务,排挤冯玉祥,11月下旬冯玉祥一度隐居京西天太山慈善寺。冯玉祥曾三上天太山,留下六处摩崖石刻^①,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近代历史上有多次重大的民族、民主运动发生在北京,或在北京形成高潮,又波及到全国。象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反帝爱

国运动等等。辛亥革命期间，北京革命党人主要斗争手段是暗杀权贵要人，也有一些革命党人在北京创办报刊、组织革命力量，并且酝酿发动武装起义。“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北京传播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爱国民主运动，充分体现出北京是一座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城市，有着大量的历史遗迹可以寻觅。

第二，北京近代文物集中体现京味文化的独特内涵。

当代人们心目中认定的京味文化实际指的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北京地域文化，

它包含着长期的历史积淀与多元的文化融合。人们对京味文化的认识往往来自于近代文物，包括实物与大量的图片。

京味文化是由宫廷、官绅、庶民文化诸多层面构成的。宫廷与官绅文化中有一些来源于民间文化，象有些祭祀礼仪和生活习俗均可溯源于传统的民间习俗。反之，宫廷与官绅的礼仪及生活习俗对京都的百姓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推进了这三种文化的结合。明清两代，“紫禁为警蹀之地”，普通百姓只能“窥遥天咫”而“无从亲历”。民国建立后，皇家禁地相继开放，先后辟为博物院和公园，“凡昔日帝后游幸场所，今成为市民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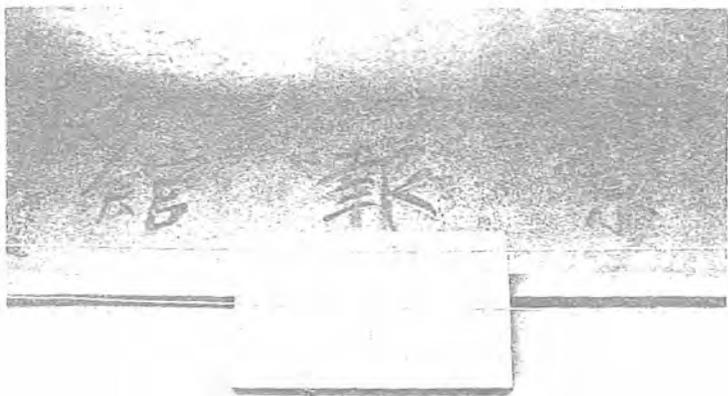
北京四合院

乐之地。”^②由此决定北京的游览胜地不同于江南园林奇景，更有别于山川自然风光，它具有独特的皇家风范，在壮丽中显出庄严，秀美中显出肃穆。现在展示的“旧京”照片大多摄于民国年间，成为北京近代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北京民居多为四合院落，建筑布局的特点是内外隔绝，自成天地。据《旧京琐记》载：晚清时京城大户人家的院落廊深院广，有天棚、鱼缸、石榴树。夏日以绿色冷布糊窗，内施以纸帘，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这种居住环境给人以恬静、舒适之感。不少海外游子离京数十载，虽然享受着现代化的居住条件，依旧眷恋着幽深的胡同与宁静的四合院。至于贫穷编户组成的大杂院，“家占一室，萃而群居”，尽管不如单门独户清静，但是彼此“共处既

久，疾病相扶，患难相救，情同一家”。由于各阶层的住户有着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富户人家室内陈设硬木桌椅、古玩字画，可谓风雅备至。贫民居室仅有炕桌、杌凳、荆条器、元宝形的筐，却显得质朴无华。它们共同组成了“老北京”的文化氛围与生活乐章。

北京是一座商业发达的城市。受文化古都的长期熏陶，商界具有一种儒风，从商人学识、经营思想、经营内容，到店铺招幌，市井风貌均有体现，尤以琉璃厂文化街最为典型。以北京的店铺牌匾为例，现在见到的老字号店匾大多写于晚清或民国时期，且多出于名家手笔。翁同龢书写《宝古斋》书画店匾，“此额运笔丰厚，骨力遒劲，相当苍劲雄浑，毫无馆阁之滞，实为匾中之魁”^③。其它还有书法家吴昌硕书写的《清秘



阁》、华世奎手书《福德厚》、陈云浩所书《清华园》、钱子龙所书《全聚德》、于右任所书《永安茶庄》等等，称得上“书体各异，风格多样，奇姿异彩”。《一得阁》匾额乃该店创始人谢崧岱自书，可见北京一些商人自身文化素养是比较高的。名家题匾荟萃街头成为一大文化景观，是北京市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晚清时期，宫廷所需工艺制品大多由民间手工作坊制作。杨天利、德兴成等景泰蓝作坊和继古斋雕漆作坊均有上乘制品，曾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还有晚清兴起的地毯、抽纱、刻瓷、内画壶等都具有精细娴熟的技艺。一批民间艺人象面人郎、风筝哈、葡萄常的作品雅俗共赏，流传至今仍受到各阶层民众的喜爱，在国际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道光年间形成的皮簧戏(后称京戏)深受皇室、官绅及平民百姓钟爱。在官苑、王府、会馆和繁华街市建有戏楼或戏院，创作一批优秀剧目，涌现出“同光十三绝”、“四大名旦”等著名演员。民国年间在五方杂处的天桥开设一些小戏园，还有芦苇搭成的“振华大戏棚”，是平民的娱乐场所，身怀绝技的艺人云里飞表演滑稽二簧，带给下层民众无穷的欢乐。

总之，从大量的多种类型的北京近代文物，诸如一处宫苑、一座民居、一件生活用品、一幅商店牌匾、一种民间工艺品、一张民国老戏单……，都散发出浓郁的“京味”。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什么是“京味”文化？我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既有物质方面的内容，也有精神方面的内容，共同构成其外部表征。透过外部表征还应揭示其蕴藏的内涵，也就是深层的文化。北京历史文化是地方文化的荟萃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结合。但是，如上所述，京味文化的核心是由宫廷、官绅、庶民三种文化的结合体构成的。它以独特的文化表征，即庄重、和谐、儒雅、细腻、悠闲等五大表征区别于其它地区及城市的文化。透过五大表征的剖析，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着“礼”、“精”、“逸”三种内

涵。本文限于篇幅就不作详细论述了。

第三，反映古近并存、中西混杂、新旧对立的时代特征。

近代时期的北京同全国一样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为了适应西方侵华势力的需要，他们将某些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移植到中国，移植到北京。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固有的封建经济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西方近代文明伴随着刀光剑影传入北京，以牺牲我国诸多主权为代价。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因此北京没有、也不可能沿着正常的近代化轨道前进，而是沦为了一座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呈现古近并存、中西混杂、新旧对立的状态，在近代文物中有明显的反映。

近代时期的北京城市建设最能直观地反映这一时代特征。在大片陈旧的四合院平房中间掺杂着一些西式建筑，主要集中在使馆区的公使馆、外国银行和洋行，还有大量的教堂。这些西式建筑大多有其政治背景，标志着西方列强在北京攫取到的特权。另有一些西式建筑用作政府官署、医院、学校、商业或娱乐场所。辛丑回銮以后，清政府还在西苑内建起西洋式的海宴堂。上述这些建筑不能作为北京近代化的标志，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一些点缀。

在北京的社会经济生活当中，传统的手工作坊、老字号店铺和旧式金融机构仍占主要地位。行会组织和封建生产关系依然存在，同业公会机构与雇佣制度也已出现。进入20世纪以后，相继建立了一些近代工矿企业、新型商场和新式银行。如果能够征集和保存这段时间的契约、帐簿、汇票、当票、会规、厂房和机器的遗迹或照片，它们都是珍贵的文物，对研究北京近代经济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于居民日常生活中，20世纪以来，社会上层人士比较多地接触到近代物质文明，有越来越多的人仿效西方的生活方式，存在一种追求时髦的社会心理。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社会心理是

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北京进一步半殖民地化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民国时期在北京可以看到长袍马褂与西服革履并存、兽力车与机动车并存、油灯与电灯并存、土井水与自来水并存、旱烟袋与洋烟卷并存。然而,这些从西方国家引进的近代物质文明在北京传播的范围有限。受经济条件的局限,主要是在上层社会传播,直到民国年间,北京城乡广大下层民众仍按传统的方式生活。另外,近代物质文明的传播还受到封建等级思想和保守意识的制约。清朝统治者害怕“冲了大清朝的龙脉”,最初禁止在离京40里范围内修建铁路。19世纪80年代,西苑内修了一条小铁路,不用机车牵引,改由太监用绳子拉车。现今在颐和园内的德和园殿堂中展示一辆“奔驰”第一代汽车,是当年德国赠送给慈禧太后的。她只乘坐一次后就搁置不用,因为慈禧不能容忍汽车司机坐在她的前面驾驶。

北京的近代文物有大量内容是反映文化生活的。官学、书院、藏书楼等遗址,金榜、进士题名碑等文物表明北京在我国封建时代文化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自19世纪下半期起,近代的教育、科技、新闻、图博等文化事业相继出现,象京师大学堂、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京报馆、中央医院等在北京近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均被列为文保单位。20世纪初,话剧、电影、西洋音乐登上北京文艺舞台。我国第一部自拍影片诞生在北京,1905年北京琉璃厂丰泰照相馆摄制的戏曲片《定军山》,由名伶谭鑫培主演。这是传统艺术内容与新的艺术形式的最初结合。

新旧文化的对立与斗争贯穿近代社会的始终。北京是“五四”时期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科学与民主、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以后,北京在我国最先开展民俗学的研究;民国期间一批反映现实的进步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产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大众的革命文化的发展,这些都属于北京近代文物着力反映的内容。

应该说,北京近代文物有其鲜明的特点和丰富的内涵,它们是展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向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因此,充分利用北京近代文物资源,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近些年北京地区的文保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对于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卓有成效。相比之下,古代文物受到较大重视,对于近代文物的保护、利用还显不够。为此,我想对北京近代文物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

第一、加强对北京近代文物的调查、征集与研究工作。

不少人往往把近代文物等同为革命文物。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近代文物内容之广、数量之多要超过古代文物。当人们去川底下参观时,感到整个村子就象一座博物馆,那里不仅保留有明清时期的四合院,还保存着清式家具、民国时期的家具和生活物品。这些对于当代的青年人已感到新奇与陌生了。在现在人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忽视近代文物的价值,而且还有不少近代文物散落在民间,如若不加保护,再过几十年就可能难寻踪迹了。因此,提高群众的文保意识,开展普查与征集近代文物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文物是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不仅为古代史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对近代历史的研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近代时期北京是西方教会势力活动的主要地区。位于京西的百望山一带今日还有不少基督教徒,附近有基督教的敬老院和陵园。笔者走访那里看到被废弃的法国圣母院大堂,经人指点找到了一块宗教刻石,已被当地人用来掩盖阴沟。据说附近还有传教士的墓。我想如果在这一带进行深入调查,可能会发现更多的遗迹或线索。这些宗教文物有助于北京基督教史的深入研究。

第二、充分发挥文物的自身价值,扩大其宣传和教育的效果。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对自己居住的环境、或是经常走过的地方，并不完全了解。象居住在卢沟桥畔龙王庙内的住户，说不出“七七”抗战时29军战士与日寇在此激战的情景。1937年8月22日，平西国民抗日军奇袭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营救出500余名政治犯，投入抗日斗争。现今居住在功德林一带的居民，根本不知道半个世纪以前当地曾发生过一次近似传奇式的斗争。如果我们能在每座革命遗址和历史遗迹处树立标牌，详加介绍，就可以汇集起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增加这座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城市的历史厚度，教育后代会起到极好的效果。

对于有重要价值，且文物内容比较丰富的遗址，应该开辟展览室或展览馆，并且对外开放。原北京大学红楼在人们心目中是民主革命圣地，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但是目前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该将红楼恢复原貌，对外开放，才能真正体现其文保单位的价值。

位于天安门以南的东交民巷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街巷，在近代历史上蒙受了重大的耻辱。根据《辛丑条约》^①规定，西方列强在这里划定了使馆界，取得了东交民巷的行政管理权和驻兵权。西方公使团在这里策划了一件又一件干涉中国内政的罪恶勾当。至今还留有不少历史遗迹。据已故东城区文管所谭伊孝所长的调查，现存重要的西方列强侵华罪证多达十余处，包括外国兵营马厩、地下牢房、外国银行金库、残存的使馆界墙及墙上的枪孔、书写有“Rue Hart”（赫德路）的路牌……^⑤。这一切把人们的记忆带回到中国人民饱受屈辱的年代。我认为假若在东交民巷开辟一处展室，以沙盘模型、图片、文字说明其历史，再结合几处遗址参观，它的教育效果决不亚于

圆明园遗址。如果再同天安门、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组成整体的参观路线，会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

北京是座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城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留文化古都的风貌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以宣武区为例，该区向有北京的历史摇篮之称，会馆、戏院、名人故居、老字号店铺比比皆是。但是宣武区街道狭窄、危房改造任务艰巨、市政设施陈旧，因此进行现代化的规划建设势在必行。在此情况下，保存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物遗址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重点修复，并且在此基础上设专题性的博物馆，将有关遗物、图片、文字资料集中一处展示，象会馆、名人故居等均可采取这种做法。至于有一些老字号店铺，由于街道拓展或房屋改建，已失去昔日的面貌。不妨在新的店堂内专辟一角进行店史展览，向顾客展示自身的创业史，介绍经营的特色。使顾客在购物中受到启示，增长历史知识。同时会给老字号店铺带来最佳的“广告”效益。

①参见吕品生：《冯玉祥在天太山》，载于《文史资料选编》第38辑。

②《旧都文物略·宫殿略》，北平故宫印刷所中华民国二十四年版。

③杜莲成主编：《北京新老字号名匾荟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第1页。

④《辛丑各国和约》第七款、附件十四，载于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一册第1006、1017—1018页。

⑤参见谭伊孝：《北京东交民巷》一文所附图片，载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西藏,位于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南边陲。她那绮丽的高原风光,纯朴的民族风情和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文化,常令世人心驰而神往。她的三面与祖国的内陆省份相连,西接中亚及印巴次大陆,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渐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地。

藏传佛教及其造像艺术,是西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不仅凝聚着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而且是中外及藏汉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结晶。

中国密教如以传播的地域及政区划分,一般是分为汉地、大理(南诏)、藏传三大传承系统。藏传密教的初期是通过汉地和印度等地,分两路传入的。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藏传密教渐次



藏 传 佛 教

及其造像艺术

对北京地区

的影响

邓丁三

形成了独立的体系和传承,元朝时通过蒙古族的人主中原,始影响到汉地。

一、藏传佛教的东渐及在北京等地的弘传

元初,蒙古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窝阔台第三子阔端亦率军深入藏区。当时萨迦派四祖班智达·贡噶坚赞出于维护该教派与整个藏区的利益,于1247年应邀与阔端在凉州会晤。此举不仅确立了萨迦派在西藏代行统治的地位,也使蒙古皇室开始信奉其教法,并由此影响到内地。

1251年,萨班和阔端先后谢世,八思巴就任座主。为巩固萨迦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他于1253年在六

盘山会见了忽必烈，并为其授喜金刚灌顶，从而深得忽必烈的欢心。1259年忽必烈夺取汗位后，遂被封为国师，得以统辖藏区及全国的佛教事务。1270年八思巴被封“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造文字、辅治国政、王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自此，元代在朝廷专设帝师一职相沿不变。据《元史·释老传》和诸帝本纪中的记载，萨迦派自八思巴以降，先后继任帝师者达14人之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亦怜真。

亦怜真是八思巴同父异母的兄弟，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八思巴重返大都时，其曾接任萨迦寺住持。但不久以后他也到了大都，并且当上了元世祖供养的大喇嘛。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八思巴再次归藏之后，他替代了帝师的位置。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卒于大都。亦怜真在大都期间，曾亲自主持了大圣寿万安寺白塔的设计和建造。对于这一史实，多年来似乎已被研究北京史的学者们所忽略了，而更多被提及的则是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据《至元辨伪录》记载，他主持设计的白塔是根据密教仪轨，以佛身、语、意三密分为三层设置。按照佛“身密”的原则，在塔底部铺设石函，上面镌刻有五方佛、八大鬼王、八大梵王、四王九曜和十方天龙，并在复钵之体安置诸圣形象，构成曼荼罗。其中包括十方诸佛、三世调御、般若佛母、大白伞盖及尊胜、无垢净光、摩利支天、金刚摧碎、不动明王、金刚手、文殊和观音菩萨等；按照“语密”，塔中安置《佛顶》、《秘密宝》、《无垢》、《菩提场庄严》等密典百千余部；复按“意密”，在钵外雕塑五方佛及四方契印，东方单杵、南方宝珠、西方莲花、北方交杵，并于四维间侧置四大天母所持契印。此外，还在塔内放有用名山圣迹之土掺合各种香药宝物所塑小香塔十万余座。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在阿尼哥协助下，这座规模宏大的藏式白塔终于落成，且得到忽必烈的赞许。

元朝初年，本来佛道两教在全国均有所发展。道教更因丘处机之功而见重于帝后汗王。后道教以老子化胡之说到处打击

佛教势力，而以少林寺僧福裕长老为首则申奏朝廷全力抗争，终于引发两教之争。1257年，蒙哥令忽必烈主持了两教化胡辩论大会，《至元辨伪录》记述了八思巴与道士间一段极精彩的辩论。最后，因道士们不是八思巴的对手，辞屈告负，被尚书姚枢如约行罚，将参加辩论的樊志英等17名道士，一律送至龙光寺削发为僧。全国道教所占佛教寺庙237处，均还给佛家。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元初道教的优势地位，并且使得藏密各派在内地传法前后达数百年。

藏传佛教诸派中以格鲁派的形成为最晚，但发展却最快，在汉地的影响也最大。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公元1357—1419年）原沙弥戒名叫罗桑扎巴，生于青海湟中（今塔尔寺一带）的佛教家庭。因藏语里湟中作“宗喀”，故后人尊称其宗喀巴。他幼年时曾得噶玛噶举派（因该派座主噶玛拔希于1257年应聘觐见蒙哥汗时，得赐一顶金边黑色僧帽和一枚金印，故称黑帽系。藏传活佛转世制度即始于该派第三世活佛饶迥多吉。1289年，当他五岁时被认定为噶玛拔希的转世活佛，遂成定制，并为其它教派效法）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受近事戒，后随敦珠仁庆学习经论，得授密教灌顶。他36岁后发起宗教改革运动，正式创立格鲁派。他在为振兴戒律而改戴持律者所戴的黄色尖顶帽之后，弟子们亦随即纷纷效法，故后世多称该教为黄教。宗喀巴的改革，最先得到西藏帕竹地方政权的全力支持，成效显著。明永乐七年（1409），在拉萨大昭寺的大祈愿法会上，他终被公认为西藏佛教界的领袖。其著名弟子克主杰被后世追认为第一世班禅；根敦主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而绛钦却杰（原译作释迦也失）于1414年被宗喀巴派往北京觐见永乐帝，旋受封大国师，遂使格鲁派很快影响到北方地区。明朝末年，该派通过蒙古与后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初时，囊苏喇嘛携其法弟白喇嘛到达赫图阿拉城，努尔哈赤亲自设宴款待，礼为师尊。至皇太极定都盛京之后，又于盛京四门各建永华、延寿、法轮、广慈四座塔寺，寺

内各立大佛一尊及左右肋侍，另立八菩萨，四天王和宝塔一座，1642年，在皇太极延请下，达赖喇嘛遣使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一行抵盛京，其所受礼遇更为隆重。

从本质上讲，后金政权信奉黄教，是为了争取蒙古各部和西藏上层，但其举动在满族亲贵和平民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顺治入关后，对藏传佛教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纵其发展的政策，而格鲁派上层人物的活动，也确实为清政府稳定蒙藏地区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在清代的二百多年中，格鲁派不仅在西藏独享政教合一的大权，而且在蒙古、北京及周边地区也得以广泛传播。该派四大领袖（包括藏地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达赖、班禅和内外蒙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一直和清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其转世活佛由中央政府册封渐成定制。

清代常驻北京的藏传佛教八大呼图克图中，以章嘉活佛的地位最为尊崇。章嘉，原系青海土族寺院佑宁寺活佛系统。其一世生于互助土族张家村，故称“张家活佛”。至康熙年间，清圣祖玄烨以“张家”二字不雅，遂改称“章嘉”。

有清一代，学识最为渊博的佛教学者当数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公元1717—1786年）。他于雍正二年（1724）进京，先后从二世土观活佛、七世达赖、六世班禅及其师阿旺曲丹广学显密经论和本派教法。除藏语和梵文外，还通晓汉、满、蒙多种语言。乾隆九年（1744），他主持了雍正王府的改建工程，使雍和宫成为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不久，他又在妙应寺（今俗称白塔寺）创建了专习满文经藏的寺院，并在颐和园内建造了一座三层佛堂，亲塑千首千臂白伞盖佛母像，及建成了内设四续部立体坛城的金顶佛殿。他亲自为乾隆帝授胜乐灌顶，讲授胜乐二次第及瑜伽母、空行、六臂怙主诸法。据记载，随同乾隆学法的还有数位皇子、宗亲及满、汉大臣。这与乾隆十八年（1753）重修妙应寺白塔，并于塔顶封入大批珍贵佛教文物，显然有着密切的关



绿度母



四臂观音



弥勒



空行母



莲花生
(愤怒相)



十一面观音

系。据清代《理藩院则例》记载,当时的藏传佛教的确盛极一时,几乎成为国教。仅北京城内在册的藏传佛教寺院就有妙应寺、雍和宫、隆福寺、大正觉寺、大隆善护国寺和东、西黄寺等三十余座。

简言之,约从十一世纪中叶以后,藏传佛教开始由原来分散传承的许多学派,逐渐地形成了几个较大的宗派。有显教的,也有密教的。一般来说,以讲论、传承大乘经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显教的派别;以修持、传承密乘教法为主的就属于密教的宗派。但是,藏传佛教各宗派由于都形成于密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所以使得显教各派深受影响,也大多传承和修持密教之法。而密教从根本上讲,则是在大乘佛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它与以波罗蜜多派为代表的显教,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密宗各派中同样要学习显教的经论。在密教的许多典籍里,甚至规定教中的高僧必须诵读的大乘契经。这就使得藏传佛教中显密的划分,极易产生很大的分歧。目前,在学术界较为一致地看法是:先后形成于十一世纪末、十二世纪初的希觉派和觉域派等都是显教的派别;兴盛于十五世纪之前的宁玛派、萨迦派、香巴噶举、塔波噶举、觉囊派和霞鲁派等,都属于密教的宗派。就总体而言,西藏后期佛教就是密教,显教的经论、仪轨只是修行的一个阶段,只是为密修扎根基的一段必不可少的人门课。所以其做为独立的教派,因已被溶入密教之中,遂不复存在。

二、藏传佛教造像源流述略

佛教的造像运动大约发生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二世纪间。当时中印度北部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地区,由于受到希腊和波斯雕塑的深刻影响,开始出现了一种与古印度传统艺术相融合的造形艺术。随即在秣菟罗(今新德里东南一带)的土著民族区也打破了原始禁忌,使造像艺术蓬勃勃发展起来。一般来说,犍陀罗风格的

造像由于明显保留着希腊雕塑的影响，故佛的形象优雅而沉静。秣菟罗风格则体现了传统艺术的魅力，其佛像雄健、壮劲，胸部宽阔且脸颊浑圆。到了公元四世纪初的笈多王朝时，这种本土化的艺术与犍陀罗风格相融合，终使印度的佛像艺术达到巅峰期。因此，当佛教传入中国时，它就一直和释迦牟尼的形象联系在了一起，以致在许多古籍中都把佛教干脆称之为“像教”。

中国早期的佛教造像大多属于犍陀罗风格，约在北魏间开始了民族化的进程，并且很快就形成了独立的风格和模式。

藏传佛教的造像艺术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明显保留了古印度斯瓦特河谷、喀什米尔、东印度帕拉、尼泊尔和汉地雕塑的深刻影响，并且在与自身文化的融合进程中，最终形成了其鲜明的民族特点。到了明清之际，其风格渐趋一致。

人所共知，在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与文化活动中，宗教一直是重要的组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及人生的无奈，转而寻求命运寄托和精神归宿的、消极与出世的表现。但它与文学、艺术却始终紧密相连，尤其在与世俗和人文精神的相互交织、碰撞时所迸发的光华，就更是异乎寻常的耀眼、璀璨。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还是古代的东方，在那些举不胜举的惊世珍品中，这样的例子实在多得如同恒河之沙。

但是，从清代中后期直至民国期间，汉地佛教造像已变得彻底的世俗化而罕见精品，以至于将造像艺术应有的神圣、庄严与蕴涵也连带着失掉了。这尽管是封建时代走向没落的历史与艺术的必然，但其终究给后人留下了艺术上巨大的缺憾。可是反观同期的藏传佛教造像，或者是她独特的地域、民族及政治的原因，其在艺术的表现力及精美程度上，虽然也难与元明之前的成就相媲美，但在不少方面，却至少保留了她那独树一帜的风格和艺术魅力。纵观其发展，她有着一整、连续且绵延不断的



宗喀巴



尊胜佛母



摩利支天

历史脉络；横察她的品类，其间无论是佛的慈祥庄肃、菩萨的仪态万方、度母和天女的曼妙多姿，还是明王及诸天各部的狰狞畏怖，都与神性的圣洁与深邃，妙不可言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这世所闻名的辉煌。

藏传佛教造像中，以祖师的地位为最尊崇，其次是佛、罗汉、菩萨、佛母、护法和诸天等等。同时，藏传佛教造像的供养与汉地也有很大不同。通常除了独尊而外，多为曼荼罗（即法坛、法会或称道场等）组合。其中佛、菩萨（金刚、明王）依不同的曼荼罗，地位、座次的列置均有着严格的规定。藏密供养曼沿袭了印度教的传统，用正方形木龕的形式，按照不同的目的和场合组成不同的规模。

此外，藏传佛教的造像都是根据经典的仪轨制作的。在藏文大藏经中有《造像量度经》、《绘画量度》、《造像量度》和《佛说量度经疏》这“三经一疏”的“工巧明”。其中对佛、菩萨、护法神等的身相、比例，都有严格的要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模式沿袭下来。明代以后更受汉地雕塑的影响而趋向规整、严密，尤重衣饰的繁缛和装饰效果。

由于佛教造像对脸部的要求极严，除祖师像有明显的面相特征外，佛、菩萨具呈天男或天女形象，所以按照经轨的规定，又有尺度、手印、标识、坐骑的不同，及色相的区别。以五方佛为例：大日如来居中，手印为智拳印，标识是金轮，坐骑狮子，色相为白色；不动佛居东方，手印为触地降魔印，标识是金刚杵，坐象，色相为青；阿弥陀佛居西方，手印为禅定印，标识是红莲花，坐孔雀，色相为红；宝生佛居南方，施与愿印，标识是摩尼珠，坐骑为马，色相是金色；不空佛居北方，施无畏印，标识是五色交杵，坐金翅鸟，色相为绿。又如八大菩萨中的弥勒菩萨，标识是法轮，色相为杏黄；观音菩萨的标识是莲花，色相为白色；虚空藏菩萨的标识是肩生宝剑，色相为蓝。但在其它场合，颜色通常又有另外的含义。一般地说，

白色多表示平和或代表和平，蓝色则表忿怒，绿色是考验，黄色常表示智慧，红色是力量、怀爱的意思，或者是长寿的象征。有时这五种颜色还表示五方佛，而金色则可以代表所有的色彩。

如果用显密二教对造像加以区分的话，显教造像多为静寂相，或者称之为说教相；密教造像则多忿怒像，或称寓言相（以示多寓意）。首先，前已述及，如果将西藏的佛教均视为密教的话，则藏传佛教造像无论是呈静寂相的还是忿怒相的，就都应归入密教造像之列。其次，除了人们通常认为最典型的双身相外，藏密其他品类的造像尚丰。比如释迦佛，典型的密宗造像是着菩萨装，戴宝冠，饰璎珞，以表现佛祖修菩萨行时的庄严妙相。又如持金刚，乃表现释迦讲密法的形象，是为秘密主或本初佛；金刚萨埵又叫叫金刚心菩萨等等，其修法是密宗法的一切基础法，所以金刚手等菩萨表现为静寂相的亦多。此外还有一些，但呈忿怒相者较普遍罢了。如布禄金刚（藏密财神）就有黄、白、红、黑及三面六臂等多种，面目均狰狞丑陋，最明显的特征是左手握着吐宝白鼬；大黑天的形象更是狰狞可怖，但他却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保护神。十一面观音被认为是整个藏区的怙主，若以普通人的艺术标准论，其造型亦属相当鬼异了。

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历经千百年的发展、锤炼和兼收并蓄，终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魅力，加入了中华文物博大精深的家族，并且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瞩目。即将在白塔寺开幕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展，以其庞大的展品数量，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现了这一特殊的雕塑艺术形式，也理应给人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主要参考文献：

《元史》、《至元辨伪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吕建福《中国密教史》、《清宫藏传佛教文物》、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和金申《藏传佛教尊像选》等。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陈列部馆员）

“款书”

在书画鉴定中的作用



阎继红

中国书画艺术特点之一就是融诗、书、画为一体。书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或题款，其本意是证明这件作品出于自己亲笔，以取信于人。但是，随着绘画和款书的发展，在作品上题款的内容越来越多，位置也由边角处移至画幅中较明显的地方；除本人题外还有朋友、后人一题再题。“款书”已经成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有机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的意义也早已超出了本意。所以，“款书”对于我们了解作品内容、创作过程、流传情况及断定年代、鉴定真伪等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历代书画家人物众多，他们的作品各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书画作品自有经济价值以来，就不断有人用尽各种手段作假。传世作品中就有很多赝品，所以鉴定真伪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款书作为书画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书画本身的关系非常密切。款书的位置，必须符合各时代特点和审美习惯，用笔、墨色必须与书画作品风格一致。我们在鉴定书画作品时，对款书的形式、内容、部位、笔墨都要仔细察看，认真研究。

首先看其形式。款书的形式、位置，各

时代有不同特点。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传世绘画作品来看，最早的款书始见于宋代。宋代绘画，无款的还占多数。只有少数作者在作品上书写自己的名款，所见到的落款大都很简单，只写姓名、岁月等不多的几个字。而且大都用小字书写在边角上、树干上、山石间等隐晦的地方。

到了元代，文人画蓬勃发展。在绘画作品中，诗书画进一步结合成为风尚。明代沈颢在《画尘》中说：“元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后来书绘并工，附丽成观。”可见，元代的款书已臻于成熟。

明代前期的宫廷“院画”作品，多出自专业画师之手，他们师承南宋马远、夏圭。这批专业画师，一般不善于在画上题写诗文，所以款书极为简单，同宋代“院画”一样，大都仅落姓名、字、号款。如：林良、吕纪、朱端等等。明中期，吴门派画家在画坛占了主导地位，他们发扬了元代文人画习尚，其中除了仇英不善书，仅作“仇英”或“仇十父制”等几个小字名款外，其他如文徵明、沈周、唐寅等诸家及他们的传人、弟子等，都是诗书画一体。作品多有诗文题

记，书画配合，相得益彰。

清代书画上的题款，形式比前代更丰富了，也更讲究艺术性。许多著名书画家都善写长题，到康熙以后，几乎没有不署名款的。

历代款书形式各有特点，格式也不同。主要有两大类：单款和双款。不论是否题写诗文，只要是单署画家自己名号的，均称为单款。（包括：署名款、干支款、记年龄款、记书斋堂馆款、题意款等。）双款在作品上除了书写作者本人的名款外，还书写收藏者的名字；自己的属名称“下款”，而收藏者的名字称“上款”，合称“双款”。单款中的各类款式在双款中都有，而双款除了写上画者的姓名外，还多写上称谓及应酬语及谦词，上款中的称谓，是对藏画者的尊敬和友好的表示，也能反映出作者与藏画者之间关系与交谊深浅。

时代不同，款书的格式也不相同。如“双款”这种形式最早见于元代赵孟頫的《水邨图》卷。款写：“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为钱德钧作，子昂。”从元至明中期，这种款式都是“平头款”，就是对方的名字写在字里行间，也有另起一行写的，但每行上边头一个字都是平行的。一直到明代嘉靖以后，才有了“抬头款”即把对方的名字另起一行写，并要高出一字，以表示对别人的尊重。如果见到署有元代或明代早期画家名款的画用抬头款形式，那么，不管画的如何都可知其不真。

题上款时的称谓，各时代也有区别。元代上款多数仅写姓名或字号。如：管道昇《墨竹卷》款写：“仲姬画与淑琼。”赵孟頫《浴马图》款写：“子昂为和之作”，都比较简单。明代有称先生的，如：仇英《松溪论画图》款写：“吴郡仇英为隐先生制。”明末清初，文人结社风气很盛，题款中常见：某某社长、某某词宗如：项圣谟《且听寒响图卷》，款写：“为香王社长画”。马守贞《兰竹图轴》款写：“辛丑仲冬念四日写似彦平词宗正之，湘兰马守贞”。清代晚期常见的称谓是：“某某仁兄雅属”。如：陈鸿寿《善权石

室图轴》款写：“坚斋大兄属，鸿寿作。”汤贻汾《秋坪闲话图轴》款写“今甫二兄大雅属即请正之，七十一叟，贻汾。”如果上款写“某某同志”那一定是民国以后的作品了。

其次，看其内容。款书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泛：天文、地舆、岁时、人事。几乎无所不包。有些款书内容可以作为我们鉴定这个画家作品真伪的重要依据。

如：清代郑板桥在一幅《兰竹石图》上有一段题记：“先构石、次写兰、次衬以竹，此画之层次也。石不点苔，惧其浊吾画气。”这段题不仅写明了他作画的程序，还讲明了他画石不点苔的特点。为我们鉴定提供了依据。

再如：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伪品极多，而且仿的水平很高。他在一段题画跋中写道：“余画山水，郡中多贋本，反工于余，予无以制止。以此辨之，知真者不必工也。”董其昌是文人画家，他主张以意取胜，讲究笔墨情趣，不追求工细严谨。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对那种画的很工能、精细的作品就要仔细斟酌了。

作品款书的用字是否正确也很重要。许多著名画家，一生名款用字常有变化。如：明代文徵明，他的早期作品约44岁之前，落款写作“文壁”。44岁以后，款写为“徵明”，“壁”字款不再用。而他这个“壁”字，有一些作伪的人误写成“璧”。

在书画鉴定中，还可利用款书的“避讳”字来帮助鉴定和断代。避讳分为：避朝讳和避家讳。避朝讳是指避当朝皇帝及先帝的名字，避家讳是指避作者家中长辈或祖先的名字。避讳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缺写一笔，多为最后一笔，如：清代画家弘旿的《川岳腾辉图》名款中的“弘”字，为避乾隆（弘历）皇帝名讳，就少写了最后一笔（图一）。另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换个意思相近的替代字或谐音字；还有一种是将要避讳的字空格不写。如：有一幅董其昌的山水，落款“玄宰”的“玄”字缺最后一笔，这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的讳。查董其昌死于明崇祯九年，没有活到清代。因此



图一

就肯定了这件作品是清代人画的伪品。

对于一些无款作品，可靠的题跋就是鉴定真伪的依据。如：明代孙艾，字世节，他有两件作品：《蚕桑图》和《木棉图》，画上均无款、印，但是有沈周的题诗。诗后写道：“世节生纸写生前人亦少为之，甚得舜举天机之妙。观其蚕桑、木棉二纸，尤可骇瞩。且非汎汎草木所比，盖寓意用世。世节读书负用，于是乎亦可见矣。弘治新元中秋日，沈周志。”沈周与孙艾同时，孙艾还曾学诗于沈周，这段题记就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两幅作品都是孙艾真迹。



图一
局部放大

再次，要看款书的笔墨。鉴定书画要注意看款书的墨色是否与书画本身一致。如果见到落宋人名款，但绘画风格却是明代的作品，一定要仔细研究，很多明初画被人将款挖去改添宋人名款，因为明初院画和浙派画家都落“穷款”，他们的画风又与南宋院画一脉相承。做伪者为了牟利，将他们的画改款后冒充宋画出售。凡是后人改款、添款，墨色就会与原作墨色不同，浮在上面，而真品经历数百年，墨色吃进纸绢当中，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分出真贋。

看款书的用笔也很重要，历代画家大



图二



图三

都是书家，即使是宫廷画家也常用毛笔作画，都具有较深功力，落款应流畅自然。伪款既要模仿就不能放手去写，难免运笔犹豫、迟顿。如：明代的沈周，他的书法家黄庭坚，笔画修长挺拔。他当时名声很大，伪品极多。但作伪者仿他款书用笔在形式上过于造作，一波三折或横平竖直，有伸手挂足的弊病，与沈周真迹有明显区别。

正是由于款书在鉴定作品真伪时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相当多的作伪者都在作品的款书上面做手脚。他们利用一些古书画真迹，采用“改、添、减、拆、配、割裂”等手段将作品改头换面，以达到乱真牟利的目的。

改：是最常见的作伪手法，即挖去后代或小名家书画上的原款、印，改添古代或大名家的款、印。如：赵子昂《行书后赤壁赋》卷，为明代人书，风格似赵。于是作伪者将原作者款裁剪掉，署上“子昂”款（图二）。再如：上海博物馆藏清代郑板桥《墨竹图》原为陈馥画，郑板桥题。作伪者将题跋中有关

陈馥句挖掉，然后填上郑板桥款、印经过装裱后，就变成郑板桥画并题了（图三）。

添：是将无款书画添上大名家款、印；或在冷名家作品上加写朝代或名家题跋，以提前时代或抬高身价；或在末尾空白处添上伪款、印等等。如：故宫藏有一件马麟款的《观瀑图》。马麟是宋代人，而这幅画风格是明代浙派，用笔粗而松散，不如宋人紧密。所以这是一件明人无款画，被后人添上了“马麟”款，冒充宋画。

拆配、割裂：有将真的题跋配上伪的书画；有将真的书画配上伪的题跋；有将冷名真迹与名家伪作拼凑成套；有将一本画册或条屏拆成独立几幅；有将一件割裂成几件等等，手法多样。

总之，我们在鉴定一件作品的真伪时，首先要看书画本身的艺术成就，以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为主，但也决不可忽视“款书”在鉴定中的作用。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出境鉴定所馆员）

雍正的治国思想

与官窑艺术

于平



雍正款珐琅彩蓝色山水纹碗

近代知识分子醉心商周、秦汉、唐宋的文明和辉煌，而很少有人对清代的艺术表示更多的关注。当人们想从三百年的清史中，找出超过前代的成果时，只有在形式美中得到满足，如官窑瓷器。

在传世的官窑瓷器中，出现笔法精细的山水、竹石、花卉图案的彩瓷，并不在文人写意画最盛的明代，而是在清代的雍正年间。当人们捧起一件雍正御器，被上面花卉的嫣然风神所倾倒时，很难想见它是出自一位“严猛为政”的帝王的审美观念。

雍正正在位十三年间，以超人的精力躬亲庶政，朝乾夕惕，将康熙留下的社稷治理得“国帑丰盈，人民富庶”。可是，谣言非议象乌云一样，笼罩在紫禁城的上空，十三年间从未消散。使得这位孤独的皇帝向上天悲愤地呼喊：“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教朕怎么样。”史学家对于雍正的悲痛，从没有给予过一丝的同情。三百年间，始终

将一顶矫诏篡立的罪名扣在他的头上。让人难以相信的是，雍正官窑瓷器那异常动人的端庄，正是来自于雍正承位的危机。

康熙六十年，在畅春园的一片悲声中，雍正出乎所有人意料地突登大宝。与他争夺皇位达十余年的亲王、贝勒们惊疑愤怒，心怀一股反叛怒火。当他准备举行登基大典时，连自己的生母——“仁寿皇太后”也表示拒绝参加。最后，这位新帝拉着百官一起跪求，勉强允诺。

面对自己不清白的皇位，雍正用了长达七年的时间，不断地向宗室、百官和老百姓解释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却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信服。心怀反叛的皇子，“既不感恩，又不畏法”，潜纳臣僚，结党成谋，弄得他“心力俱困”。更棘手的是一旦追究治罪，又不免落下“恩出于私”，“凌逼弟辈”的讥评。雍正为了正名顺言，哭着求兄弟入阁，试图笼络。不想，诸亲王却抱定必死之心，伸出头来逼雍正杀戮自己。普通大臣对新帝也心怀戒惧，不少人虽受提拔，却是“畏

其势而不感其德，惧其威而鄙其行”。

由于帝位的危机，雍正所处的政治环境比他的父亲初政时，还要险恶。雍正经过赌咒、发誓、恳求的努力，均告失败后，清楚地意识到除了施用严猛手段，进行镇压外，要建立起一种新的信仰，收拾人心，消弥叛志。最后，雍正选择了佛和道。

早在还是亲王的时候，为了掩饰夺位之心，麻痹父亲和诸皇子，雍正在自己的藩邸内讲佛论道，摆出一副“淡泊为怀，恬静自好”的样子。现在面对刚毅勇绝的政敌，雍正感到佛道二教以出世为宗旨，虽然对统一人心没有多大的好处，但不失是一种劝人“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的良方。

当年角斗皇位时，雍正曾从佛道二教中，求过“冲锋破敌之宝篆”，也得到过随境养和的平慰。对最危险的政敌不得不杀，对更多的人，应该让他们自己进入到佛道“乐天知命，清静无为”之中。因此，雍正提出不要抑弃佛道二教，只尊儒学，要三教并奉。在清代历朝中，雍正一朝设教崇玄最盛。对于佛道理论的张扬，虽是出自政权的稳定，体现到艺术上，便形成了雍正一朝艺术的清淡逸雅的风格。在雍正官窑瓷器中，这一风格尤其显著。

人们谈论瓷器，往往将康雍乾三朝一并来讲。但是，细心的专家看到：中国瓷器的顶峰，不是繁华的乾隆时代，而是在雍正一朝达到极盛。这是一种纯艺术的审美。如果论造型和工艺的复杂多样，康雍二朝不及乾隆，可是就艺术性而论，三朝中，雍正官窑瓷器则是清代艺术的典范。

雍正官窑瓷的制作，始终与雍正的治国治政思想，紧密相连。其造型、纹饰、工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虽然大多是在遥远的江西景德镇完成的，但是，真正的设计师和督造者，则是深居紫禁城内的雍正。

雍正在位十三年间，除了到东陵祭拜祖宗外，不曾走出紫禁城。十三年间深居不出，最主要原因是害怕内宫生乱。雍正虽然是一个权倾天下的帝王，内心却十分的孤独。原本好静的他，更加耽于一种内心观

照。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雍正珐琅彩墨竹图碗，上面几丛青竹从苔草碧凝的巨石下，挺然生出，轻风中竹枝疏影横斜，而竹叶竟不被轻风摇动，片片下垂。这只小碗的画面的营构与技法上非常简洁，画的不是自然，是一种心境：“可怜劲节无人赏，只有清风明月知”。这是雍正皇帝内心世界的准确写照。在雍正御器中有很多象这只小碗一样，图案无论是秋林岩壑，还是春水流泉，都给人一种“墨华开寒岑，满纸留冰雪”的清萧和冷寂。

雍正即位不久，下旨停贡鹰犬，命人把先父畜养的珍禽异兽，统统放出。与自然之间的最后一丝联系也被割断了。因此，当我们捧起雍正的彩瓷时，瓷器上画有自然山水的很多，它们既不同于顺治时代的奇峭突兀，也不似康熙一朝雄峻多姿，雍正无意去传达自然的状态，也没有一种亲近的欲望，而是在笔笔精妙中表现一种铅华尽洗的澄明。

二

清初的三位皇帝，都曾以自己深湛的艺术审美力，将治国理想体现到了本朝的官窑瓷器上，从而显现出了独特的魅力。

雍正即位后，对于官窑瓷器的烧制，抱有与父亲完全不同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承继前朝文化和完善典章制度，而是巩固皇位的稳定。他一登基，就着手扩大造办处的规模，同时选派怡亲王主持官窑瓷器的烧造。怡亲王是诸皇子中唯一与雍正共谋天下的亲王，也是雍正承继大统最贴心的依靠。所以，怡亲王深谙雍正制瓷的用意，小心谨慎而又殚精竭力地指挥造办处和景德镇官窑场，以使得雍正的政治目的在制瓷艺术上，也得到有力的表现。

如何通过艺术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形象？雍正与怡亲王允祥检视父亲留下的内宫艺术后，选中了试烧八年之久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器的最初烧造，是以铜胎珐琅器作为蓝本由景德镇烧制好素胎，运至

内宫,再由西洋画师或宫中的丹青高手绘制图案后入窑烧制。雍正年间景德镇烧制了大量薄胎白瓷,一部分运至内宫造办处。至今在故宫博物院的如意馆内,还收藏有一批作为画坯的素白瓷。雍正元年,敕令搜集历代名窑的传世精品,送呈内宫。一是作为仿古瓷器的样品,一是从这些名器中,捉摸出新的、能表达自己意愿的造型和纹饰。搜罗到的名窑瓷器有宋代的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明代历朝名器。经专业人员鉴定后,大部分送到了江西景德镇依样做范,仿制试烧。雍正仅挑出一小部分称心之作,谕旨怡亲王以此为蓝本,画样,镞木样,呈上审定后,再交景德镇御窑厂、内宫造办处烧制瓷胎画珐琅器。

怡亲王从前名器身上,或取其造型,或择其纹饰,或在传统纹饰和造型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力求从中创造出一种新雅的形象。怡亲王奉旨请内廷的丹青高手,绘出画样,率造办处依画样,镞出木样后,送呈雍正审定。呈审制度始于康熙,出于政治目的,雍正对这批画样、木样详加审评。在审定中,雍正将自己的创作想法,开始付诸实践。首先在造型上一改前朝浑厚古拙,无论瓶、尊、罐等大型器物,还是炉、碗、盏、盘、花浇、书灯、茶壶、文具等中小型器皿,造型都趋于秀巧、曲约。显示出道家的灵空、绰约的风神。纹饰也从效仿西洋、摹写前朝中脱逸出来,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佛禅精神。在珐琅彩器物上,雍正显示出一位帝王运用艺术,进行教化、劝喻的高超技巧。

然而,珐琅彩投入烧制时,却并不随心顺意。怡亲王与所率的造办处呕心沥血,仍难以寸进。珐琅彩的创烧,始于康熙五十年后,虽然经过近十年的摸索,为后朝积累了经验,但是工艺和技术仍未成熟。烧制常常出现破裂。为了减少烧破的数量,康熙珐琅器中,有一部分是用明朝旧器改制烧造。如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康熙珐琅彩花卉葵花式盘,是用明代的暗花白瓷盘作瓷胎,磨去足底的原款,重挂珐琅彩后,再加上红料康熙年款。雍正二年,瓷胎珐琅彩器常易

烧破的难关仍未能有效地攻克。雍正二年下旨烧造的五件“甜白脱胎酒杯”,又一次出现烧破事件。雍正见先入炉的两件酒杯均烧破报废,极为不快,下旨:“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

雍正急切地希望珐琅彩的制作,早一点儿达到完美,除了用于替代前朝的典章用器,更希望通过赏赐来向所有人表达自己情志。他一边督促试烧,一边将刚刚出炉的珐琅彩瓷器,赏赐给大臣。雍正二年间,在辅助雍正走上皇位中,立下第一大功的年羹尧,就曾屡屡得到这一赏赐。从年羹尧屡屡得赏,以及这位权臣最后的命运,可以看出,雍正把烧制的珐琅彩当成了一件政治道具。他曾将刚刚出窑的珐琅彩,三赏年羹尧。初赏,表达一种宠爱之情,忠诚事君,必得厚赏;又赏,暗示其不可朋党,自洁而慎守清誉;再赏,警喻其功高位重,应“以清虚为德”。遗憾的是,年大将军并没有从主子的赏赐中,悟出其中的深意,反而更加骄行自恃。当雍正完成对局面的控制,这位第一等的功臣就被送上黄泉路。

宫中瓷胎画珐琅器在怡亲王的专心督导下,成功率较康熙一朝有了极大的提高。而原料却成为烧制出佳器的主要障碍。珐琅彩瓷彩瓷料一向依赖进口料,造办处在试烧中,缩手缩脚,不能进行规模试烧。更主要的是,进口原料的颜色种类,也无法将雍正的创作意图充分地表现出来。雍正六年,为了使瓷胎画珐琅器有突破性的进展,雍正拨专款命怡亲王烧制珐琅料。并于雍正七年七月间,成功地烧制出珐琅彩料。这是一次开创性的成就,原料色彩的丰富,不仅使珐琅器步入一个新的境界,也为粉彩、墨彩以及单色釉瓷器的烧造,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至雍正十三年,在督窑官唐英撰写的《陶成纪事碑》中记载,雍正一朝烧制的彩色釉瓷器多达五十七种。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三年,雍正官窑瓷器承先启后,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雍正七年,造办处定烧了四百六十件白瓷,开始用新料烧制珐琅彩瓷器。当景德

镇将润洁的素胎运至内宫后，怡亲王允祥将内宫的丹青高手和制瓷名师调至自己帐下，设计、制作珐琅彩及各色釉瓷器。其中最著名的有吹釉炼珐琅彩艺匠胡大有，设计师海望，宫廷画师戴临、贺金昆、邹文玉等。后人对这些艺术大师在雍正珐琅彩的制作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些艺术家将自己的天才和想象，完美地投入到制瓷技艺中，使中国瓷器进入到纯艺术的境界。不再只是一件有图案的用具。

三

雍正晚年，尊崇道学，在内宫养士炼丹，在道学的熏陶下，雍正的艺术审美和趣味，表现得更加空灵、清逸、巧稚。同时，封闭的生活，也使他对于身边的一切事物异常敏感、挑剔。他常常亲自过问陶务，包括器物的型体、纹饰、釉色、款识等等细节。除身边的造办处外，对千里之外的景德镇御窑厂，雍正也常常派太监传旨督造。

雍正四年，当造办处试烧珐琅彩时，雍正向数千里外的江西御窑厂，派去了督窑官。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位是淮安关税务年希尧，一位是内宫太监唐英。御窑厂在这两位督窑官治理下，为雍正一朝的瓷器步入极盛时代，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而在这两位督窑官的选任上，却体现出雍正治国用人的手段。

年希尧是雍正第一宠臣年羹尧的哥哥，弟弟得意时，也跟着作过各种重要的官职。雍正三年，年羹尧事发赐死，年希尧也几乎性命不保。雍正四年，重新起用了一批年党官员。年希尧随之东山再起，派往淮安关任税务兼管景德镇御厂窑务。年刚一上任，就不断接到内廷送来的瓷器样品和谕旨。九月初二，雍正下旨“持出古瓶一件，奉旨照此款做样，交给年希尧烧造霁青、霁红花瓶，俟磁样时底足收小些，上身腰箍不匀处匀些”。二十天后，内廷再传旨，“郎中海望持出高足宣窑碗一件，口上有破处，奉旨交年希尧照样烧些，其碗内款落《大清雍正年制》，欽此。”

年希尧这位有深厚修养的艺术家，对于绘画一技有着极其独特的见解，他著写《视学》，对西方的焦点透视学，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和阐述。任督窑官后，他关于焦点透视的绘画理论，运用在瓷器绘制中。但是，年希尧最初兼署御窑厂窑务时，于瓷器烧造并不熟悉。雍正将督窑官一职交给年希尧，除了看重年的艺术修养，也是出于他的治国用人理论。

有史学家曾这样评价雍正：“秦汉以来，还没有一个皇帝像雍正那样孜孜不倦地从事理论说教，阐述君臣关系与为臣之道。”在紫禁城内深居不出的日子里，雍正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完善君臣理论中，竭力想通过意识形态，而不只是屠刀，来建立一个君臣融洽的安稳社会。雍正在走向皇位的道路中，与允祥一同夹在太子党和八阿哥为首的政治集团的倾轧之中，登基受到的最大威胁就是结党。针对时势他提出：作官者当“孤介自立”，不结朋党，将政治命运只交给君主一人。年羹尧生性刚愎自负，与百官少有交好，赐死后，年党一派尽遭贬斥。年希尧成了孤家寡人，而且，年亦有其弟之风，孤介不群。因此，受到雍正的重新启用。

年希尧上任后，雍正派人搜集了一些有关烧瓷的资料，以及历朝名窑瓷器，送往景德镇，供年参习、仿烧。甚至一有新的成果、经验、工艺，就派快骑给年送去。如雍正四年，下旨，“朕闻得瓷器胎骨过三年以后烧造更好，将此原故亦传给年希尧知道。”珐琅彩料炼制成功后，雍正下旨，“造办处收贮的料白、月白、松花色有多少数目，尔等查明回我知道，给年希尧烧造瓷器用”。从以上雍正对年的一片殷殷之情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官窑瓷器的重视。

年希尧经弟弟事变的痛创，对雍正严猛的手段，心存惧悸。上任后深恐有负主子的重托，于窑务一职呕心竭力。《景德镇陶录》中，曾对年的努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督理淮安板闸关年希尧管镇厂窑务，选料奉造极其精雅……驻厂协理官每月初二、

二十六两期，解送色样，至关呈请。琢器多卵色，圆类莹素如银，背兼青彩，或描锥暗花，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实基于此”。后世将年希尧任督窑官时期，御窑厂烧造的瓷器称：“年窑”。

四

年希尧虽然尽心竭力于御窑厂的官瓷烧造，可是，年的淮安关与景德镇相距两千里，往返一次，要走上一个多月。年在两年中，由于淮安关税务繁忙，按例每年只能去御窑厂两次。怡亲王深感不安，一旦耽误了贡瓷，连他也担待不起。于是请示皇上，从大内派去了一位驻厂窑务。雍正六年八月，怡亲王宣旨命太监唐英，领内务府员外郎衔，赴景德镇御窑厂署，佐理陶务。两个月后，唐英抵达景德镇，御窑厂的烧造事宜，由唐英一人担起。原陶务年希尧仍遥领总理御窑厂之职，负责上传下达。

唐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督窑官。唐自幼嗜读书，一目十行。丧父，族人见他聪颖过人，在康熙三十六年，将十六岁的唐英送入大内，入值养心殿。唐英自幼丧父，性格孤介，这一点为提倡“孤介之风”的雍正看中，当他成为养心殿的新主子后，将唐英拔至署郎，从五品的员外郎。

唐英在康熙时代就与皇十三子允祥交往，允祥执掌内务府印后，命唐“每日稽查内务府造办活计房各作当差役匠役人”。唐英除了监督造办处役匠处，常常很有兴致地画制瓷器的画样，提供给御窑厂。在《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有：雍正元年正月，怡亲王交给唐英定瓷小瓶、明嘉窑小扁瓷盒、定窑炉等七件瓷器，让他画样。三天后唐英就画好了，呈交给了怡亲王。由此显见，唐英于绘画和陶瓷，有很强的才赋和感受能力。因此当怡亲王感到年希尧力有不及，便奏请皇上，派唐赴景德镇担当督窑大任。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唐英先与年希尧合作，后年希尧因钱粮问题受人弹劾革职，唐一人担起重任，为清代官窑瓷器走向极盛，功勋卓著。

唐英奉差来到御窑厂时，虽曾画过瓷器的画样，但对瓷器的做胎、烧制等细事，却从未经历过。而“物料、火候与五行丹汞同其功，兼之摹古酌今侈翕崇庠之式，茫然不晓”，不得不一切都听老窑工的。唐英出于内宫，深知帝王秉性，一想到雍正、怡亲王派他署理陶务的期望，心中惴惴不安。于是，他闭门谢客，聚精会神，苦心戮力地学习陶艺，三年间与御窑厂的工匠同吃同住。到了雍正九年，对“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唐英在《陶人心语》中的这段文字，在说明制陶一艺学问深湛外，表现出了他做人的谦逊。其实，唐英在第二年烧制出的十二件仿钧炉，呈送北京后，雍正禁不住称赞道：“此炉烧造的甚好，传与年希尧多烧造几件。”能得到雍正如此夸奖，极其难得。

官窑瓷的烧造，不仅包含着雍正的政治意图，而且，这位有着深厚艺术修养和鉴赏力的帝王，在陶瓷一艺上也有着独到的见解。自唐英到任后，雍正的要求越来越多且具体，仿制的画样、木样、前朝瓷器源源不断地从内宫送往淮安关，转至御窑厂。不仅如此，雍正对瓷器的烧制不断地提出改形制、改款识、改纹饰，以及着釉的薄厚等，近乎苛刻的旨谕。由此可见，年、唐二人的压力是何等的巨大。对于这一点，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若没有雍正的直接参与，雍正官窑瓷器所呈现出的秀丽巧致的器型、艳美而不失雅逸的色彩和超凡脱俗的纹饰，就不会表现得那么鲜明。

年、唐二人从雍正六年到十三年间，制器数十万件，仿宋五大窑及新创品种五十七种之多，规模和数量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年、唐二位天才的苦心戮力，尽忠尽责，不仅雍正将自己的政治理想，通过艺术完美而鲜明地张扬出来，清代的制瓷艺术也以惊人的速度，走向极盛。所以，在隽秀的雍正官窑瓷器中，有雍正的深虑与韬养，也包含着年、唐二人平静而专注的精神。

（作者为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传统建筑的色彩

傅 立

北京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与文化长期的综合积淀，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北京传统建筑，有城池、宫殿、坛庙、苑囿、住宅、园林、寺观、陵墓等诸多类型。这些传统建筑对于色彩的应用有着极高的造诣。北京人以自己的色彩传统及倾向、自然环境气候特点、建筑空间结构、建材性能、饰面颜色及严格的等级制度等，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北京传统建筑的色彩艺术。

本文在对北京地区的传统建筑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对其建筑色彩研究（主要就色彩的多种对比）概述如下：

一、明度对比

由于明暗程度差别而形成的色彩对比为明度对比。明度对比在色彩构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色彩的层次、体感、空间关系主要靠色彩的明度对比来表现。在传统建筑中，黑、白、灰三个层次的明度对比反映在几种不同的建筑之中。

北京的宫殿、坛庙建筑不仅色彩变化丰富，素描关系也颇厚实而有层次。这就体现在不同色彩的明度值在色阶上的变化：黄瓦、青绿彩画、红墙、红柱，每种色彩的明度相比基本上构成了一个逐步暗化的色阶，这种从明到暗，含蓄渐深的明度对比，

逐步加重了色彩的份量感和形体的造型能力，因而增强了单体建筑的稳定感。

在宫殿、坛庙、苑囿、园林、寺观、陵墓建筑中，灰色大量地应用于室内外地面、庭院的铺砖，汉白玉石雕栏杆和台基设置在灰色的地面之上，使灰与白的对比应用自然得体。远望彩度极为艳丽的建筑，在白与灰的衬托下象一座硕大精美的工艺之作。中等明度的灰在颜色主体中位于色阶的中间，同各种色相结合，形成了准确相应的补色效果，从而使白色获得了生命。灰与白的对比又用吸收力量的办法，使各种强烈的对比色变得整体感很强。松弛的灰色同周密的白色，使单体建筑的色彩更加臻于完美。

由于封建时代的建筑等级规制，又因北京年平均气温较低，春秋两季风沙大，民居由浅灰色灰抹墙上身，中灰色砖砌墙下肩，形成浅灰与中灰对比，使灰色的四合院自成一体。所使用的这两个灰度级，在冬天与北方辽阔的黄土地，在春天与原野上的各种绿色，在夏天与浓绿，在秋天与丰富多彩的秋叶都形成惬意的配合。随着建筑等级的逐步提高，北京传统建筑色彩也逐渐变得浓重。如王府、商贾府第由中灰色砖与深灰色的瓦组成，形成中灰与深灰的对比。当灰色的民居、商贾府第四合院建筑包围在宫殿、坛庙、苑囿的周边时，又给高色相、

北京传统建筑的色相对比：

色相 部位 单体	瓦面	檐下	门窗(柱)
宫殿	橙	蓝紫、蓝绿	红
坛庙	蓝绿	蓝紫、蓝绿	红
陵墓	黄绿	蓝紫、蓝绿	红

高彩度、高对比的皇家建筑群以极好的衬托，这是形成北京古城建筑色彩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色相对比

色相对比是因各色相之间的差别形成的对比。在色相环中红、黄、绿、蓝是最饱和、最鲜明的色相对比。它们处于颜色主体表面离中心轴最远的位置。

传统建筑彩画的色相对比：

蓝紫/蓝绿/红/黄

将每组建筑及彩画当作一个有机体，用色彩来规划。把红、黄、绿、蓝色相加以严密而巧妙的组合，使这些色彩所具有的独特品性和专门质量，在视觉上形成的光辉和色域组织在一个光色相应的整体中，创作出独具特色的色相对比，予庄严、沉稳的建筑以活泼而强烈的表现力，在实质上强化了建筑的外在艺术形象。

三、彩度对比

把不同彩度的色彩，相互搭配，根据彩度间的差别，可形成不同彩度的对比关系。彩度对比在这里是强彩度与低彩度与无彩度之对比。

北京传统建筑色彩彩度很高，从最高值的屋顶到地面建筑各部分用色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彩度对比由强至弱而产生的

效果是如此地富有层次：

琉璃屋顶——橙色——阳光下

檐下彩画——蓝紫——阴影中

檐下彩画——蓝绿——阴影中

檐下彩画——红色——阴影中

柱和门窗——红色——阳光下

柱和门窗——绿色——阳光下

墙面——红色——阳光下

石栏杆——白色——阳光下

灰砖地面——灰色——阳光下

顶、柱、门窗、墙、栏杆，地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光，亮度高，彩度值由高渐低形成渐次对比。檐下彩画在阴影中吸收光，亮度低，蓝绿色在阴影中更能显现出它的光辉，自然形成较深的层次，同时亦强化出建筑整体在阳光下的色彩美。

在苑囿、园林、宅邸、铺面建筑中使用的苏式彩画，其枋心包袱的晕色使用五至十三道烟云的退晕色阶——一个强度的纯色与十二个加入不同等量白色的混合色对比。这种多层次的退晕色阶的彩度对比起源于宋朝，历经七百余年演变，一直沿用至今。

我国民间画工在色彩运用方面流传着这样的口诀：“软靠硬，色不楞”。“软”即晕色，“硬”即纯色。晕色靠着纯色，显得刚柔相间，色彩柔润而不生硬，非常美丽。传统建筑彩画就是采用这种“软靠硬”的用色技法，使色彩的彩度对比韵味无穷。彩画的主色调为青、绿色，这两种颜色在应用时分别

渗入不同程度的白色,产生退晕的色阶;这两种色彩彩度对比应用于绝大多数传统建筑彩画之设色中。

四、冷暖对比

是因色彩感觉的冷暖差别而形成的对比。中国传统绘画色彩分为“阴阳”两类。“阴类”就是冷色调,“阳类”即暖色调。在色彩的几种对比中,冷暖对比提供了色域的最大可能,带来了色彩和谐的条件。在色相环中,红、黄、绿、蓝是最艳丽的颜色,亦最能明确地显现出色彩的冷暖性,在阳光的照射下,焕发出强烈的冷暖对比。

以北京传统建筑中的宫殿为例:采用黄瓦、红墙、红柱、红门窗。黄与红色属“阳类”色,色性最暖,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金黄色光芒的瓦顶使红墙、红柱、红门窗显得更加火红,暖色充分地发挥了它的“阳刚”之威。而处于黄顶、红墙、红柱、红门窗之间的挑檐部分,由于顶和光线角度投下的阴影部分——檐下和梁枋,却巧妙地运用了“阴类”色——蓝、绿冷色,并在此巧妙地施以彩绘,使“阴柔”之美在其中得以充分地显现。

宫殿建筑借助于光的投射原理和色的特性,把光和色结合起来,体现出光环境中的色彩气氛,使天然光影下形成的“阴阳”色调变化蕴藏着种种美妙的情感和变化;略带红色的黄琉璃瓦呈橙色,在色彩感觉中似乎暖于红色,明亮而轻巧,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更加辉煌。由于它被皇权和宗教所垄断,在宫殿建筑中专用这种颜色,不仅使硕大的屋顶显得不太沉重,而且增强了宫殿建筑的权威和神圣。由于红色的质感重,显得充实、稳重,有份量感,用红色做墙和柱使得建筑能更承重,非常坚固。在檐下的阴影中,冷色巧妙而有机地组合成蓝绿色块。蓝色易与天空沟通,绿色易与地面相连。这种冷色调在阴影中显得空气感很强,轻盈而遥远,不仅给沉重的大屋顶带来轻松感,还增强了建筑的高度感,使宫殿建筑

显得更为神秘莫测了。

另外,冷暖色调的对比不仅加强了建筑外立面在空间中的形体感,同时也使室内环境色彩充实丰富。宫殿内柱多用红色、金色——为暖色调,天花、梁架彩画用蓝绿色——为冷色调;由于暖色给人以扩张的心理感觉,柱子显得粗壮、稳固,富有承重感,天花和梁架的冷色则显得轻盈高远,由此而创造出色彩配合得宜的室内空间。

冷暖色调的对比利用色彩效果使其表现力具有科学的高度,例如:物体在光的照射下亮部被光反射,暗部被光吸收,色彩关系因而显得和谐而有秩序,这符合光的原理。传统建筑凭借自己言简意赅的色彩语言,以强烈的对比激动观者的情感,进一步塑造出形体的空间感,不仅仅局部美观,而且总体关系也很统一,给建筑以颇大的艺术表现力。

五、补色对比

在人类的视觉中需要相应的补色对特定的色彩进行平衡。补色的规则是使色彩布局和谐的基础。遵守该规则,即可在视觉中建立起平衡来。若补色之比例使用得当,就会有一种稳定的形象效果。

橙黄色的屋顶与蔚蓝天空的互补关系,形成了自然的补色对比;黄顶红墙,在檐下阴影部分绘以青绿彩画,使红黄与蓝绿互补,人为地强调了建筑整体的补色对比;彩画又以青绿为主色,在其中点缀上鲜明彩度的红、黄色彩点,即人工的创造了局部之补色对比。

北京宫殿建筑从大空间到小空间:天空——建筑,建筑——装饰、装饰——墙体,即蔚蓝/橙黄、橙黄/蓝绿、蓝绿/大红,每对补色都有它们相对的独特性,而每对色彩在其互补强度的渐次变化中逐步地建立了平衡关系,色彩的色性逐渐地加强,变得凝重。阴影中装饰的补色运用,是同色彩明度有关联的综合运用,使群青、二青、三青、巴黎绿、二绿、三绿、银米、石黄、少量的

黑与白组成一体,所收到的联合效果,虽不比明度鲜明的建筑用色拥有更充分地空间,然而运用补色对比的色彩配置、色彩转调方法、节奏变化所形成了一种色彩设计技法,既有很强的装饰特性,又增强了建筑的空间感。

六、同时对比

同时对比是由于人的眼睛对一种特定的色彩同时要求它的相对补色,如果这种补色实际上没有出现时,人的眼睛就会自动调节,将其产生出来。同时对比所产生的这种补色现象是人眼的一种感觉功能——一种视觉后像——也可称为错觉。这种错觉在人眼中所引起的兴奋和强度不断变化,把拘束的色彩改变为自由的、富于表现力的和谐色彩。

北京传统建筑的色彩对色相的选择、色域的划分,能够同时对比并收到实用之效果,并使每项色彩主题发挥其正确的色彩关系。黄琉璃瓦与蔚蓝色的天空的同时对比,由于它们不是完全的补色关系,在对比的同时天空仿佛弥漫着淡紫色的雾,形成了黄/紫的补色关系,使建筑的色彩显得热烈艳丽,天空显得沉静苍茫。黄瓦红墙与蓝绿彩画的同时对比,加强了互为补色关系,使热烈的更加热烈、沉静的更加沉静,色感更加艳丽饱满、对比更加鲜明。这种关系由于色域分布的不平衡,而引起着色表现主义的强烈效果:布满暖光的黄顶、红墙取得了更大的色域;阴影中以蓝绿色为主的多色同时对比,具有一种抗拒诱惑的效果,它在自己的位置上充满活力的颤动着,激起观察者强烈的情感,从而减轻了“大屋顶”在建筑中沉重的压抑感。

七、面积对比

面积对比是将建筑群体用色彩组合在基本色域之中,根据基本色域面积的大小进行对比。

北京古城建筑色彩基本上可归纳为两个色域:一、无彩色域的四合院建筑;二、高彩色域的宫殿、坛庙、苑囿。北京城面积为八十多平方公里,其中高彩色域的建筑不足一平方公里,除部分水系和绿地外,大面积的无彩色域与相对小面积的高彩色域进行对比,衬托出宫殿建筑辉煌、灿烂。北京城在大面积的无色彩域内,点缀一些色彩华丽的宫殿、坛庙、苑囿、陵墓,使其不孤立和集中。尤其是建筑装饰——彩画之应用,尽管从宫殿到坛庙、苑囿、陵墓、商贾和民居等建筑均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但其色彩主调——强彩度的蓝绿色是不变的,它们象断断续续的线,将色彩引导、扩散到无彩色域之中,沟通了建筑之间的联系,调节了不同建筑群体色差的悬殊感,使所有的色彩形成有机的整体,统一了城市的建筑装饰风格。面积与色彩在画面中的对比可互相弥补,相辅相成。

北京古城的色调是按照统一的色彩构思而创作的。从四周向中央看色调的组合,宛如一部成功的音乐作品,有主旋律,有低潮、有高潮,在无比热烈激情的色彩和弦中,有无声的空白,最后以无限柔和的灰色呼应乐曲的开始,做为乐章的结尾。留给人以高昂的情绪和对无声的回味。

八、色与形的结合

西方抽象派画家为了加强对色彩的认识,曾把色彩与形体结合起来理解,他们将黄色比作正三角形,有着激烈、尖锐、醒目的效果。黄色的性质:活跃、锐利、明亮而轻巧。红色比做正方形,显得稳定、有重量和确定感,红色的性质:充实、有重量和不确定感。青色为正圆形,有着团结而不可分离的象征,轻快、柔和、富于活动性,使人感到有充分的流动感。青色的性质:透明而轻快,有浮动感;橙色是黄与红的折中,为等腰梯形;绿色是青与黄的折中,为圆角三角形;紫色是青与红的折中,为圆角正方形。其性质也分别与相应的折中色相吻合。

北京的宫殿建筑恰巧是这种色与形的结合,如:黄中呈红的屋顶,正面看是梯形,侧面看是三角形;红色墙体为方形;夹在顶与墙之间的部位——青绿彩画为圆形和圆角三角形。如果我们用这些形体给建筑造像,看起来它们是多么醒目、充实、稳固而又富于变化。黄、红、蓝、绿四种主要色彩与多样变化的形体相吻合,使我们北京的传统建筑性格鲜明,具有无穷的魅力。而我们的祖先对色彩与形体的理解和应用要比西方早好几个世纪。

九、色彩的象征

在建筑物上添加色彩,远在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懂得营建部落之时,便已有之。唐宋以后,我国建筑朝向精致华丽的风格发展,色彩的种类不仅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建立了一套着色准则,到明清之时已有等级严格的规制,以供营造匠师参考。

色彩在战国人的思想观念中,除了具有“颜色”的功用之外,同时也是权力、地位、方位及自然的象征。

在古代人的思想中认为红色代表吉祥,黄色代表权力,红、赤、丹色是中坚、主力、强大生命的象征。谁掌握了政权,谁就希望自己的社稷长久,江山稳固,所以唯有皇家建筑能施用代表吉祥和权利的红、黄色,从而深化了尊卑等级。

就“地位”的象征而言,周代规定天子宫堂的桁条为丹朱色,诸侯为黑色,大夫为绿色,士为土黄色;清代规定公侯的门屋为金色,一至二品官为绿色,三至九品官为黑色,民居只能用灰色。

汉朝色彩与五行观念结合,于是又有“方位”的象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合称为“四向”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青、白、朱、玄(黑)加上居中的黄(土)总计五色,为基本色;这些颜色进一步地与自然现象结合:左青配东方,春,属木;右白配西方,秋,属金;前朱配南方,夏,属火;后玄配北方,冬,属水。天地万物尽用于上述各属性之中,即使万物之灵的人类也不例外。于是,色彩就得适情来搭配——朝廷居中,屋瓦用黄色,太子居东宫,屋瓦用青色;各得其所。

另外,祭天用的天坛祈年殿、皇穹宇为蓝色;祭地用的地坛、先农坛为黄色,则是前面提到的“自然”象征。天为蓝色,地为黄色,这是先民观察自然后所得到的整体概念。

北京传统建筑(四维空间)恰当地应用多种色关系的对比,把光与色的表现力、视觉作用、心理影响等有效地发挥出来,使有限的颜色产生出无限的色彩效果,显示出光与色的综合艺术,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同时在建筑环境装饰中利用色彩对比使建筑产生均衡感、尺度感、节律感及秩序感。我们不能不惊叹这色彩艺术的独特构成,以及古代劳动人民的才智。

北京传统建筑的色彩艺术在需要与可能条件下的定式及其表现出的地域性格、传统文脉、城市美学、建筑美学的妙喻,有着从俗到雅升华的美学和艺术品位,为华夏传统文化增添了璀璨光辉,在世界建筑艺术领域独树一帜,赏心悦目。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助理馆员)

《北京市志稿》

的编纂、校勘与出版

李建平

一部编纂于北京沦陷期间的旧作——《北京市志稿》的校勘与出版引起了文物考古专家、北京史志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中共北京市委有关领导的重视。《北京市志稿》出版陷入困境的局面终于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市文物局、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市社科出版基金联合资助下，确定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使这样一部历经坎坷的北京地方志书有幸面见读者。

《北京志市稿》编纂于日伪时期，参加编纂者均为当时社会文化界名流。如吴廷燮，清光绪年间举人，后任清史馆总纂；夏仁虎，清末御史，曾著述《旧京琐记》；朱彭寿，清光绪年间进士，后任典礼院学士；夏孙桐，清光绪年间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瞿宣颖，民国史编纂处处长等等。参加编纂的其他人员，如彭一亩、张宗文、苏晋仁等在学术上也都有一定造诣。该书仿《顺天府志》体例，涉及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卷帙浩繁，为历代北京地方志书之集大成。该书体例规定，其内容上迄三代，下至民国二十八年，但实际重点在清末至民国期间。该书材料源于正史、典章、档案、实地调查，部分材料现已罕见，尤其是民国初年的大部分实

地调查材料，续补了光绪年间编纂的《顺天府志》之后的空白，实为难得。该书虽为日伪时期所作，但编纂者在内容和选材上无一点亲日之倾向，而是严谨治学，客观地记录了历史事实。该书历经日伪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来，半个多世纪一直被秘密收藏，未能公诸于世。

市文博系统研究员赵其昌先生回忆说，1953年前后，中央文史馆夏仁虎先生将《北京市志稿》捐献北京市，由副市长吴晗批示给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组接收，由研究员侯堉办理清点，那时我年轻，协助搬运。侯先生询问书稿来历，夏先生只说是日伪时期旧存，不愿多作解释，书稿便长期在文物组存放。1979年，首都博物馆与市文物研究所同时建制，两单位分书，该书划归市文物研究所收藏。此前，赵其昌先生曾两度翻阅其书，唯以不知其书编纂历史背景为苦。1985年前后，在北京史研究会一次年会上，偶听到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苏晋仁的发言，方知道该书的编纂过程。原来苏先生即是编纂人员之一，也是现存唯一作者。当时苏先生只有29岁，比较年轻。夏仁虎也参加了编纂工作，献稿时不愿多作介绍，显然

是北京刚解放不久,心存种种顾虑。

1995年,市档案馆在整理日伪时期档案材料时,发现了编纂《北京市志》的有关文件,使我们比较客观、真实地了解到该书编纂的时间和历史背景。从“吴廷燮复北平特别市公署秘书处函”等12件档案文件(详见《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1期)中我们得知,该书原名为《北京市志》,自1938年6月起至1939年7月止共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编纂而成。修志工作由北平特别市公署秘书处直接负责,秘书长吴承焜兼任修志处处长,总揽事权。具体修志由吴廷燮负责,任总纂,另有纂修4人,即夏仁虎、朱彭寿、瞿宣颖、彭一卮。修志共筹集经费洋一万元,分十个月交付,每月洋一千元。修志初定纲目为十二志,即(一)舆地志,内容子目有地形、沿革、疆界、区划、街衢、坊巷、村落、山川、池沼;(二)建置志,内容子目有城垣、官署、坛庙、园囿、营屯、沟渠、道路工程(各建筑规划如房基线等附之)、水电工程;(三)前事志,内容子目记述自三代以来及辽、金、元、明、清、民国政治上变革,兵刑变革及外交上大事;(四)民政志,内容子目有户口、农事、荒政、卫生、自治,凡现警察局所管,卫生局、自治监理处所管皆属之;(五)文教志,内容子目有历代学制、学科、国子监学、旧书院、清宗学、官学、各图书馆及其他文化机关团体、各级学校;(六)礼俗志,内容子目有吉礼、丧礼、嘉礼、祭礼、祠祀、岁时、风俗、各宗教仪式;(七)宗教志,内容子目有释(喇嘛)、道、回、西教、寺院源流、教堂、各杂教;(八)实业志,内容子目有农业、工业、商业、矿业、林业(均附物产出品表);(九)艺文志,内容子目有经史子集、文征、金石拓本;(十)古迹志,内容子目有宫殿、陵墓、园寝、各城垒废址、名胜、祠庙(今不祀者)、乡里(今废者);(十一)人物志,内容子目有宦绩、耆献、儒林、文苑、忠义、孝友、方术、流寓、释道、隐逸、列女,并附表;(十二)杂志,凡无类可入者皆属之。纲目列有三表,即氏族表、职官表、选举表。并说明:“如有遗漏或不妥协处,自仍可变

更”。北平特别市公署就修志工作还曾致函国立北京图书馆、教育部等,请求协助。到1939年7月,经修志处“督同在事人员漏夜趲赶,顷已大致完成”。初步完成的《北京市志》卷帙表如下:(首)凡例目录1卷;(一)舆地志10卷;(二)建置志5卷;(三)前事志6卷;(四)民政志16卷;(五)度支志7卷;(六)文教志24卷;(七)宗教志8卷;(八)礼俗志5卷;(九)货殖志10卷;(十)艺文志8卷;(十一)金石志9卷;(十二)人物志18卷;(十三)故宫志5卷;(十四)名迹志6卷;(十五)杂志2卷;(十六)职官表8卷;(十七)选举表4卷;总计152卷。纵观完成的卷帙表不难看出,文教志、人物志、民政志等卷帙浩繁,内容十分丰富;所列卷目与原定卷目也有较大变化。该书形成初稿后,一直由编纂者收存,未能刊印成书。

为了有助于北京史志的研究,使秘密收藏的《北京市志》能为北京的发展建设服务,到1986年原任市文物研究所所长于杰同志曾邀请苏晋仁先生详细介绍了该书的编纂过程,并数次检视原稿,发现缺故宫志等内容,但所存卷帙仍很浩繁,内容十分广博。他看后说,这部书是继清光绪《顺天府志》后至民国时期到“七七”事变前后全面反映北京社会各方面情况的一部大作,其重要性不在古史的考证,而在于尔后的史实记录,这些记录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越发显示出其价值。于是,于杰同志果断决定成立《北京市志稿》整理、校勘课题组,由该所研究人员陈汉玉、刘精义、于光度、孔祥利、刘卫东任课题组成员。同时向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出申请,要求列入市级规划研究项目,争取研究经费支持。

《北京市志稿》校勘于1987年正式列入市级规划项目,参加评审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整理、校勘、出版《北京市志稿》是北京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北京修志工作的一项基础工程,同时是建设北京文化、受益后人的工作,编纂、保存《北京市志稿》的同仁功不可泯。

(下转92页)

市文物局资料信息中心

藏北京地区出土墓志拓片目录(四)

魏钦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御马监太监魏公墓志铭”
盖篆书题“明故御马监太监魏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56×56

明正德七年(1512)闰五月卒”葬于都城西宛平县玉河乡”

贾铭撰 张明师楷书 傅亨篆盖

1956年于海淀区蔡公庄出土 志文字迹模糊

夏时墓志铭并盖

首题“明故中奉大夫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止菴夏公墓志铭” 36行 行39字 61×62

盖篆书题“明故中奉大夫山东左布政使夏公之墓” 4行 行4字 61×62

明正德八年(1513)五月十一日“葬于都城南西皋村”

毛澄撰 张纶楷书 张禴篆盖

于崇文区永外安乐林小学内出土

房懋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司设监太监房公墓志铭”
33行 行36字 62×62

盖篆书题“明故司设监太监房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62×62

明正德八年(1513)七月十九日“葬于宛平县香山乡七里园”

□□□撰 □□□楷书 周文通篆盖

志文有剥蚀

樊凯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驸马都尉樊公墓志铭” 40

行 行 42 字 68×68

盖篆书题“明故驸马都尉樊公墓” 3

行 行 3 字 68×68

明正德八年(1513)八月七日“葬都城西翠微山之原”

杨廷和撰 蔡震楷书 张懋篆盖

于北京铁路局西山疗养院出土

石猷及妻李氏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处士石公孺人李氏合葬墓志铭” 28 行 行 31 字 56×56

盖篆书题“明故处士石公孺人李氏合葬墓志铭” 4 行 行 4 至 3 字不等 56×56

明正德九年(1514)十月一日葬“都城南西郊亭”

滕霄撰 华英楷书 王杲篆盖

1958 年于朝阳区高碑店康槐乡出土

潘忠墓志铭并盖

首题“明故总镇两广御马监太监潘公墓志铭” 34 行 行 37 字 63×62

盖篆书题“明故总镇两广御马监太监潘公墓志铭” 4 行 行 4 字 62×62

明正德九年(1514)十月十七日“葬于都城西之广源村”

靳贵撰 张纶楷书 侯观篆盖

于西直门外动物园内出土

沈灏寿志铭并盖

首题“大明都知监太监沈公寿志铭” 36 行 行 35 字 57×56

盖篆书题“大明都知监太监沈公寿志铭” 4 行 行 3 字 57×55

明正德九年(1514)“卜葬玉河之原”

李东阳撰 刘棨书 高岱篆盖

于朝阳区十八里店出土

王佑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御马监太监王公墓志铭”

30 行 行 32 字 57×57

盖篆书题“明故御马监太监王公墓志铭” 4 行 行 3 字 57×57

明正德十年(1515)六月三十日“葬于阜成门外玉河乡池水村”

杨一清撰 刘棨楷书 顾经篆盖

1954 年于海淀区池北村出土

张懋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谥恭靖追封宁阳王墓志铭” 63 行 行 72 字 112×112 周围刻卷云纹

盖篆书题“明故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英国公谥恭靖追封宁阳王墓志铭” 7 行 行 5 至 2 字不等 112×112 周围刻卷云纹

明正德十年(1515)八月四日葬于“宛平县京西乡连三岗吕村东庄”

杨一清撰 李鏐楷书 朱辅篆盖

1958 年于丰台区赵辛店吕村出土

张恩墓志铭

首题“明故内官监太监张公墓志铭”

34 行 行 34 字 57×56

盖篆书题“明故内官监太监张公墓志铭” 4 行 行 3 字 57×56

明正德十年(1515)十一月“葬于宛平县香山乡海店之源”

李鏐撰 傅亨楷书并篆盖

由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历史系出土

谢汝明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征仕郎中书舍人致仕东厓谢公之墓志铭” 29 行 行 33 字 54×54

盖篆书题“明故征仕郎中书舍人致仕谢公之墓” 4行 行4至3字不等 54×54

明正德十一年(1516)五月二十二日“葬于西直门外香山乡之原”

滕霄撰 李□□书 □□春篆盖

于西郊大柳树钢铁学院出土 志文有剥蚀

金字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封文林郎太常博士金公墓志铭” 27行 行33字 61×61

盖篆书题“明故封文林郎太常博士金公之墓” 4行 行4至2字不等 59×60

明正德十三年(1517)六月十六日葬于“城西香山乡四里园”

赵永撰 刘恺楷书 张纶篆盖

1954年于海淀区出土

夏广妻易妙广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敕封孺人夏母易氏墓志铭” 30行 行32字 63×63

盖篆书题“明故敕封孺人夏母易氏之墓” 4行 行3字 63×63

明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六日“合葬于城南西皋村”

李廷相撰 滕霄书 翟銮篆盖

于崇文区永外安乐林小学内出土

李松轩妻娄善治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敕封孺人李灵台妻娄氏墓志铭” 29行 行32字 56×56

盖篆书题“明故敕封孺人李灵台妻娄氏墓志铭” 4行 行4至3字不等 56×56

明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十七日“葬于城南魏村社之原”

宋礼撰 李鏊楷书 王鸿儒篆盖

于丰台区东铁匠营出土

张诚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内官监太监张公墓志铭” 28行 行33字 66×66

盖篆书题“明故内官监太监张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66×66

明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二十六日“葬于阜成门外香山乡白云观之原”

王思撰 顾经楷书 杨润篆盖

1956年于西便门外白云观出土

朱景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约菴朱君墓志铭” 30行 行33字 61×64

盖篆书题“明故约菴朱君墓志铭” 3行 行3字 63×61

明正德十五年(1520)五月十日葬于“都城西香山乡四里之原”

毛澄撰 张纶楷书 俞琳篆盖

1954年于海淀区出土

金符母成云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敕封太孺人金母成氏墓志铭” 29行 行33字 63×61

盖篆书题“明故敕封太孺人金母成氏墓志铭” 4行 行4至2字不等 63×62

明正德十五年(1520)闰八月十七日“合窆焉在城西香山乡四里之原”

边宪撰 罗玉楷书 汪珊篆盖

1954年于海淀区出土

姜林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御马监太监姜公墓志铭” 27行 行32字 64×65

盖篆书题“明故御马监太监姜公墓志铭” 4行 行3字 64×66

明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九日“葬白纸坊弘法寺侧”

李时撰 张璜楷书 蔡需篆盖
1952年于宣武门外郝井台出土

刘璿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承直郎钦天监监副刘公墓志铭” 35行 行43字 55×55

盖篆书题“明故承直郎钦天监监副菊泉刘公之墓” 4行 行4字 55×55

明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六日“葬于西皋村”

韩昂撰 郭昊楷书 赵弘泽篆盖

于丰台区永外金家坑出土

官志恩暨妻叶氏继室 李氏等墓志并盖

首题“明故处士怡菴官公合葬墓志铭”
32行 行32字 54×54

盖篆书题“明故怡菴官公墓志铭” 3行 行3字 54×54

明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城郭之南”

王继礼撰 吴光禄书 周邦祚篆盖
1956年于永定门外琉璃井出土

(上接 87 页)

《北京市志稿》的校勘比课题组预先设想的难度要大。据课题组介绍,该书原存分15门,装为51册,150余卷。经对全书稿进行通点、普查和整体规划后,课题组将全部书稿分为13册。其中,第1册为“前事志”和“建置志”;第2册为“民政志”;第3册为“度支志”和“货殖志”;第4册为“文教志(上)”;第5册为“文教志(中)”;第6册为“文教志(下)”和“礼俗志”;第7册为“宗教志”和“名迹志”;第8册为“金石志”和“艺文志”;第9册为“人物志(上)”;第10册为“人物志(下)”;第11册为“选举表”;第12册为“职官表(上)”;第13册为“职官表(下)”和“资料目”。全书稿约400万字左右,基本上是未经整理的手稿。课题组在校勘时,要查认字句,编排内容,核对大量古籍、文献;对疑难问题、缺漏段落还要做勘误和补遗工作。为了保持该书原貌,课题组不在文字上做加工,遇文句不通段落,在保持原意的情况下只做疏通文句改动。

《北京市志稿》校勘完成是在1989年,该书由苏晋仁做序,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前5册。遗憾的是主持校勘研究工作的于杰同志先是双眼染上疾病,尔后病逝,未能看到这一尘封多年的巨著全部出版。该书前5册一面世,便受到社会各界同仁关注。市民政局史志办公室的同志看了该书“民政志”后说,书中披露的材料很珍贵,有的材料我们是头一回知道。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的人员看了该书“文教志”后说,书中记录北京地区早期高校成立前后情况,内容翔实,材料很重要。

抢救民族文化,全部出版《北京市志稿》已成为北京文化界一件大事,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心。我们衷心希望出版者不负众望,能早日让这部历经沧桑的文献面世,以告慰故去的同仁志士。

(作者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办公室课题处处长)

北京市文物局

1996 年四季度

文博事业大事记

王辅宇

10月4日

原北京大学红楼内部修缮工程通过我局验收。

10月7日—8日

市人大代表对本市孔庙、国子监等十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情况及文物法规贯彻情况进行视察。

10月8日

我局组织辽金城垣博物馆水关遗址化学保护工程的技术交底。

10月9日

我局组织对醇亲王府修缮工程进行技术交底。

10月10日

我局完成朝外大街商业、住宅区规划方案的审核并签署协议。

房山云居寺雷音洞抢险加固工程通过验收。

10月11日

我局组织对故宫雨花阁的修缮工程进行技术交底。

10月11日—15日

我局组织文博系列中级、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会。

10月14日

我局就东城开发公司官书院危改区中四合院的保护问题与东城区规划办、清华大学联合调研,就国子监地区的四合院保护提出了意见和实施计划。

10月15日

我局组织对顺天府学正房修缮工程进行技术交底。

我局与市规划局在故宫博物院召开现场办公会,就西连房翻建及职工食堂改建的规划,研究确定了修改意见。

10月15日—28日

北京市“两史一情”教育领导小组组织各成员单位及博物馆的社教专家对本市的各青少年教育基地进行考察评比。

10月16日

市政府办公厅召集我局前往内贸部联系李大钊故居居民的搬迁及修缮工作。

我局组织局属单位的支部书记学习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

10月18日—21日

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96秋季拍卖会举行,共分八个专场,1956件拍品,总成交额为8027.6万元。

10月19日

颐和园澹宁堂工程通过验收并举行了竣工典礼。

10月20日

由我局和市旅游局、市工商局、北京电视台共同主办的'96北京古玩、艺术品博览会在北京古玩城举行,此活动为期一周。

10月23日

我局参加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议政论坛》节目的播出,介绍了北京市的文物保护情况。

10月25日

我局完成颐和园宾馆调整规划并签署了文物保护协议书。

10月28日

依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按照市政府的统一布置,我局与市工商局共同修改了《旧货市场文物监管办法》的部分条款,已于年底实行。

10月30日

我局组织的北京地区博物馆讲解员培训班结业。

10月31日

我市公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文物工作的通知》。

10月

燕山出版社为迎接北京市第五次文物工作会议的召开,出版了《新编文物工作手册》、《燕都说故》、《京都古迹大观》、《北京文博京华》。

荷华房地产开发公司向我局捐款300万元,用于位于北京站东侧的明北京城墙遗迹的修缮。

10月~11月

我局组织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对有文物拍卖资格的翰海、嘉德、中商盛佳、荣宝斋四家拍卖公司的秋季拍品进行审鉴,办理了各项审批手续。

10月—12月

我局组织局属各单位开展“安全保卫工作制度”的学习、考试活动。

11月4日—6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北京市第五次文物工作会议。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出席了会议,各区、县主管领导、文物管理部门代表和市政府有关单位领导及市属文博单位、相关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和专家250人参加了会议。何鲁丽副市长作了大会报告,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到会祝贺并讲话。会议全面总结了“八五”期间文物工作,落实了《北京文物事业发展五年规划》所确定的各项任务。

11月5日

“做现代文明北京人——双休日行动

计划”的主体活动“我喜爱的博物馆展览评选”闭幕式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门前广场举行，会上向荣获展览一、二、三等奖及单项奖的单位颁发了奖牌和证书。

11月8日

我局对府学胡同36号四合院的修缮工程进行技术交底。

11月11日

中商盛佳国际拍卖公司举办了'96秋季拍卖会，共分三个专场，840件拍品，总成交额为2400万元。

11月13日

我局为宣武区荣兴艺廊的66位经营户办理了文物监管旧货物品经营手续，颁发了文物经营许可证。

11月14日

我局会同朝阳区政府、朝联古建公司组织顺承郡王府复建工程进展情况通报会，并研究了配套设施的规划方案。

11月14日—16日

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成功地举办了'96秋季拍卖会，共分四个专场，1871件拍品，总成交额为13074万元。

11月17日

德国著名艺术收藏家路德维希教授夫人一行参观了首都博物馆。

11月17日—18日

荣宝艺术品拍卖公司举办了'96秋季拍卖会，共分三个专场，820件拍品，总成交额为2671万元。

11月21日

我局组织对西四四合院的修缮工程进行技术交底。

截止到11月下旬，我局圆满结束了对本市35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巡视检查工作。历时近六个月，共查出各种隐患约50起，亟待抢修、维护的古建文物项目约20个，发出“限期整改的紧急通知”4件。业已整改完毕的隐患问题30余起。

11月22日

我局组织对中法大学修缮工程进行验

收。

11月25日

我局与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四通八达》摄制组协商历史文化保护区专题片，目前《牛街》、《南北池子大街》、《南北长街》三部已播出。

我局与市人大、市法制办共同研究《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改事宜，确定1997年上半年向市人大报修改方案。

国务院刘奇葆副秘书长、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视察圆明园。

11月26日

我局组织部分鉴定委员会委员对太平洋国际拍卖公司'96岁末艺术精品拍卖会的文物监管范围内的拍品进行审查工作。

11月27日

依照市政府法制办的统一安排，我局文物处、古建处等五个业务处室22名执法人员全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上岗资格考试，获得由市政府法制办颁发的合格证书。

11月28日

我局为科普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颁发了科普奖金。

12月2日

我局为宣武区海王邨工艺品商场的82位经营户办理了文物监管旧货物品经营手续，颁发了文物经营许可证。

12月6日

我局批准首批民办博物馆成立。即：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北京遗箴堂金石碑帖博物馆、古陶文明博物馆及何扬、吴茜现代绘画馆。并于批准后一年内开馆接待观众。

我局组织“文物知识讲座”。局长单霁翔主讲《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各区、县及局属200余名文物干部听了讲座。

12月9日—26日

我局对炎黄艺术馆的借展文物接收清查工作结束。共清点接收了2948件物品。

此批文物将作为馆藏品补充艺术博物馆的展陈。

12月9日

我局完成地安门百货商场扩建工程方案的审核并签署了文物保护协议书。

12月12日

北京大学朗润园修缮工程通过我局的验收。

12月16日

东岳庙后楼修缮工程通过我局验收。

12月19日

我局就区、县文物管理部门文物法规贯彻执行情况在农业博物馆召开“区、县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座谈会。”

12月21日

我局组织局系统参加“爱北京城、捐城墙砖”的搬城砖义务劳动。李志坚、何鲁丽、龙新民等市领导参加了劳动。

12月22日

美国有线电视台(CNN)制片人麦白柯等采访了参加搬砖义务劳动的北京市民,并向世界各地发布了北京将修复古城墙的消息。

12月23日

我局完成《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研究与探讨》作为全国文物局长会议材料用。

12月23日

我局机关核定了行政职务。

12月24日

95—96年度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工作总结表彰会在北京市档案馆举行。共评选出优秀青少年教育基地11家,同时确定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古代钱币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等六家单位为第五批市级青少年基地。

我局完成协和医科大学宿舍楼方案的审核,并签署了文物保护协议书。

我局为十四个局“九五”重点科研课题组颁发科研资助经费,并与课题组签定了

协议书。

12月26日

崇文门城墙抢险工程通过我局验收。

12月27日

我局召开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1996年年终总结会。回顾了一年来的工作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计划和要求。约30位委员出席了会议。

12月28日

在王府井东方广场地下基础施工现场发现打磨石器碎片和动物化石碎片以及灰烬遗迹。经专家初步鉴定,可能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对研究北京城区史前史和古环境变迁有重要意义。目前,在施工单位协助下,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正联合进行抢救性发掘。

12月31日

我局为推进文物科研工作的发展共征集各类文物科研论文78篇,将参加北京古典文物研究论文奖的评选。

第五届“我爱北京,我爱博物馆”征文比赛颁奖会在我局召开。市委、市政府、市教委的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会上对获得小学、初中、高中组一、二、三等奖的学生颁发了奖品和证书,获奖的学生代表朗诵了自己的作品。

我局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举行了一年一度的辞旧迎新敲钟晚会,共接待中外观众2000余人,意大利国际电视台拍摄了活动的实况并在新年期间向意大利国内播出。

12月

我局对保卫干部达标上岗工作进行验收。

我局文物公司、北京艺术博物馆被评为1996年度精神文明单位。文物公司经理秦同志被评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获得者。(作者为北京市文物局干部)

局属博物馆 1996 年第四季度参观人数一览表

单位名称	总人数	成人人数	学生人数	外宾人数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4480	2200	1850	430
正阳门管理处	77540	71800	5500	240
团城演武厅管理处	3120	2835	283	2
西周建都遗地博物馆	3087	2766	321	0
北京文博交流馆	2266	2175	36	55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20475	16330	1410	2735
首都博物馆	66500	25000	40000	1500
白塔寺文物保管所	2328	2039	77	212
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	9009	6816	1542	651
德胜门古钱币博物馆	6130	5453	639	38
辽金城垣博物馆	1959	890	1047	22
大觉寺管理处	11984	10880	1037	67
徐悲鸿纪念馆	16680	8900	6600	1180
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8456	4055	4369	32
万寿寺艺术博物馆	28619	27609	842	168
总计	262633	189748	65553	7332

本表为博物馆处提供

《北京文博》编辑部召开

新春座谈会

1997年元月28日,《北京文博》创刊一年半之际,编辑部邀集部分编委和在京的文博战线上的专家、学者及有关领导召开了新春座谈会,就如何进一步办好《北京文博》,进一步推动北京地区文物、考古、博物馆学、古建修缮、藏品研究等学术活动更广泛深入地展开,听取意见。

出席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宿白、曹子西、王世仁、赵其昌、赵迅、马希桂、齐心、吴梦麟、季华、张宁、葛英会、李建平等31人。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副局长许金和、孔繁峙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单霁翔局长代表市文物局对一年来各位专家学者对《北京文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还介绍了全国文物局长会议的精神和九六年北京文博事业发展情况,特别在文物市场的管理,文物建筑的修缮,考古发掘博物馆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九七年《北京文博》要配合宣传国家有关的文物政策;要对文物市场、拍卖市场、旧货市场的发展进行调研;对于北京新批准的私人博物馆如何管理,没有现成的政策要摸索、探讨。单局长最后说北京文物事业正处于转轨期《北京文博》要组织专家对文物事业发展中碰到的新问题开展讨论,文物宣传也要切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随后,主编张展总结道:《北京文博》自1995年8月创刊以来已经出版了六期,逾18000册,初步建立起发行流通渠道,并和全国30个省市的博物馆、文研所、考古队建立起业务联系,与在京百余家文博单位和全市十八个区县的文管所、博物馆建立起联系。发表了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125篇,初步形成由高、中、初级专业人员构成的作者网络。栏目设置有:考古研究;北京史地;古都风貌;古建园林;地上文物;博物馆学;文物流通;收藏天地;馆藏文物;文保技术等十几个栏目,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我局及北京地区近年来的科研成果、展览陈列、考古新发现、新开放的博物馆、国宝文物研究、事业管理等。期刊注重学术性与普及性有机的结合引起了专业人员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良好的反映。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北京文博》创刊以来,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受到重视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要办成一个高水平、有影响的刊物,还需走很长的路,下大力量。要继续办好就得牢牢地把握办刊的正确方向,即要坚持学术质量第一展示研究成果,又要突出管理事业的成效,二者兼顾。刊物要办得有地域特色,就必须考虑北京的特殊地位,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的首都、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国际大

都市。要从大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北京的文物、考古及博物馆事业,增加国际上研究北京的信息含量,提高期刊档次。

与会专家就开展学术争鸣;加深博物馆学研究;抓焦点、抓精品和决策的科学性等课题广泛发表了意见。

博物馆学的理论研究还很薄弱,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与扩大,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例如:大学生当义务讲解员;私人博物馆萌动兴起;文物拍卖与流通、收藏;青少年教育基地的发展等,都为博物馆学注入新内容。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最具持续力的资源发挥潜力,正确的运作都仰赖正确的理论指导,旧有的博物馆学理论远不能适应当前的事业需要,建立全新的博物馆学理论体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亟待理论工作者去探索、去总结、去提高。《北京文博》应成为培养专门人材的摇篮。

有的专家就文博工作中的科研与科普之间的关系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科研与科普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提高与普及的辩证关系,拿出科研成果是文博部门的基础工作、基本职能。高档次的精神产品它会确立

一种学说,也会否定一种倾向,它需要一代乃至几代专业工作者埋头发掘、整理研究才能产生的;科普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再发掘、再创造运用现代化手段技术再现其深层价值并以通俗的语言表述给读者,二者互为补充不可偏废。

有的专家说学术刊物应该办得有生机,有战斗性要倡导学术争鸣,编辑部要有意识的引导不同观点的争鸣,促进活跃的学术气氛。

“九五”期间要有多项保护项目出台,每个项目都应该加以介绍,是科学的介绍而不是导游式的解说。

作为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的学术刊物,要有年度的出版规划,每期都要有重点,使组稿、约稿有定向的选择,保证稿件的质量。努力创造学术环境,积极培养中、青年专业人员。每年从中评选优秀论文,以此为基础办活这块陈地。

建议《北京文博》增加一些栏目,开辟文物变迁栏目,建立档案,要给后人留下一本有据可查的帐。对介绍北京的书适当增加书评、书介对读者起到导读的作用。



(京)新登字 20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文博 1997 年第 1 辑/张展主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3

ISBN 7-5402-0835-X

I. 北… II. 张… III. 历史文物-北京-期刊 IV. K872.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3821 号

北京文博(1997 * 1)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25 印张 140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0.00 元

北京新增七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 鼓楼上的鼓

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公布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我市的“北京鼓楼、钟楼”,“大高玄殿”,“历代帝王庙”,“南堂”,“东岳庙”,“觉生寺”,“戒台寺”七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升级。这七项珍贵的古建筑,以它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我刊将辟专版,陆续加以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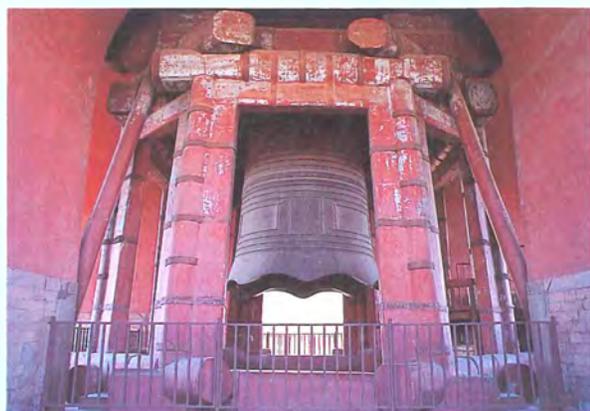
北京鼓楼、钟楼是京城南北中轴线上最北端的建筑,是元、明、清京城的报时中心,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了。鼓楼是一座单位木结构建筑,重檐歇山顶,通高46.7米,建筑面积2736平方米,现存大鼓一面,径1.5米,鼓面刀痕累累,为八国联军入侵时所砍。钟楼为仿木结构砖石建筑,通高47.9米。楼上有铸于永乐年间的报时铜钟,钟重63吨。该组建筑1957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大规模修缮后,设立了“鼓楼文物保管所”对外开放。

历代帝王庙,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始建于明嘉靖十年(1513),为明、清两代祭祀历代帝王之地。现存的建筑坐北朝南。有影壁、山门、钟楼、景德门、碑亭、景德崇圣殿及配殿等建筑。民国改元,祀典遂废。现由159中学使用。西城区已制订规划,将于“九五”期间辟为博物馆对社会开放。

(文:卢迎红,摄影:李澄)



◎ 钟鼓楼远眺



◎ 钟楼上的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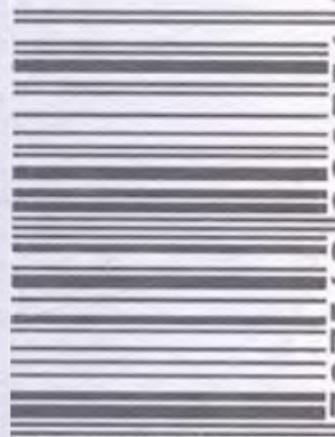
◎ 历代帝王庙大殿



◎ 历代帝王庙的山门及钟楼



ISBN 7-5402-0835-X



9 787540 208356 >

ISBN 7-5402-0835-X

定价:10.00 元